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9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9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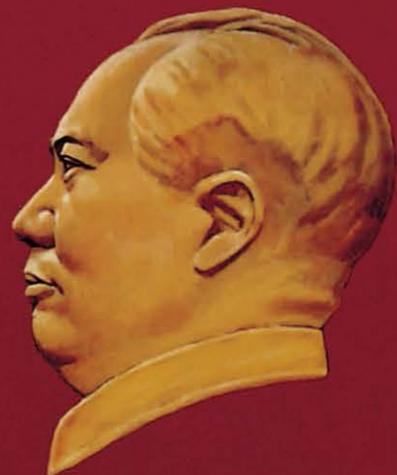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9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9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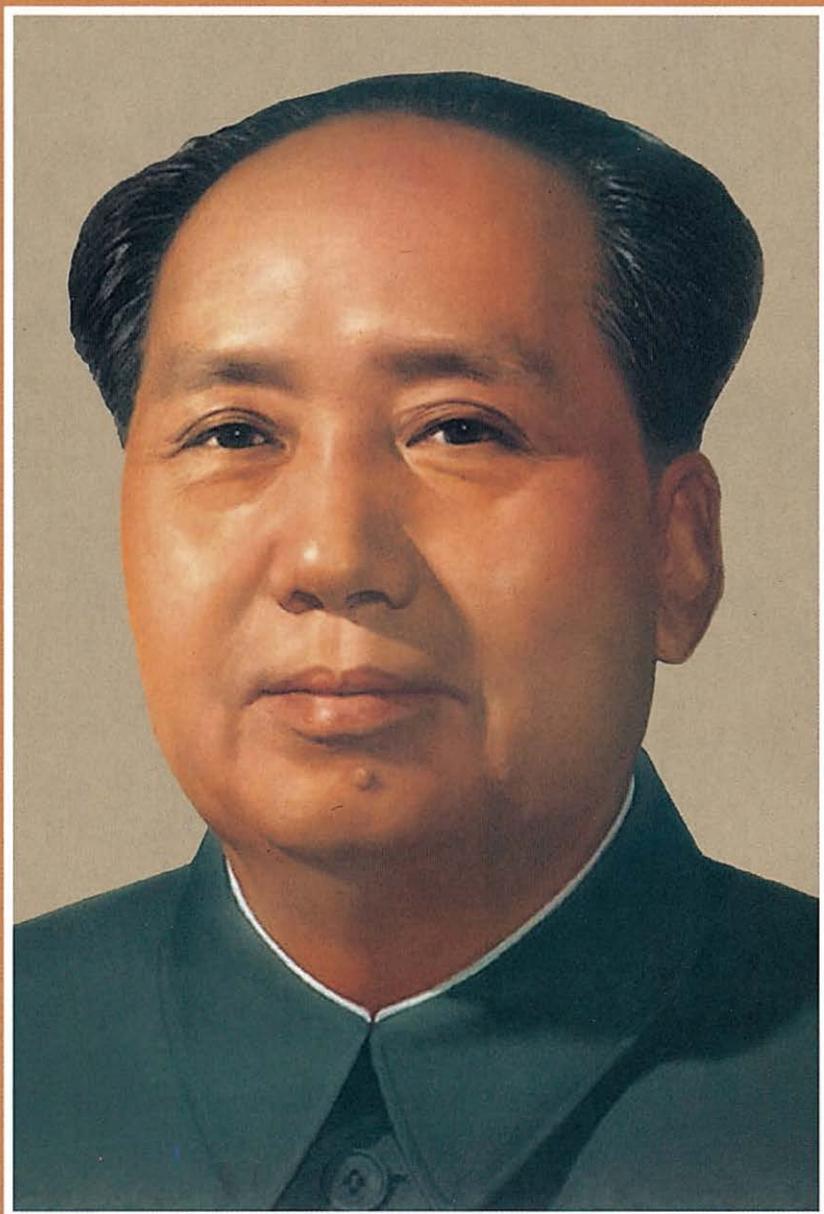


马恩百科（资料库）工作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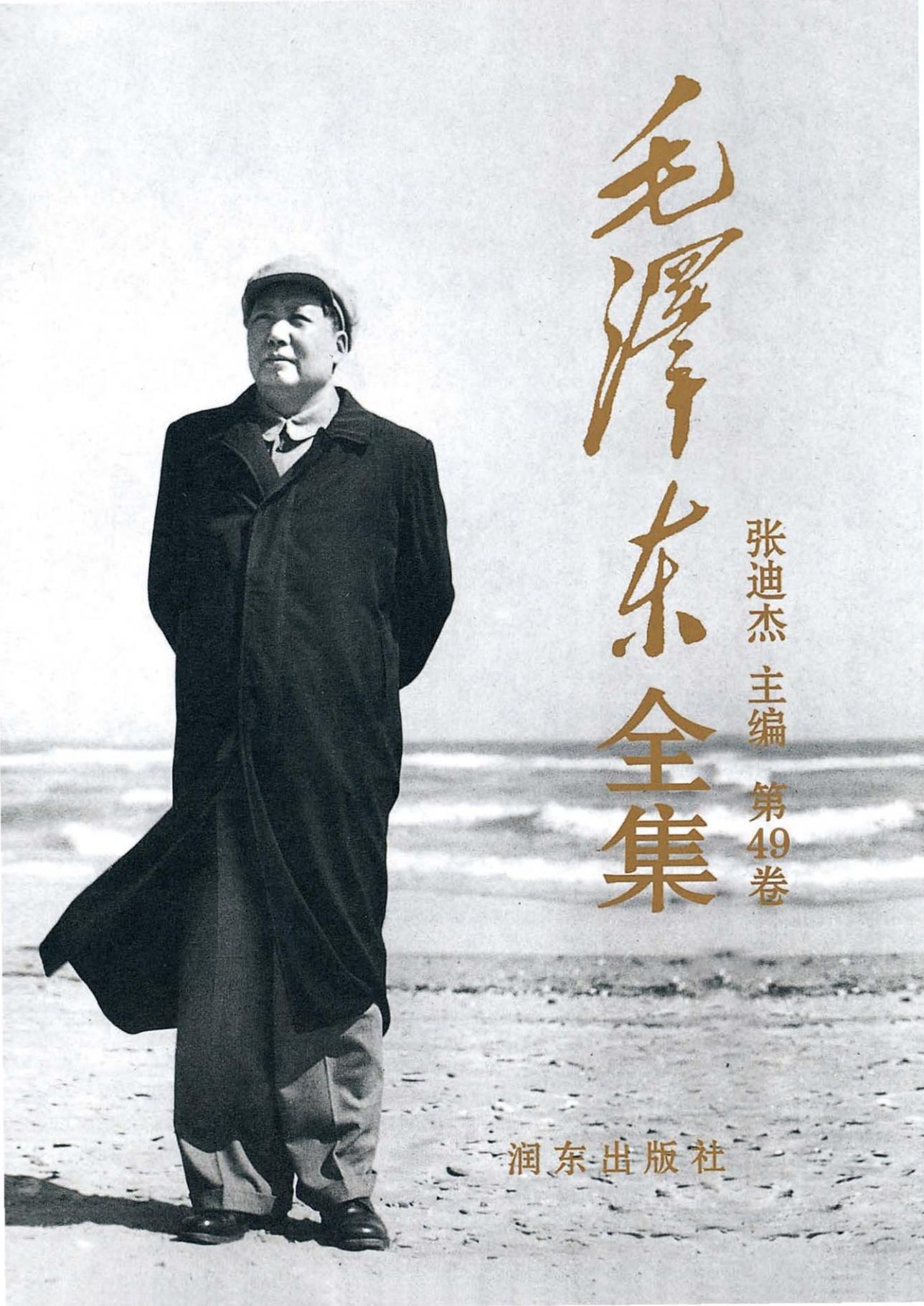
www.MEBK.org

收集 · 整理

感谢ZhuChengrui同志赞助购买本套《毛泽东全集》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9卷

润东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毛泽东全集

主任：流星
策划：树旺
编审：黄惠丽

主编：张迪杰
副主编：宋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苹 杨健桢 听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颖 杨泽
编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校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对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1 (1966年8月31日)	
七绝·炮打司令部* ·····23 (1966年8月)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24 (1966年8月)	
对杨寅田大字报的批示 ·····27 (1966年8月)	
关于工作组 ·····28 (1966年8月)	
关于北航《红旗战斗队》在国防科委坚持斗争问题的指示 ·····29 (1966年8月)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具体问题通知稿的批语···30 (1966年9月1日)	
对傅连璋来信的批语 ·····31 (1966年9月3日、12月28日)	
对中央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告西北局的两份电报的批语 ·····33 (1966年9月4日)	
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语 ·····34 (1966年9月7日)	

- 对《关于长沙、青岛、西安等地情况报告》的批示36
(1966年9月7日)
- 对四位美国专家的一张大字报的批语37
(1966年9月8日)
- 关于驻外机关“来一个革命化”的批语38
(1966年9月9日)
- 对中央关于国庆节挂像、抬像办法和口号的通知稿的批语39
(1966年9月)
- 关于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一事给林彪等的信42
(1966年9月13日)
- 对刘少奇《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
的批语43
(1966年9月14日)
- 对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44
(1966年9月15日)
- 对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46
(1966年9月15日)
- 关于中央文革57
(1966年9月)
- 就左派队伍问题和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59
(1966年10月1日)
- 关于按期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批语90
(1966年10月7日)
- 接见在京部队时的指示91
(1966年10月13日)

对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	92
(1966年10月、11月)	
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102
(1966年10月24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09
(1966年10月25日)	
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	121
(1966年10月25日)	
在聂荣臻同志去指挥发射导弹时的指示	124
(1966年10月27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和各大区同志的一段谈话	125
(1966年10月)	
关于组织外地来京革命师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的指示	126
(1966年10月)	
对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	135
(1966年11月4日、7日)	
对参加接见全国各地师生、红卫兵的一些负责人的谈话	139
(1966年11月10日)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串连问题的通知稿和补充通知稿的批语	151
(1966年11月16日、12月2日)	
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学校师生的谈话	153
(1966年)	
对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154
(1966年11月)	
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二周年的电报	171
(1966年11月28日)	

- 要支持群众的革命串连·····173
(1966年11月)
- 对中央关于刘澜涛出狱问题的复电稿和张闻天有关证明材料的批语··174
(1966年11月、1967年2月)
- 对《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新闻稿的批语·····176
(1966年12月3日)
- 讨论“工矿十条”时的讲话·····185
(1966年12月6日)
- 对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稿的批语·····186
(1966年12月15日)
- 关于不要公开引用《炮打司令部》等的批语·····200
(1966年12月25日)
- 对李雪峰在华北局机关的检讨要点的批语·····201
(1966年12月26日、28日)
- 对黑龙江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203
(1966年12月26日)
- 给周恩来的信·····213
(1966年12月27日)
- 对黑龙江省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214
(1966年12月28日)
- 对《林彪同志给浙江省军区的指示》的批示·····215
(1966年12月29日)
- 赞扬参加接待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解放军指战员的工作·····216
(1966年12月)
- 关于复员转业军人参加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指示·····220
(1966年12月)

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四点指示·····	221
(1966年12月)	
在文化大革命中学会大民主·····	222
(1966年12月)	
要保护和支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	224
(1966年)	
和林彪的一段谈话（摘录）·····	225
(1966年)	
赠叶剑英联·····	226
(1966年)	
关于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231
(1967年1月1日)	
对刘少奇关于北京建工学院红卫兵要他去公开检查的信的批语···	232
(1967年1月6日)	
关于陶铸问题的指示·····	233
(1967年1月8日)	
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	234
(1967年1月9日)	
机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	237
(1967年1月9日)	
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 电讯稿的批语·····	238
(1967年1月10日)	
对《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等五份材料的批语·····	240
(1967年1月11日)	

- 对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稿等三个文件的批语…242
(1967年1月12日、13日)
- 对《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批语…245
(1967年1月14日)
-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246
(1967年1月16日)
- 关于将贵州各方代表找到北京研究问题的批语 ……247
(1967年1月21日)
- 在延边自治州党委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去电制止冲突报告上的批语…248
(1967年1月21日)
- 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的批语…249
(1967年1月21日)
- 对广播系统夺权的指示…250
(1967年1月23日)
-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权…251
(1967年1月23日)
- 对张春桥来电请示夺权问题的答复…252
(1967年1月23日)
- 对《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稿的批语…253
(1967年1月)
- 要节约闹革命…254
(1967年)
- 关于研究军队夺权范围问题的批语 ……255
(1967年1月26日)
- 对军委八条命令稿和中央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256
(1967年1月、2月)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60
(1967年1月27日)	
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261
(1967年1月27日)	
在章伯森反映湖南问题报告上的批语·····	262
(1967年1月27日)	
关于外国朋友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263
(1967年1月28日)	
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报告的批语·····	264
(1967年1月30日)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批语 和修改·····	265
(1967年1月30日)	
关于发表《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等的批语·····	269
(1967年1月31日)	
和周恩来谈夺权问题·····	270
(1967年1月)	
和外宾谈如何看大字报·····	272
(1967年1月)	
关于接管的指示·····	273
(1967年1月)	
关于应说服红卫兵让王任重就医的批语·····	274
(1967年2月2日)	
对周恩来给陈伯达、江青的信的批语·····	275
(1967年2月2日)	
斗争要文明些，坚持文斗，不用武斗·····	277
(1967年2月3日)	

- 在西藏军区党委一份电报上的批语278
(1967年2月7日、8日)
- 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280
(1967年2月8日)
- 对《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
规定》稿的批语和修改289
(1967年2月9日)
- 关于播发《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的批语···292
(1967年2月9日)
- 对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稿和补
充规定稿的批语293
(1967年2月)
- 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296
(1967年2月12日、18日)
- 对王明昆关于成立“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等情况汇报的批语···302
(1967年2月14日)
- 关于派人调查总结北京两所中学军训经验的批语303
(1967年2月14日)
- 对谭震林给林彪的信的批语304
(1967年2月17日)
- 和部分政治局委员的谈话305
(1967年2月18日)
-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的批语307
(1967年2月18日、22日)
- 对北京卫戍区关于在大、中学开展军训的两个总结报告的批语···309
(1967年2月19日、3月23日)

- 在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新闻稿上的批语·····311
(1967年2月20日)
- 对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稿的批语··312
(1967年2月20日)
- 关于了解广东省委领导干部情况等问题的批语·····313
(1967年2月24日、28日)
- 关于公开报道贵阳棉纺厂按行政系统搞联合等问题的批语·····315
(1967年2月27日)
- 对张日清《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一文的批语··317
(1967年2月27日)
- 关于夺权的提法的指示·····318
(1967年2月27日)
- 关于要注意反革命复辟现象的批语·····319
(1967年2月28日)
- 关于宗派主义问题的指示·····320
(1967年2月)
- 要埋头工作，善于思考·····321
(1967年2月)
- 在沈阳军区组织机关干部到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情况简报上的批语··322
(1967年3月3日)
- 在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报告上的批语··323
(1967年3月7日)
- 对贵州省军区支援左派工作经验材料的批语·····325
(1967年3月7日)
- 转发渡口驻军支左经验报告的批语·····326
(1967年3月7日)

-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论革命的“三结合”》的批语和修改 …327
(1967年3月7日)
- 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 ……329
(1967年)
- 对北京市夺权筹备工作报告的批语 ……330
(1967年3月9日)
- 关于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程序的批语 ……331
(1967年3月10日)
- 关于推迟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批语 ……336
(1967年3月)
- 对中央转发北京卫戍区布告的指示稿的批语 ……337
(1967年3月)
- 对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职工、干部的信稿的批语 ……339
(1967年3月)
- 对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 …341
(1967年3月16日)
- 对《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材料的批语 ……342
(1967年3月19日)
- 对中央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稿的批语 ……344
(1967年3月19日)
- 对聂荣臻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请示报告的批语 …345
(1967年3月20日)
- 关于“三相信、三依靠”的指示 ……347
(1967年3月20日)

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的批语和修改	348
(1967年3月23日)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大庆油田实行军管的决定 稿的批语	351
(1967年3月23日)	
在一份反映宜宾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上的批语	352
(1967年3月27日)	
对《“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 组成部分》一文的批语	353
(1967年3月29日)	
对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354
(1967年3月30日)	
对《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一文的批语 ..	358
(1967年3月30日)	
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	359
(1967年3月)	
在胜利中不要冲昏头脑	360
(1967年3月)	
对报纸工作的指示	361
(1967年3月)	
关于党组织的指示	362
(1967年3月)	
关于批判《修养》的谈话	363
(1967年3月、4月)	
关于《毛泽东选集》注释等问题的指示	365
(1967年3月)	

关于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的一组批语·····	366
(1967年3月至1971年3月)	
在中央关于安徽问题决定稿中加写的一段话·····	381
(1967年4月1日)	
对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十条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	382
(1967年4月4日、6日)	
对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386
(1967年4月)	
接见谢富治时的谈话·····	390
(1967年4月19日)	
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报告的批语·····	391
(1967年4月23日)	
关于将河南两派领导人调来北京商谈解决问题等的批语·····	393
(1967年4月23日)	
对《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材料的批 语和注文·····	394
(1967年4月23日)	
关于部队支左的指示·····	399
(1967年4月)	
关于四川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400
(1967年4月)	
和某同志的一段谈话·····	401
(1967年4月)	
关于军管问题·····	402
(1967年4月)	

关于革命派的大联合·····	403
(1967年4月)	
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	404
(1967年4月)	
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	405
(1967年4、5月)	
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	408
(1967年5月1日)	
“五一”节对中央首长的谈话·····	416
(1967年5月1日)	
“五一”节和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谈话·····	418
(1967年5月1日)	
在“五一”节中南海晚会上的谈话·····	422
(1967年5月1日)	
对棉粮工作的指示·····	423
(1967年5月1日)	
关于大批判问题的指示·····	424
(1967年5月2日)	
对《〈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的批语和修改·····	425
(1967年5月4日、6日、7日)	
对张香山关于《矛盾论》中一段引文翻译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428
(1967年5月4日)	
在山东省军区关于山东地区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的报告上的批语·····	430
(1967年5月7日)	
对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支左干部集训情况报告的批语·····	432
(1967年5月7日)	

- 关于发表《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材料等的批语 …433
(1967年5月7日)
- 要相信和依靠群众、人民解放军和干部的大多数……………434
(1967年)
- 对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二十五周年宣传工作意见的批语……………435
(1967年5月9日)
- 对反映济南地区问题来信的批语……………437
(1967年5月10日)
- 对反映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支左工作中一些问题来信的批语…439
(1967年5月11日)
- 在济南军区支左人员秦厚德来信上的批语……………440
(1967年5月13日)
- 对北京市革委会重要通告的批语……………442
(1967年5月)
- 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写的批语…446
(1967年5月14日)
- 对《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的批语和修改……………449
(1967年5月18日)
- 对黄永胜与“广州工联”造反派座谈时讲话摘要的批语……………452
(1967年5月23日)
- 关于江青不宜参加中缅两党会谈的批语……………453
(1967年5月26日)
- 中央军委转发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的批语……………454
(1967年5月27日)

对一些高干子弟参与抄家一事的批语·····	456
(1967年5月28日)	
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上的批语·····	457
(1967年5月29日)	
关于甘肃实行军管和成立省革委会问题的批语·····	458
(1967年5月、7月)	
对《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的批语·····	461
(1967年5月)	
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462
(1967年5月)	
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指示·····	463
(1967年5月)	
干革命要有阶级感情·····	467
(1967年5月)	
对上海革命派的号召·····	469
(1967年5月)	
对上海市革委会的号召·····	470
(1967年5月)	
关于国际形势的指示·····	471
(1967年5月)	
关于处理军民关系的几点指示·····	472
(1967年5月)	
老干部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474
(1967年)	
关于夏收的指示·····	475
(1967年6月3日)	

- 关于对外宣传的指示·····480
(1967年6月18日)
- 对一封反映西安几个学校造反派讲阔气、讲排场等问题来信的批语··481
(1967年6月21日)
- 关于绝食静坐的问题·····483
(1967年6月29日)
- 必须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484
(1967年)
- 对八三四一部队支工工作的指示和支工情况报告等的批语·····485
(1967年6月、11月)
- 看到西安师院造反派两张大字报和给中央文革的信后的批示·····487
(1967年6月)
- 关于中央各部运动的指示·····488
(1967年6月)
- 中国革命的伟大世界意义·····489
(1967年6月)
- 有了错误就改·····491
(1967年6月)
- 关于叛徒问题的指示·····492
(1967年6月)
- 和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的谈话(节录)·····493
(1967年6月24日)
- 修改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去阿尔巴尼亚的发言稿·····496
(1967年6月)
- 对姚文元访问阿尔巴尼亚的指示·····497
(1967年6月)

关于意识形态方面容易出修正主义的谈话·····	498
(1967年6月)	
关于缅甸问题的指示·····	499
(1967年7月1日)	
关于制止建造毛泽东塑像等问题的批语·····	500
(1967年7月5日、13日)	
关于派部队制止赣州武斗的批语·····	502
(1967年7月6日)	
对两种《毛主席论教育》的批语·····	503
(1967年7月6日、12月6日)	
要集中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506
(1967年7月7日)	
在听了氢弹工作会议汇报后的讲话·····	507
(1967年7月7日)	
毛泽东等悼念阮志清逝世的唁电·····	510
(1967年7月8日)	
对总参、总政关于执行林彪指示建造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通 知稿的批语·····	511
(1967年7月12日)	
对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通知稿的批语·····	512
(1967年7月13日)	
关于不要“开快车”的指示·····	514
(1967年7月13日)	
接见军队领导干部时的讲话·····	515
(1967年7月13日)	

中央关于武汉“七·二〇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 ……………518
(1967年7月25日)

对林彪^[1]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 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2]

(1966年8月31日)

退林彪同志：

这样修改^[3]很好。

毛泽东

八月卅一日上午十一时

[1]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2] 1966年8月31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北京及全国各地的五十万师生和红卫兵。林彪和周恩来分别发表讲话。本篇是毛泽东对林彪8月31日送审的讲话稿的批语。

[3] 指林彪在送审的讲话稿中加写的两句话，即在讲话稿中“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这段话后面，加写了“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



第二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并排站在天安门上，毛主席他老人家看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高兴地对林彪同志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第二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宣传画）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毛泽东在北京。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检阅红卫兵和革命群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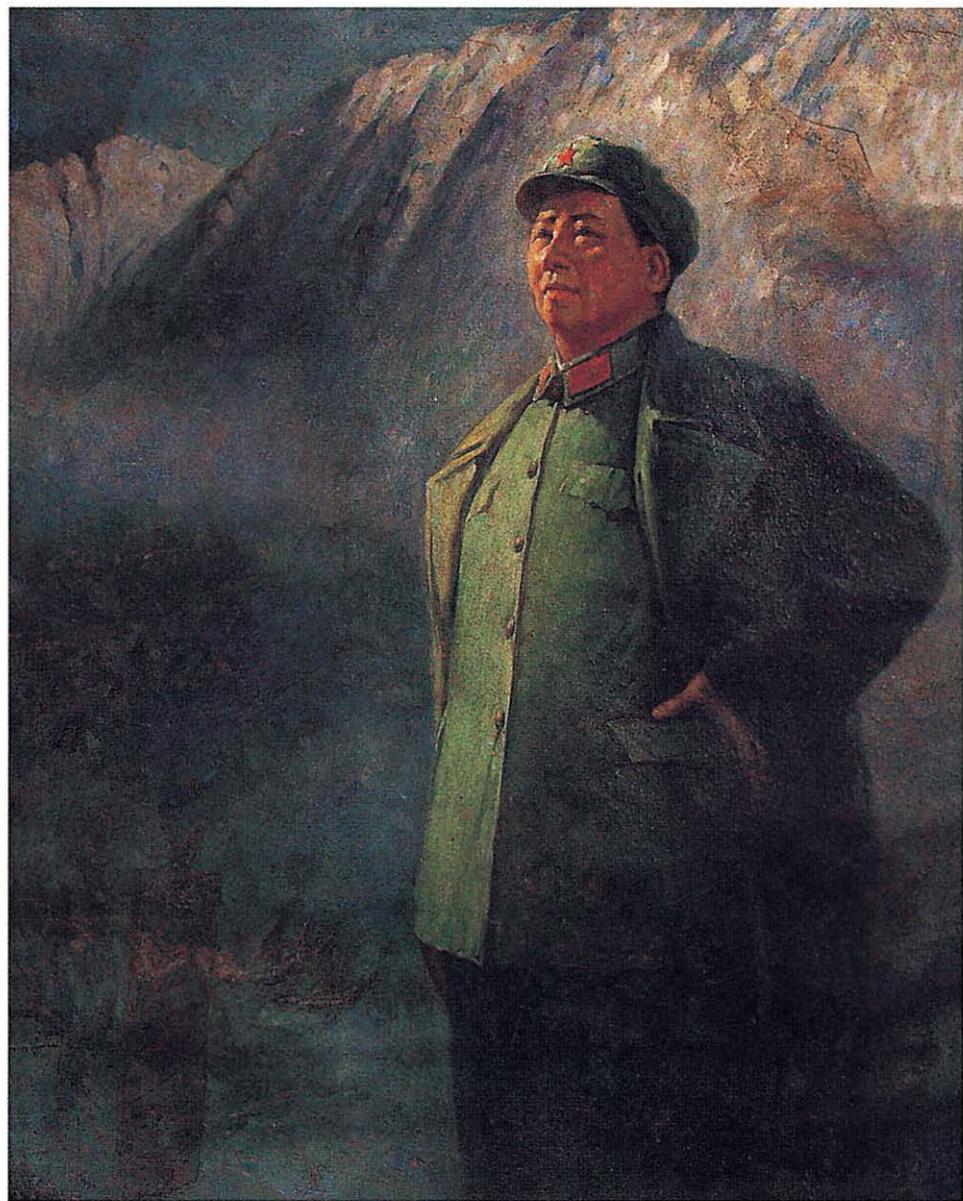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和革命群众。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和革命群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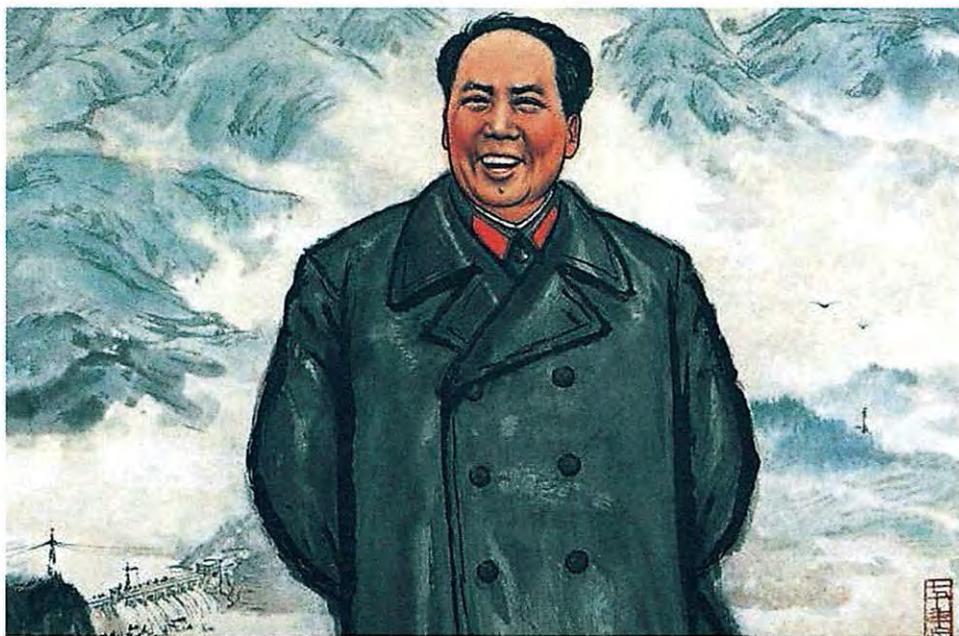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和革命群众。



《文革时期的毛泽东》（油画）



《文革时期的毛泽东》(油画)



《文革时期的毛泽东》（中国画）



人民军队（宣传画）

七绝·炮打司令部*

(1966年8月)

人民胜利今何在？
满路新贵满目衰。
核弹高置昆仑巅，
摧尽腐朽方释怀。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1]

(1966年8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1] 这是《人民日报》1966年9月5日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中引用的毛泽东的两句话。此前的8月29日，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过：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



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

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宣传画）



**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
毛泽东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宣传画）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宣传画）

对杨寅田大字报的批示

(1966年8月)

印发全会（指十一中全会）各同志。将杨寅田大字报题目用特号字，全文用老五号刊出。

关于工作组

(1966年8月)

全国的工作组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犯了普遍性的方向和路线错误。

关于北航《红旗战斗队》在国防科委 坚持斗争问题的指示

(1966年8月)

不要怕，不要让学生席地而坐，搭起棚子来，让学生闹上三个月。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大革命 中的一些具体问题通知稿的批语^[1]

(1966年9月1日)

退总理。此件不发。

毛泽东

九月一日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66年8月30日送审的通知稿上。通知稿的主要内容是：一、在运动中，对于党和国家的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必须坚决进行保护。通知稿中把这些部门和单位分为十六类，一一列出。二、对上述部门和单位，如发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破坏，必须依法处理。三、重要档案应加以封存。四、此通知发至县团级，内部掌握，不对外公布。

对傅连璋来信的批语^[1]

(1966年9月3日、12月28日)

—

送陶铸同志酌处^[2]。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

毛泽东

九月三日

二

傅医生：

前后送来各件都看到了。政治安排问题，很多人同样，现在还

[1] 本篇一是对全国政协常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1966年8月28日来信的批语。傅连璋在信中向毛泽东反映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帽子，请求给予保护。本篇二是对傅连璋12月12日来信的批语。傅连璋在这封信中讲到自从对他进行斗争以来，所有的政治待遇（包括全国政协常委的待遇）都被取消，文件不能看，报告不能听。

[2]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1966年9月3日，他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即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按主席批示，对傅加以保护。”

谈不到，等将来再说。

毛泽东

十二月廿八日

对自己的一生，要有分析，不要只见优点，不见缺点。

毛泽东又及

对中央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并告西北局的两份电报的批语^[1]

(1966年9月4日)

照发。

毛泽东
九月四日

[1] 本篇是对周恩来1966年9月4日送审的三份文件的批语。三份文件中有两件是中共中央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西北局的电报，当日分别作为中共中央文件1966年第四五一、四五二号下发。这两件电报分别指出：“中央根据民族政策，决定对赛福鼎采取保护方针。王恩茂同志正确执行了中央决定，并非包庇赛福鼎。此事可正式向群众宣布。并向北京学生们解释新疆是少数民族占多数地区，此地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是加强维汉民族的团结，防止苏修和少数民族主义者的挑拨利用。”“为了保障边境安全，不使苏修有机可乘，中央决定伊犁、塔城、阿尔泰等边境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在学校、机关、企事业等单位可以运用‘四大’进行鸣放，揭露问题。解决问题由区党委负责通过自上而下调整领导，以满足群众要求，不要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办法。特别要劝阻外地学生，不要进入这些地区进行串连。已去的外地学生，应经过说服，动员他们离开。此事望你们严格掌握。”赛福鼎，当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王恩茂，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 学生运动的批语^[1]

(1966年9月7日)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2]各同志：

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3]，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1966年9月4日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报告上。报告中说：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党委，“不是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而是“要工人农民对学生进行教育，说吃着农民的饭，穿着工人做的衣服，不能去胡闹”。“对学生不是叫他们游泳中去学游泳”，而“是说服教育不准进城”。“这是和中央对立的”。报告认为学生批判的方向是对的，“组织工人农民支援”批判对象，“这是方向的错误”。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任重，即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3] 1966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把毛泽东的批语和王效禹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等，并对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作了四条具体决定。

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1]，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2]，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谭启龙^[3]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

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毛泽东

九月七日

[1] 1966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

[2] 郭影秋，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3] 谭启龙，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对《关于长沙、青岛、西安等地 情况报告》的批示

(1966年9月7日)

林彪、恩来、康生、伯达、江青等同志：

此件请看一看，青岛、西安、长沙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然后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之外，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我看谭启龙和这位副市长的意见是正确的。

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

对四位美国专家的一张大字报的批语

(1966年9月8日)

林彪、总理、陈毅、陶铸、伯达^[1]五同志：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2]，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八日

[1]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总理，指周恩来。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外事办公室主任。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伯达，即陈伯达。

[2]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调查组1966年9月7日抄录的阳早等四位美国专家给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写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说，我们坚决反对政治、生活上的特殊待遇，坚决要求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决不容许成为修正主义分子。为此，我们要求：1. 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2. 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3. 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4. 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5. 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6. 我们的孩子和中国人的孩子受到同样待遇和严格要求。7. 生活待遇和同级工作人员一样。8. 取消特殊化。

关于驻外机关 “来一个革命化”的批语

(1966年9月9日)

退陈毅^[1]同志：

这个批评文件^[2]写得很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九日

[1]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外事办公室主任。

[2] 指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组1966年9月8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报》第九号上登载的一位奥地利人写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信。信中除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的行为表示赞赏外，还对中国派驻维也纳使馆有关人员的衣着和用车过于高级豪华提出批评，希望“向有关当局报告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与这期简报一同报送毛泽东的，还有共青团中央机关文革筹委会、临时书记处9月8日印发的《一坦桑尼亚群众来信对我外事活动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提出尖锐批评》的材料，批评我驻坦使馆在外交活动中讲排场、摆阔气。毛泽东的批语写在第九号简报上。

对中央关于国庆节挂像、抬像办法 和口号的通知稿的批语

(1966年9月)

—

陶铸^[1]同志：

标语、口号太多，是烦琐哲学，要大精简，各有十几条就够了，至多总共不要超过三十条。多了，谁也不记得，不看作一回事了。请再议削，印出交来。^[2]

毛泽东

九月十日

[1]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宣传部部长。

[2] 这个批语写在陶铸1966年9月10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1966年国庆节挂像、抬像办法和标语、口号的通知稿上。通知稿除提出国庆节挂像、抬像的三条规定外，还列举了标语60条、口号40条，共100条。毛泽东在审阅时，对标语作了大量的删减。

二

陶铸同志：

省得多了，不知送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没有？如未，请送他们议一下。^[1]

毛泽东
九月十二日

三

林彪^[2]同志阅后退陶铸同志照办。

毛泽东
九月十四日下午

凡事要思索，不宜仓猝作出决定。

[1] 这个批语写在陶铸1966年9月11日送审的通知修改稿上，修改后的标语与口号合在一起，共30条。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凡大事要征求较多同志的意见。请陶、周、任重^[1]注意。标语、口号由100条改为23条，较好，是一教训。毛又及^[2]

四

同意。^[3]

五

同意。^[4]

[1] 陶，指陶铸。周，指周恩来。任重，即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

[2] 这个批语写在陶铸1966年9月14日送审的通知修改稿上。陶铸在送审报告中写道：“遵示送文革小组讨论，又修改了一次，特再送陈审阅。”这次修改稿的标题改为《关于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挂像、抬像办法和口号的通知》，其中口号被压缩为23条。

[3] 这个批语写在陶铸1966年9月15日晨2时送审的通知修改稿上。这次送审稿对23条口号又作了个别内容上的修改。

[4] 这个批语写在陶铸1966年9月16日送审的通知修改稿上。这次送审稿上加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工农联盟”两条口号，最后定稿为25条。9月17日，中共中央将这一通知下发到县团级。

关于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一事 给林彪^[1]等的信

(1966年9月13日)

林彪、总理、陶铸^[2]同志：

卧病三天，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十四）或后天（十五）上午十时或下午五时在天安门开七十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请你主持，我不去了。^[3]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十九时

[1]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2] 总理，指周恩来。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3] 据1966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15日电讯稿报道，毛泽东于15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又一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及首都的百万师生和红卫兵。

对刘少奇《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1]的批语

（1966年9月14日）

少奇同志：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2]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十四日

[1] 这个检讨提纲修改后，改在1966年10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

[2]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对林彪^[1]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2]

(1966年9月15日)

一

很好。改了一点，请林酌定。

二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1]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2] 1966年9月15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首都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师生和红卫兵。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分别发表讲话。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9月15日晨送审的林彪讲话稿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对这个讲话稿中一段话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派。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在一起

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在一起（宣传画）

对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 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1]

(1966年9月15日)

—

同意。

二

可以由两个人讲。

毛泽东

十五日上午十点半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1966年9月15日晨2时送审的周恩来讲稿的批语。周恩来9月14日将这份讲话稿送陶铸时提出：“我仍主只由林彪同志一人讲即可，已函请主席批示。”陶铸在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我意明天还是由林总与总理两个都讲较好。请主席批示。”本篇二即是对此事而写的。9月15日下午，周恩来根据这个讲稿在接见大会上作了讲话。其中讲到，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双胜利!”“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起来的冲天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中去!”“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革命学生要尊重工农群众，信赖工农群众，相信工农群众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把革命搞好。”“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已经到来。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和勤劳的品质。”



第三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我们挥手（宣传画）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林彪、焦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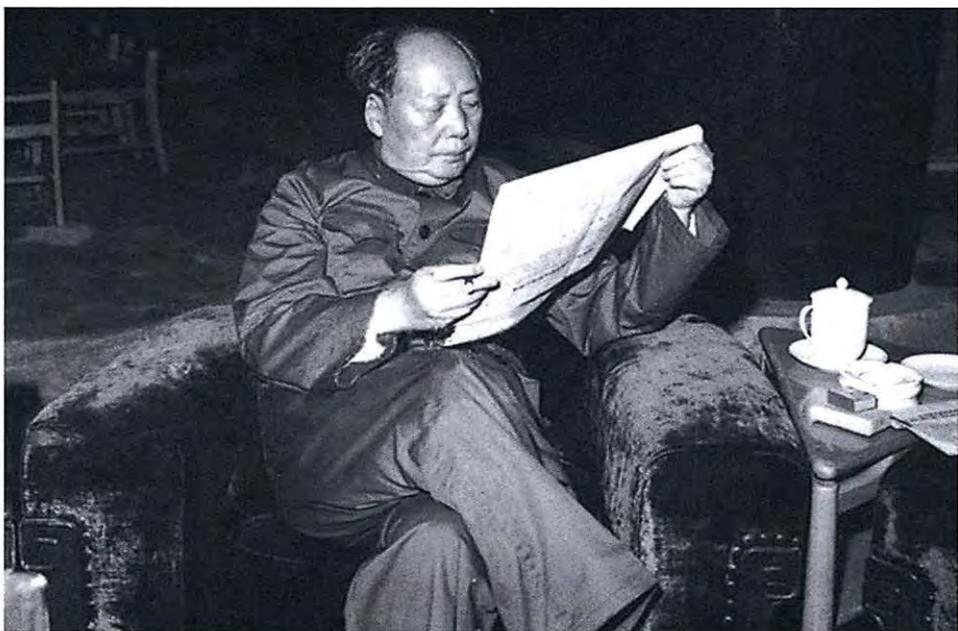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林彪等在一起。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林彪等在一起。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一起。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厅看报。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厅。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厅看报。

关于中央文革

(1966年9月)

中央有很多部没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这个部得改一改。



1966年，毛泽东在北京。

就左派队伍问题 和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1]

(1966年10月1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看左派有多少？

答：上海好一点，左派队伍大。

毛：多大？

答：工人有40万、50万、60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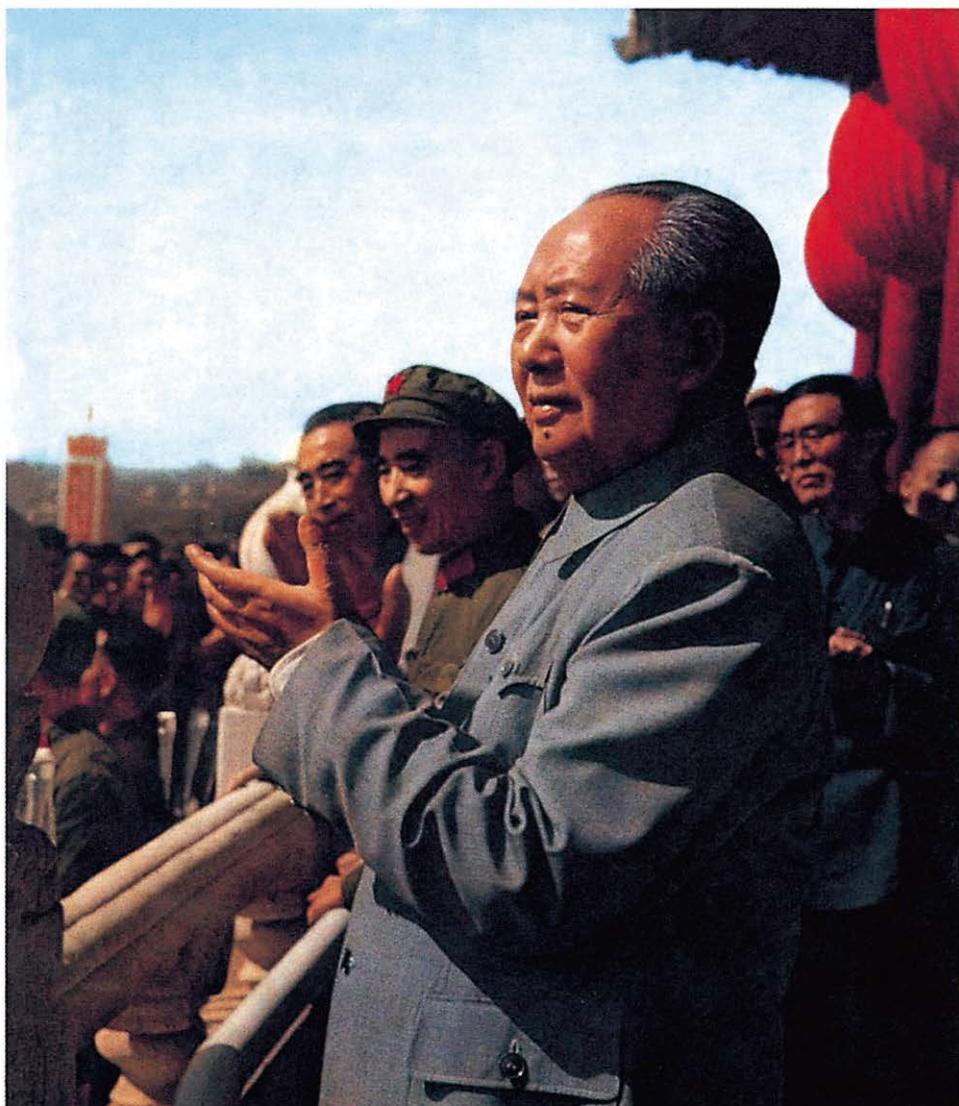
毛：左派不会多，大概占10%。

答：后期可能多一点。

[1] 这次谈话是1966年国庆节晚上在天安门上看焰火休息时进行的，张春桥1967年6月16日在上海革委会扩大会议上传达此次谈话情况时还补充说：这是指世界观的改造，不是指一般的表现，是指世界观里有较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完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更难了。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和首都人民共庆国庆节。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致意。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鼓掌致意。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宋庆龄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天安门城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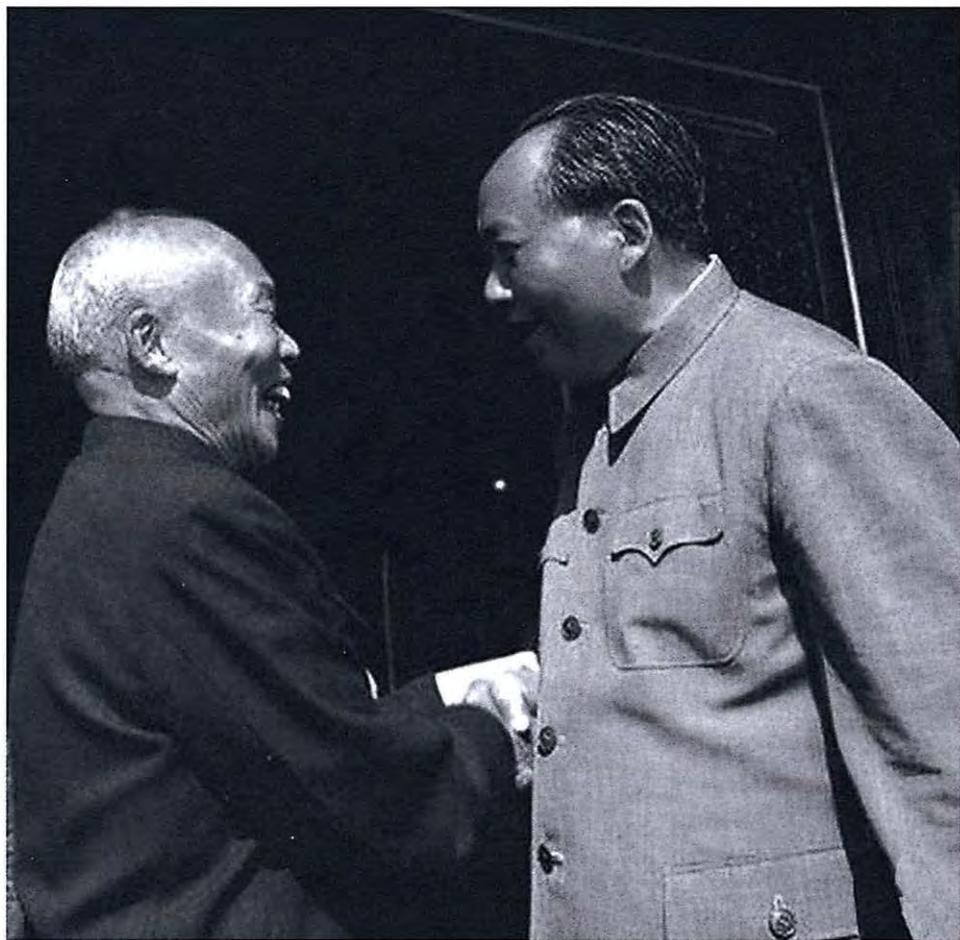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李宗仁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李宗仁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交谈。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李宗仁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交谈。



1966年10月1日，美国黑人作家领袖罗伯特·威廉在天安门城楼上，请毛泽东在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上签名留念。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签名。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越南南方女战斗英雄谢氏娇时表示，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朝鲜领导人崔庸健。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李敦白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32111英雄钻井队的代表王有发亲切谈话。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大庆工人。



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第四次检阅百万文化革命大军

毛泽东和林彪同志第四次检阅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宣传画）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和红卫兵。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林彪等在一起。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部队观礼代表。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农兵、少数民族和红卫兵代表。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红卫兵代表握手。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顾阿桃。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群众代表在一起。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接见陈少敏。



1966年10月1日，国庆游行结束时，毛泽东来到群众队伍中。



1966年10月1日晚，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来到群众中。



1966年10月1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和群众一起观看焰火。



1966年10月1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和群众一起观看焰火。



毛主席周总理和我们在一起

毛主席周总理和我们在一起（宣传画）



《红卫兵心向毛主席》（版画）

关于按期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批语^[1]

(1966年10月7日)

照样开会。惟会期三天不够，需要七天。

毛泽东

十月七日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66年10月7日11时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说：“昨天林彪同志要我们请示主席，是否主席还在考虑目前就开全国工作会议的利弊。”“如主席认为无需更动，即照通知进行。究如何为好，请主席批示。”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于10月9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

接见在京部队时的指示

(1966年10月13日)

下次接见，采取阅兵式的办法。不管多少人，解放军要统统包下来，经过训练，把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带到全国各地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人人要会唱，我也要会唱。

对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稿的批语^[1]

(1966年10月、11月)

—

即送陈伯达同志：

看过，可用。未完部分请送来一阅。看过的这几部分，有几处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建议：你讲过之后，印发给到会各同志，讨论几天，提出修改意见。

毛泽东

十月十五日下午八时半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共四个部分：（一）形势大好；（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三）去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四）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1966年10月16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这个讲话稿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陈伯达在大会上发了言。1966年11月9日，中央办公厅将几经修改后的这个讲话稿印发至县团级。本篇一是毛泽东对陈伯达送审的讲话草稿前三部分的批语；本篇二是对这个讲话草稿最后一部分的批语；本篇三是对陈伯达10月24日送审的讲话修改稿的批语；本篇四是对陈伯达11月5日送审的讲话修改稿的批语。

二

退陈伯达同志：

可用。只在第二页改了几个字^[1]。建议全文立即付印，以便一面讲，一面发给听众。

毛泽东

十月十五日夜

三

即送陈伯达同志。

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2]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二本。

毛泽东

十月廿四日廿三时

[1] 陈伯达1966年10月15日午夜送审的讲话草稿第四部分第二页说：“各地流行着一种所谓‘自来红’的谬论。宣传这种谬论的人，他们利用小孩子们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惑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毛泽东审阅时把其中的“小孩子们”改为“一部分年轻人”。

[2] 1966年10月25日，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在讲话修改稿第三部分的末尾加了一段话：“我们各地区各部门的同志，广大工农群众，广大青少年，都必须掌握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注意‘决定’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而在工作中尽自己的最大革命义务。”

四

退陈伯达同志：

第一步似以发至县、团级为宜。待县、团级以上多数干部思想通了，再往下发。究竟如何处理为好，请你们商量酌定。

毛泽东

十一月六日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和林彪第五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检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检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林彪和“革命小将”们在一起。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



伟大领袖毛泽东。



第五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宣传画）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中国画）

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24日)

你们有什么可怕的呢？你们看了李雪峰^[1]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搞串连，回来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害怕红卫兵呢？我们又没打你们。”你们就是不检讨！伍修权^[2]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应先受教育。你们思想搞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说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少奇给江渭清^[3]的信，批评了江渭清，说他蠢，他自己就聪明了？

刘澜涛^[4]：红卫兵到处抢档案，查我们的历史问题，搞得太过火了。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

刘澜涛：回去看看再说。

[1] 李雪峰，当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2] 伍修权，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3] 江渭清，当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4] 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兼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并担任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

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

(毛泽东问周恩来会议情况)

周恩来：会议开得差不多了，明天再开半天，具体问题回去按大原则解决。

(问李井泉^[1])

你们四川那个廖志高^[2]现在怎么样啊？

李井泉：开始不大通，全会后一段时间比较好了，从历史上看，他还是一贯正确的。

什么一贯正确？群众起来后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去住。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但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

把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

依我看，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议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3]，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

[1] 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2] 廖志高，当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3] 一张大字报，指的是聂元梓等人写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一个红卫兵，指毛泽东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对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运动立即风靡全国；一个大串联，指毛泽东主席曾在天安门8次接见红卫兵，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1300多万。

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哥们犯了错误。

(问李先念^[1])

你们今天会开得怎样？

李先念：财经学院说，他们明天要开声讨会。我要检查，他们不让我说话。

你明天还去检查，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李先念：明天我要出国。

你要告诉他们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不足。他们不听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

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2]。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3]不成熟，在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只是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

陶铸：大权旁落。

[1] 李先念，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

[2] 一、二线，1953年底，中央常委分一线、二线，毛泽东为二线，其余常委为一线，刘少奇主持常委会。八大时，中央设立书记处，邓小平任总书记。1959年，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分一线、二线后，中央日常事务由一线领导处理，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

[3] 马林科夫，斯大林指定的接班人，斯大林死后，一度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但很快就被赫鲁晓夫夺了权。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5年2月，改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电站部部长。1957年6月被撤职。

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可他们不但不自觉，反而和我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议就好了，可是他（刘少奇）偏要自行其是。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书记处、计委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1]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他们要办的事情我马上答应，后来，四个人又回去了，可邓小平就是不来。武昌会议^[2]我不满意，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3]，你们开了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比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以后，项英、彭德怀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皖南事变、百团大战）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还比较集中。进城以后就分散了，各搞一套，特别分一线、二线后，就更分散了。一九五三年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

[1] 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当时都任国务院副总理。

[2] 武昌会议，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对一线领导提出了严厉批评，批评了高指标、浮夸风、穷过渡、作假等现象，要求将指标调下来，但阻力很大。

[3] 北京开会，中共中央于1959年1月26日至2月2日，在北京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没有让毛泽东参加，制定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几个重要问题的说明》，中心内容是“钢产量达到二千万吨，是必须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的”。

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不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1]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没有好下场。

犯路线错误的要改，陈独秀、王明、李立三没改。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

要允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七大时，陈奇涵^[2]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他几个人都选上中央委员了。现在只走了一个王明，其他人还在嘛！洛甫^[3]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东固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他们的。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

你们有错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开的，时间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想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不要招降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如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去接近几

[1] 陆定一，曾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曾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2] 陈奇涵（1897—1981），号圣涯，江西省兴国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代表。

[3] 洛甫，即张闻天。

个右派，那怎么行呢？哪有那么干净？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1]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

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一九四九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吴晗、李达都是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都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就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导搞起来的，反康、反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样纪念呢？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反面。

康生：八大政治报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报告我们看了，这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回去打通省、市同学的思想，把会议开好，上海找个安静的地方开会，学生就让他们闹去。我们开了十七天会，有好处。像林彪同志讲的，要向他们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讲阶级斗争熄灭了，一九三九年又搞肃反，这还不是阶级斗争？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做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

邓小平〔虽然〕耳朵聋，〔但〕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说他有能力吗？

聂荣臻：这个人很懒。

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

[1] 李宗仁（1891年—1969年）字德邻，民国时期军事家、爱国将领，广西临桂（今桂林）人。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总负责人，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任国民政府副总统、代总统。1965年7月20日回国定居。

“怕”字当头的是多数。真正“反”字的还是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薄一波、何长工、汪锋，还有一个李范五。

真正四类干部^[1]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

周恩来：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

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

河南一个书记搞生产，其余五个书记搞接待，全国只有刘建勋^[2]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聂元梓现在怎么样？

康生：还是要保。

李先念：所有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都要保护。

对！

（谈到大串联问题时）

周恩来：需要有准备地进行。

要什么准备，走到哪里没饭吃？

对形势有不同看法，天津万晓棠死了以后，开了五十万人的追悼会，他们以为这是大好形势，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对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1] 四类干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将干部分成四类：（一）好的。（二）比较好的。（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类干部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2] 刘建勋，当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

(1966年10月25日)

我讲几句，讲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2]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3]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

[1] 1966年11月1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送审的这个讲话记录稿作了一些文字的修改，并批示：“退陈伯达同志。就照这样吧，我改了几个字。暂不发出。”

[2] 马林科夫，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5年2月，改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电站部部长。1957年6月被撤职。

[3] 指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1]那个时候。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2]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3]，就是上海发表的。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4]；再就是，给清华大

[1] 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这次会议讨论的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纪要内容共23条，因此简称“二十三条”。

[2] 吴晗，北京市副市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因写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受到错误批判。1969年被迫害致死。1979年3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为这一冤案彻底平反。

[3] 指《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是由江青与张春桥在上海密谋策划，由姚文元执笔起草的。

[4] 指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秀、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1966年5月25日写的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1]；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2]。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

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

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3]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

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胜利，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内。从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二一、三一、四一到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年。我们自己也是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

[1] 指毛泽东1966年8月1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

[2] 指毛泽东1966年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3] 这句话是毛泽东1966年8月12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的。

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

自从去年十一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1]，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2]，批判胡适^[3]，等等，更不用讲了。

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4]，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对。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原则上你又理解，具体问题又不得

[1] 指1951年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

[2] 指1954年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对红学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批判运动。

[3] 指1954年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

[4]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66年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

解决，是什么道理？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就根本没有开，有些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十个书记，就要有七个或者八个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为主动的。

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讲上次会议讲过的话了，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都那么快地就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我讲这么两件事。一件事是历史，讲一线、二线的问题。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

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有一位同志，他家里有四个红卫兵，就是他的儿女，分成四派，还有他们的同学，有很多人到他家来，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吧！他接触了那么一点人。另外也有接触几十个人的，也有接触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触很有益处。大的接触，一百五十万人，我们一个钟头就搞完了。这也是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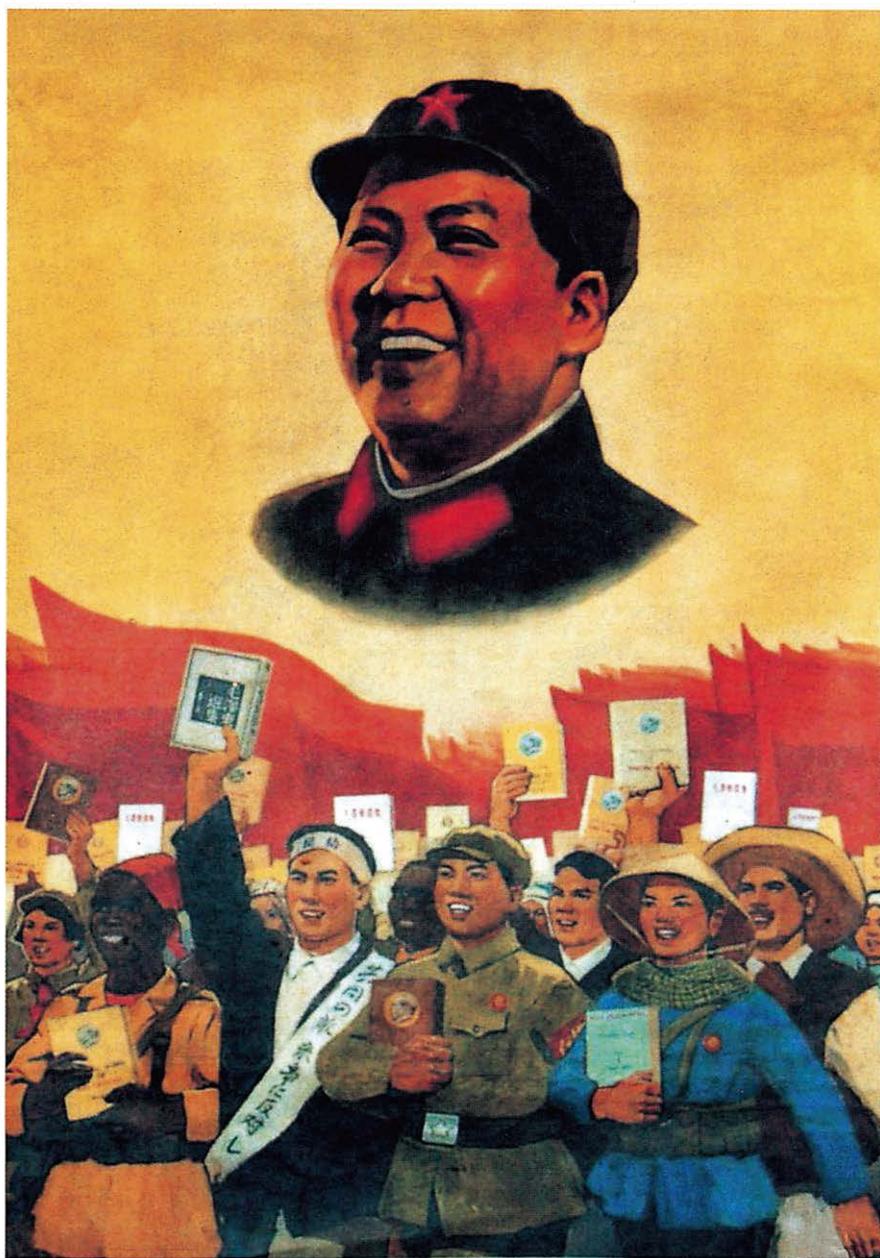
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1]。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

[1] 邓小平，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和刘少奇一起向一些单位派工作组，被指责为制定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错误的批判，后来被错误地当作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受到批判和迫害。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指导运动，是我们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做法，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一批以刘少奇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宣传画）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宣传画）



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宣传画）



东方红（宣传画）



颗颗红心向太阳（宣传画）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宣传画）



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宣传画）



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宣传画）



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宣传画）

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1]

(1966年10月25日)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我们祝贺你们的代表大会圆满成功！

以恩维尔·霍查^[2]同志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坚定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红旗。

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3]集团，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贼集团，比起你们来，他们都不过是一抔黄土，而你们

[1] 这份由毛泽东签署的中共中央贺电，是由中共代表团团长、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1966年11月2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宣读的。

[2] 恩维尔·霍查，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3] 铁托，当时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南斯拉夫总统。

是耸入云霄的高山。他们是跪倒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奴仆和爪牙，你们是敢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战斗、敢于同世界上一切暴敌战斗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在那些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当权的国家，已经或者正在改变颜色，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从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英雄的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顶住了这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逆流。你们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采取了一系列革命化的措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你们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独立自主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你们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们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们和你们都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不是那种两面派。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

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在我们一边。国际无产阶级在我们一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在我们一边。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在我们一边。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不怕孤立，也绝不会孤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一小撮反华、反阿尔巴尼亚的可怜虫，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正处在新的觉醒之中。美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害人虫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掘墓人，

他们被埋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当然，我们前进的道路绝不会是笔直的、平坦的。请同志们相信，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两党、两国人民，一定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中阿两党、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在聂荣臻同志去指挥 发射导弹时的指示

(1966年10月27日)

你是常打胜仗的，这次可能打败仗，要准备两手。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 和各大区同志的一段谈话

(1966年10月)

大家在工作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主要责任是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执行的人有各种情况，要区别对待。

关于组织外地来京革命师生进行 政治军事训练的指示

(1966年10月)

由军队负责将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按解放军的编制，编成班、排、连、营、团、师。编好后，进行训练，学习政治，学习解放军，学习林彪同志和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学习编队队形，学习队列基本动作，学习步法，每个人都要学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子，使外地的革命师生有秩序地接受检阅。



1966年11月3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1月3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1月3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1月3日，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1月3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



《毛主席和他的战友在天安门城楼上》（油画）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第六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宣传画）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周恩来同志检阅文化革命大军（宣传画）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宣传画）

对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稿的批语^[1]

(1966年11月4日、7日)

—

思想、意识两词不宜联用。

—

同意这样修改^[2]。另外有些个别字句的改动^[3]，请酌定。

毛泽东

十一月四日上午

—

去掉十一字有利。

四

这是陈伯达同志写上的，我只是同意他们写上。

五

对冯定^[1]的批判我没有与闻。

六

林彪同志：

同意这样修改^[2]。在第6页、第10页上我作了一点修改^[3]，请酌定。

毛泽东

十一月七日下午六时半

[1] 毛泽东对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有过多批语和修改。本篇一、二是写在林彪11月3日夜送审的讲话修改稿上的批语；本篇三至六是写在最后付印前送审的讲话修改稿上的批语。11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这个讲话稿印发到县团级。

[2] 林彪1966年11月3日夜送审的讲话修改稿，是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修改的。主要修改之处是在第12页上加写

了以下两段话：“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或属于这个阶级，属于这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或属于那个阶级，属于那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什么抽象的、独立的个人，是没有的。只记得自己，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是损人利己。他们为了自己发财，自己得利，而不惜让千百万人破家荡产。从为自己、为私的观点出发来看世界，就是从资产阶级的观点上来看世界，而不是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来看世界。”“我们就是需要培养为公的人。为公也有不同的阶级性。我们所说的公，是人民的公，无产阶级的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公。”在修改稿上，陈伯达向林彪报告说：“根据主席的指示，十二页作了重要的修改，请审阅，并请报告主席。”林彪向毛泽东送审时写道：“您的指示很好，我完全同意，现将伯达同志修改稿送上，请再审阅指示。”毛泽东的这句话，就是对加写的这两段话说的。

[3] 林彪1966年11月3日夜送审的讲话修改稿中，多处用了“思想意识”一词，毛泽东审阅时均作了修改，有的改为“意识形态”，有的改为“思想领域”，还有几处删去了其中的“意识”二字。为此，他还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对于这个修改稿，他所作的文字改动还有：在第11页，将“共产主义就是无私”改为“共产主义就是为公”；在第13页，将“毛主席创造了一个新型国家”改为“毛主席领导我们创造了一个新型国家”；在第14页，将“毛主席无论是在实践经验方面，在马列主义的理论方面，个人的天分方面，哪一方面都是不但比我们强，而且在世界上，现在还找不出第二个”一句中的“现在还找不出第二个”，改为“也是有影响的”；在第15页，删去了“毛主席的路线已经胜利了”一句。此外，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

[4] 冯定，1957年由毛泽东提名从上海调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哲学系教授，1964年受到错误批判。

[5] 林彪讲话修改稿在最后付印前曾再次送毛泽东审阅。这个稿子除照毛泽东1966年11月4日审改稿进行修改外，又作了一些文字方面的修改。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

[6] 林彪讲话修改稿第6页写道：“毛主席在今年三月间，修改我们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写上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重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种经典的观点，把它当成国家大事，当成政

治问题。”毛泽东阅审时，删去了其中的“我们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11个字，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四；在其中“写上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一句之前，加上了“同意”二字，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五。在第10页讲到“近年来对杨献珍、冯定的批判”处，毛泽东删去了冯定的名字，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六。

对参加接见全国各地师生、红卫兵的一些负责人的谈话

(1966年11月10日)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1]

[1] 1966年11月10日和11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这是他11月1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参加接见的一些中央和其他方面负责人说的一句话。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群众和红卫兵。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1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1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1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



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心连心——毛主席第七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宣传画）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串连问题的 通知稿和补充通知稿的批语^[1]

(1966年11月16日、12月2日)

退总理照办。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六日廿四时

[1] 本篇一写在周恩来1966年11月16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稿上。通知稿中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今年11月21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目前正在水陆交通沿线等候车、船外出串连的各地革命师生，可劝说他们返回原地”。“今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并且更好地实现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需要在今冬明春集中一切交通力量，加速物资运输”。当日，中共中央即下发了这个通知。本篇二写在周恩来12月1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稿上。补充通知稿在11月16日通知的基础上，对外地来京和在外地串连的师生、红卫兵离京与返回原地问题作出了4条具体的补充规定。毛泽东审阅时，将文中“毛主席”之前的定语“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删去。

二

退总理照办。

毛泽东
十二月二日

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学校师生的谈话^[1]

(1966年)

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2]，学三八作风^[3]，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4]，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

[1] 中共中央、国务院1966年12月31日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中，在“毛主席最近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时，向林彪同志多次提出”之后，引用了这段话。

[2] 四个第一，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3] 三八作风，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

[4] 三大纪律，指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指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对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的 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6年11月)

—

改了一点^[2]，供小组同志们参考。

二

退江青：

又有点修改^[3]，似较妥当些。

毛泽东

十一月廿八日一时

三

事实上，多少年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方面新旧斗争的变化，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文学艺术，以与旧的文学艺术相对抗。就是号称最难改革的京剧，也出现了新的作品。大家知

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毛主席则在二十多年前，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出了推陈出新的问题。推陈出新，就是要有新的、人民大众的内容，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

四

这时，我才充分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队这个形式是错误的，他们的工作内容尤其是错误的！他们不是把锋芒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反动的学术权威，而是对准革命的学生。同志们，朋友们，斗争的锋芒对准什么，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据说我们的毛主席早在今年六月间，就提出过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队的问题，可是有的同志没有请示毛主席，就急急忙忙地派出去了。但要指出，问题不在工作组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组，依靠原来的领导人进行工作，也同样犯了错误。也有一部分工作组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没有犯错误的。这就可以说明，问题究竟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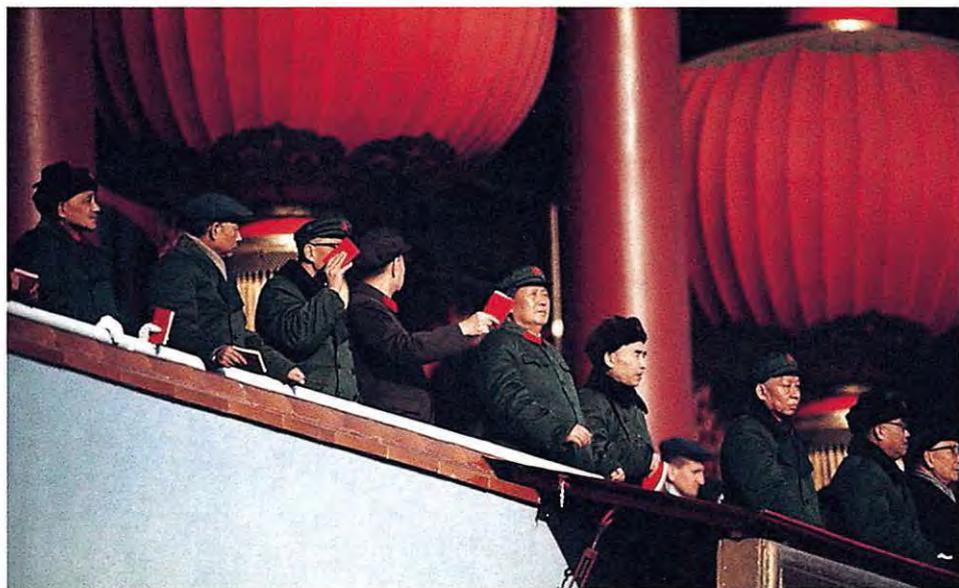
[1]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江青的这个讲话稿有过多次批语和修改。本篇一是对江青1966年11月24日送审的讲话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江青11月27日送审的讲话稿的批语；本篇三是对24日送审稿中一段话的修改；本篇四是对27日送审稿中一段话的修改。本篇三、四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11月28日，江青在北京举行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发表了这个讲话。

[2] 除本篇三外，毛泽东对江青1966年11月24日送审稿还作了一些修改。此稿第六至七页写道：“北京京剧一团的同志们，朋友们，你们给我的信，我倒是都看了。只是因为工作太忙，身体也不太好，没有能够亲自到你们团去，但是，你们团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始终是关心的，重视的。”毛泽东审阅时，将其中的后一句话改为：“只是因为工作忙一些，身体也不太好，没有能够到你们团去，但是，你们团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是关心的。”第七页写道：“北京京剧一团是首先接受我提出的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一个单位。这是你们团里一批想革命的演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和我一块努力的结果。”毛泽东审阅时，在其中的“和我一块努力”后面，加上“在别人首创的基础上加工或改制”14个字。此外，毛泽东对这个送审稿还作了一些其他文字方面的修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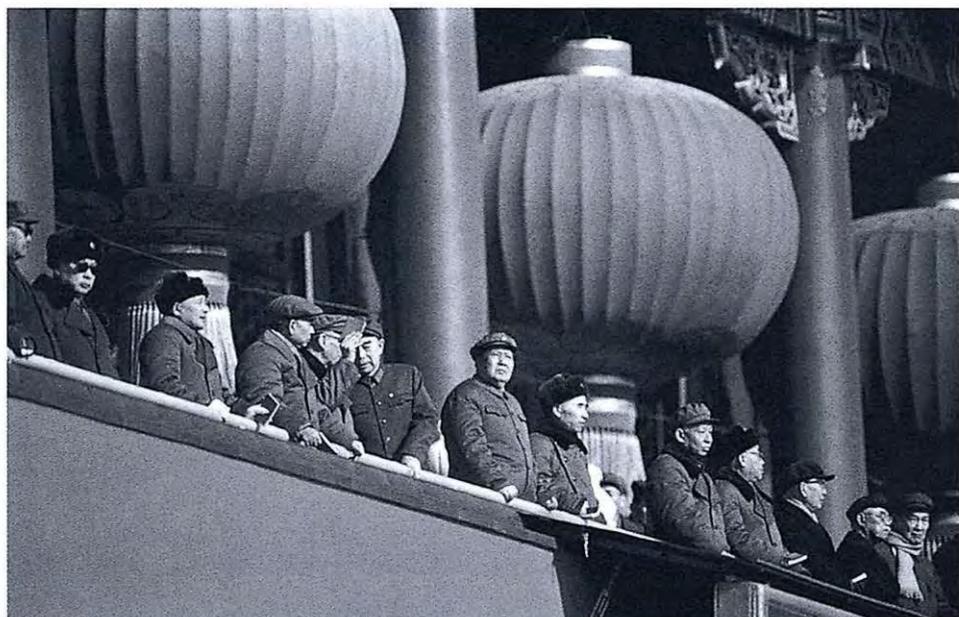
[3] 除本篇四外，毛泽东对江青1966年11月27日送审稿还作了一些修改。在第一页，将“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文学艺术”改为“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在第三页，删去了“忠于毛主席”5个字；在第七页，将“北京京剧一团是首先接受我提出的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一个单位”改为“北京京剧一团是北京首先接受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一个单位”；在第十页，将“对于我们党内的反对毛主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改为“对于我们党内以反对毛主席为首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外，毛泽东还作了一些其他文字方面的修改。



1966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25日，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25日，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25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1月25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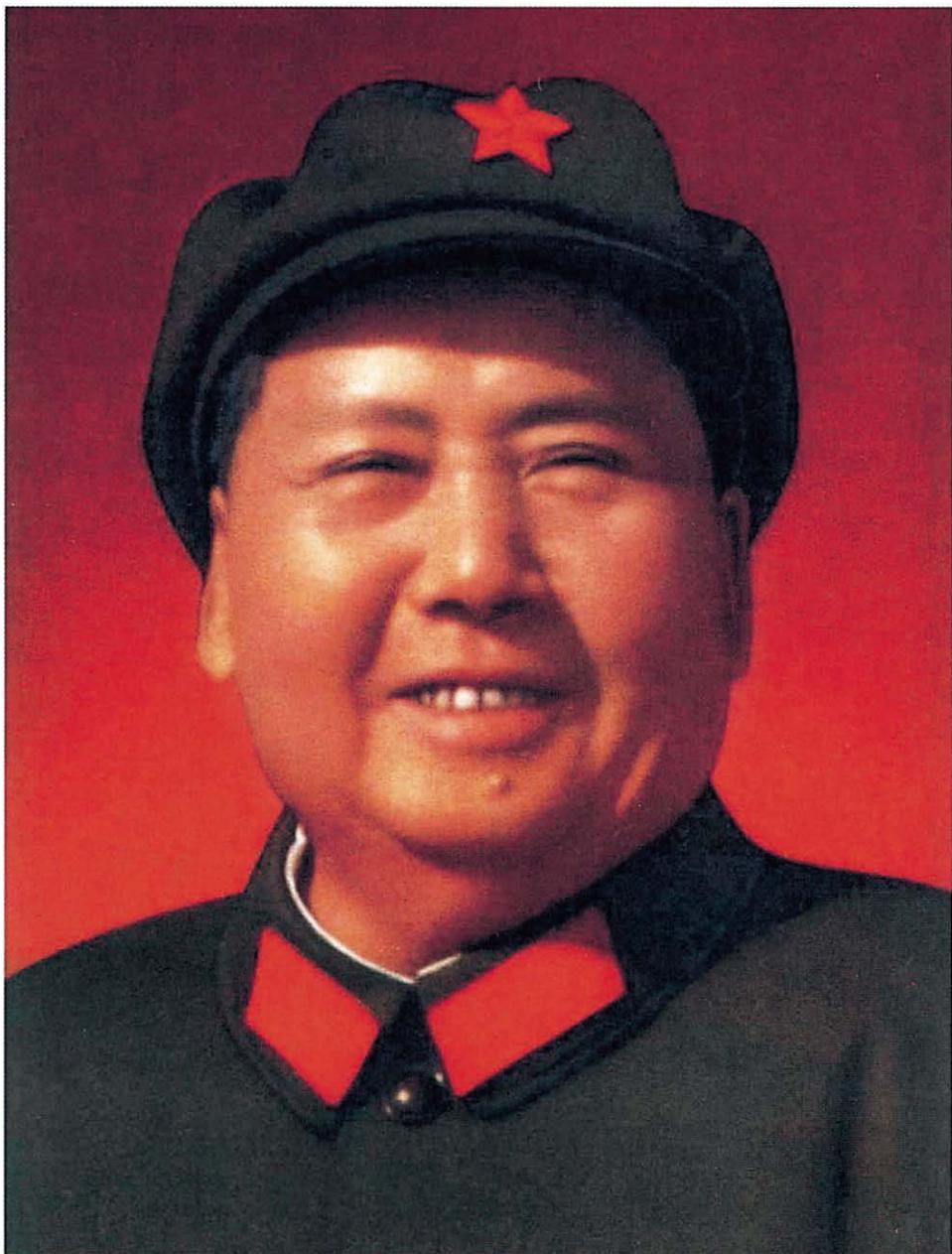
1966年11月，毛泽东接见日本毛泽东思想研究会负责人西泽隆二。



1966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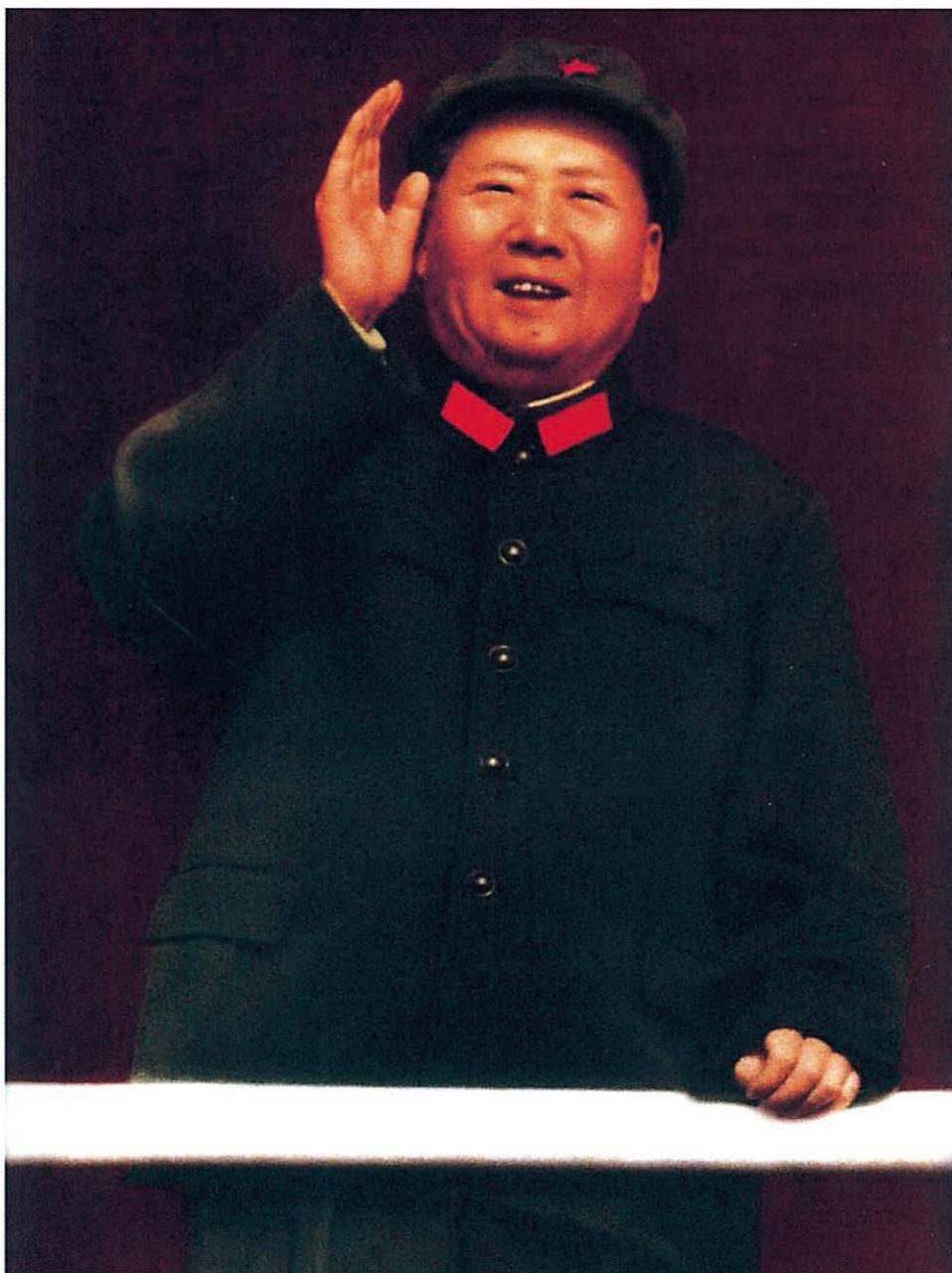
1966年，毛泽东和张春桥、江青、周恩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



1966年的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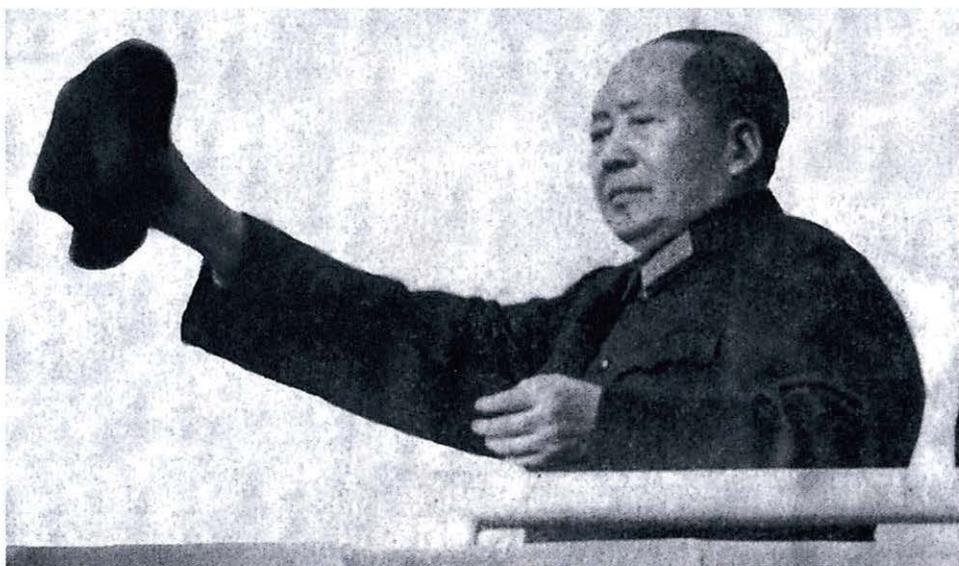
1966年的毛泽东。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光辉的榜样 伟大的创举——毛主席第八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宣传画）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油画）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宣传画）

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 二十二周年的电报

(1966年11月28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在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你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阿尔巴尼亚已经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为具有现代工业、集体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革命化措施，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大大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任务和制定的宏伟纲领，为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开辟了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阿尔巴尼亚人民正满怀信心地沿着劳动党所指引的方向，英勇地向前迈进。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人民，一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红旗，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阿尔巴尼亚劳动

党和人民，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英雄的阿尔巴尼亚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坚强堡垒。

中阿两党、两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这种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让我们共同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红旗，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起，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决进行到底。

祝中阿两党、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要支持群众的革命串连

(1966年11月)

这是很重要的事，应该大搞，没有了不起的问题，要支持群众的革命串连，要搞就大搞，不会没地方住的。

对中央关于刘澜涛^[1]出狱问题的复电稿 和张闻天有关证明材料的批语^[2]

(1966年11月、1967年2月)

—

照办。

二

张闻天^[3]关于一九三六年处理北方局领导人，要求中央批准履行“简单手续”，以便早日释放关在北平监狱中的干部，给中央的信及附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军委常委及中央文革小组）。

汪^[4]办。

[1] 刘澜涛，1931年在天津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被捕。1936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同薄一波等共61人履行简单手续后集体出狱。“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1978年被平反。

[2] 周恩来1966年11月24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送上西北局来电和刘澜涛来信”，“因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现拟电

如另纸。如妥，请批发”。周恩来代拟的中央给西北局复电指出：“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本篇一就写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本篇二写在张闻天1967年2月18日给毛泽东等的信上。张闻天在信后附送了一份证明材料。材料中说：“刘少奇初去北方局（1936年春）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他信中提议即办此事。”“他还附带寄来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要什么代价就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的工作干部问题，岂不很好”，“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组部的报告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的出狱手续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3] 张闻天，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负总责。

[4] 汪，指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大会》新闻稿的批语^[1]

(1966年12月3日)

退总理：

已作修改，请再酌。

毛泽东

十二月三日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66年12月2日送审的新闻稿上。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这一报道已经文革小组通过，并经林彪同志同意，现送请主席审批。在第7、9、13页中，有三处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适，请主席批告。”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三处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等部门的一些领导人的名字。这篇新闻稿发表在1966年12月4日《人民日报》上。



在毛主席領導下勝利前進！

在毛主席领导下胜利前进！（宣传画）



在毛主席的指引下胜利前进（宣传画）



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宣传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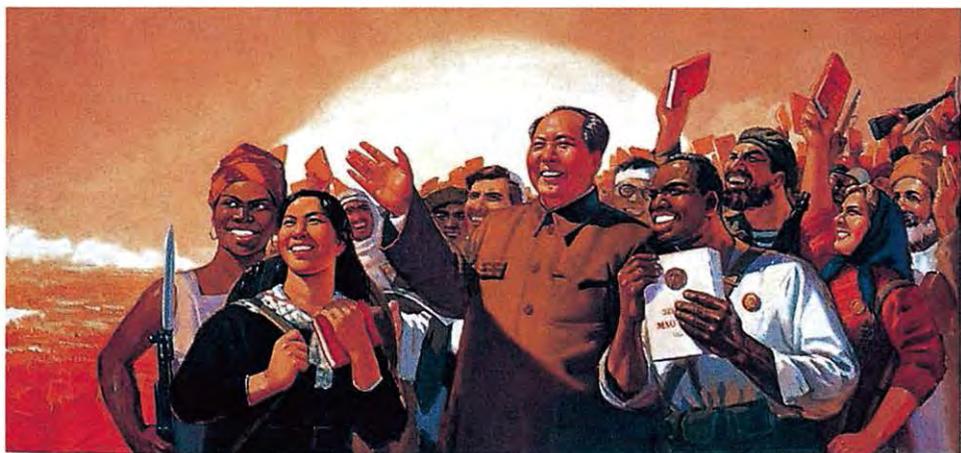
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宣传画）



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宣传画）



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宣传画）



跟着毛泽东永远闹革命 跟着毛泽东世界一片红

跟着毛泽东永远闹革命 跟着毛泽东世界一片红（宣传画）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前进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前进（宣传画）



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宣传画）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宣传画）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宣传画）



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宣传画）

讨论“工矿十条”时的讲话

(1966年12月6日)

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和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

对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征求意见稿的批语^[1]

(1966年12月15日)

退总理办。

请林彪^[2]同志主持开会通过，旋即发出。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五日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66年12月13日给毛泽东、林彪的送审报告上。周恩来写道：“通过这一文件的手续，请主席考虑，是在主席处约集常委和文革小组的少数同志一谈，还是仍采用上次方式请林彪同志主持召集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一议，究以何者为好，请主席批示。”周恩来送审的中共中央意见共十条：一、坚决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狠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二、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二十三条的原则进行。必须是群众当家做主、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一般不派工作队。可以考虑派些少而精的观察员。三、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四清”问题和“四清”复查的问题。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文化大革命也要纠正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贯彻实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四、在农村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逐步做到团结95%以上的群众，团结95%以上的干部。五、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如不称职，可以随时改选或撤换。经过群众讨论，健全或改选领导生产的班子，负责生产、分配、收购、供应工作。六、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参加民兵。在农村中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一般不要担任红卫兵的领导职务。在外地工作和学习的地富子女，不要回原籍进行串连。要像土改时那样，采取回避政策。七、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农村文化大革命，但不要包办代替。在斗争中，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坚持文斗，不要武斗。防止坏人挑起宗派斗争。八、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向领导上提意见、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不许打击报复，不许扣工分。因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破坏分子”等的革命群众，应当平反。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专政的对象，绝不允许他们造无产阶级的反，绝不允许他们造贫下中农的反。九、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半农半读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应当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根据具体情况，妥善安排。农村小学的文化革命，和所在社、队一起搞，由所在社、队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十、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经过文化大革命，把农村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12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文件。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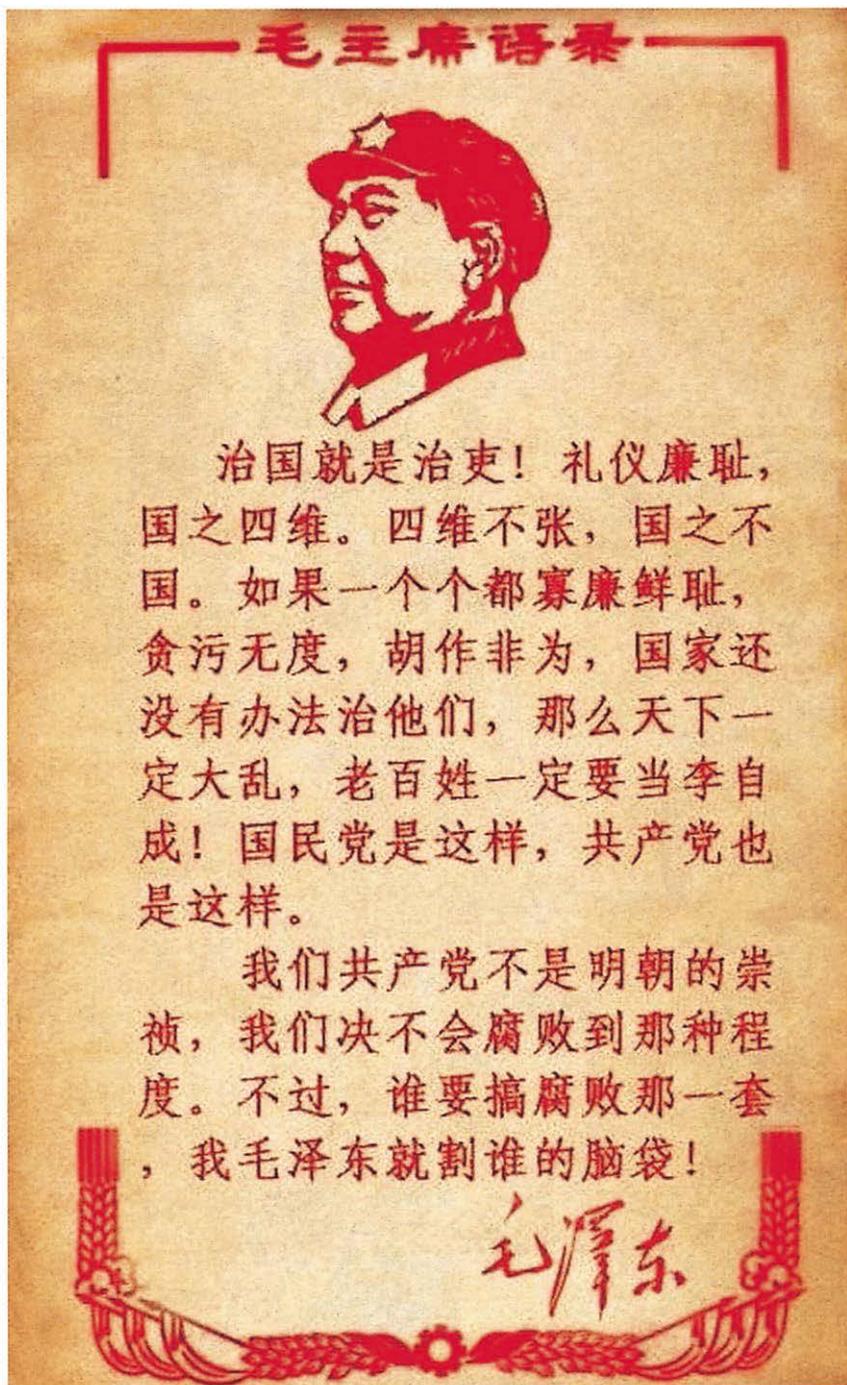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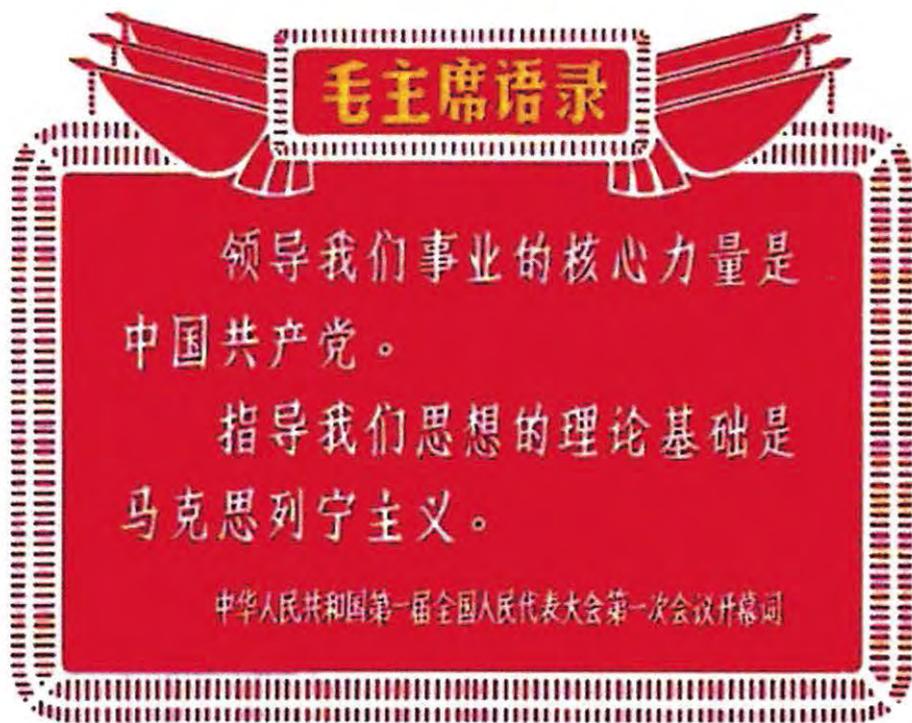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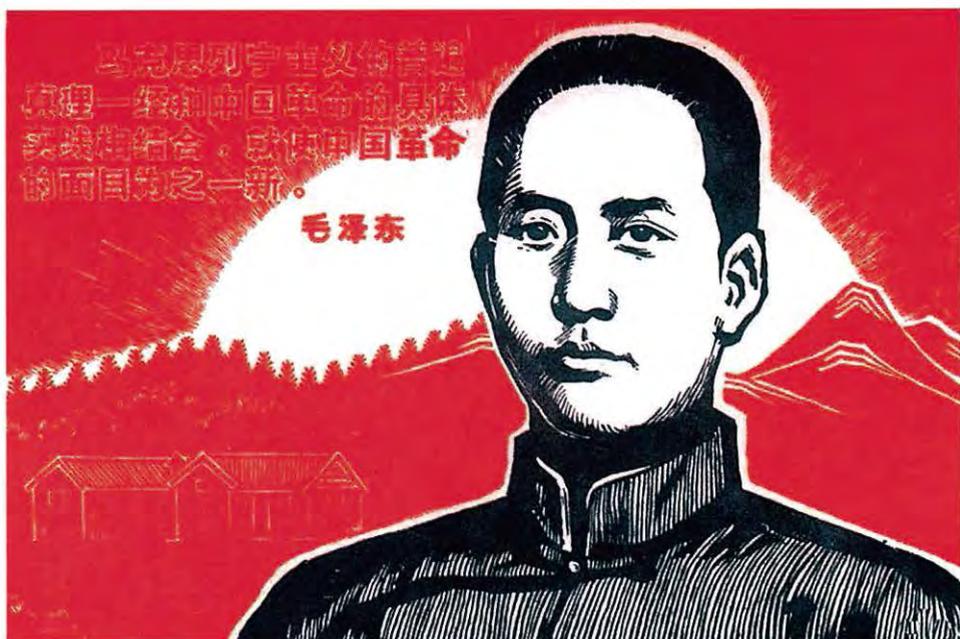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的立场，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
毛泽东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毛泽东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毛泽东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毛泽东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宣传画）



要斗私，批修。（宣传画）



人民万岁！（宣传画）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宣传画）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宣传画）

关于不要公开引用 《炮打司令部》等的批语^[1]

(1966年12月25日)

关锋同志：

都不要引用。

毛泽东

十二月廿五日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关锋1966年12月24日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江青写信说，“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稿，引用了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还引用了主席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批注”。“请您考虑引用主席这些话，公开发表出来，是否妥当”。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关锋的这封信上。《红旗》杂志1967年第一期发表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其中没有引用毛泽东的大字报和批注。

对李雪峰在华北局机关的 检讨要点的批语^[1]

(1966年12月26日、28日)

—

伯达^[2]同志：

此件^[3]不知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都有没有？请你们议一议，此件是否是正确的，是否有发给各地作参考之用的价值？因为各地很多同志至今还没有如实地诚恳地作自我批评的决心，极有帮助他们的必要，你看如何？

毛泽东

十二月廿六日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1966年12月16日在华北局机关的检讨要点的批语；本篇二是在李雪峰12月27日送审的这个检讨要点修改稿上的批语。

[2]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3] 指李雪峰1966年12月16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的检讨要点，主要是检讨他从6月初至7月中旬大约50天时间内，在领导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所谓方向、路线错误。12月2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李雪峰的这个检讨要点。

二

退李雪峰同志：

修改得好，可照此发出。

毛泽东
十二月廿八日

对黑龙江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 报告的批语

(1966年12月26日)

陈伯达同志：

请你和小组同志们看一看这个文件^[1]是否可以转发到县、团级作参考材料用。我看似乎比雪峰同志那个检讨^[2]还要好一些。文尾所说附件^[3]还未收到。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

[1] 指中共黑龙江省委1966年12月23日给中央并东北局的报告。报告中说，我省于11月14日到12月7日召开了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集中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和怎样正确对待自己这三个主要问题。会议分为四段：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发扬民主，鸣放辩论；打通思想，统一认识；总结会议，安排工作。每段各有重点又互相联系，步步深入。打通思想，挽救干部，纵贯会议始终。整个会议过程，都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过程。12月29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报告转发到县团级党委参考。

[2]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1966年12月16日在华北局机关的检讨要点。

[3] 指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省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路线错误的检查和今后运动意见》。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宣传画）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宣传画）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宣传画）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宣传画）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宣传画）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宣传画）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宣传画）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宣传画）



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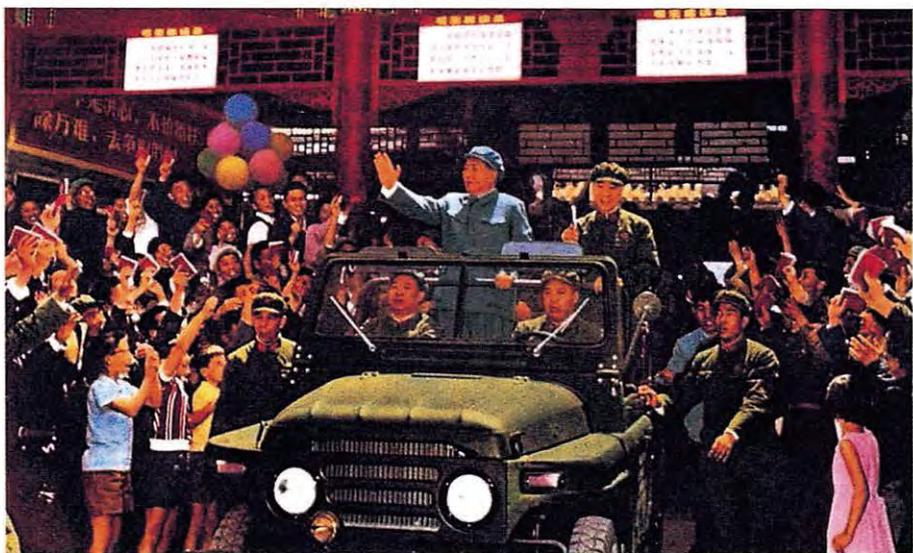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宣传画）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宣传画）



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伊尔根 1964.11.11. 1964.11.11. 1964.11.11.

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宣传画）

给周恩来的信

(1966年12月27日)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做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做法不好。这种做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大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对黑龙江省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请示报告^[1]的批语

(1966年12月28日)

伯达同志：

(一) 应复电，同意按他们意见去做；(二) 请省委在再做一段工作，取得更多经验后，写出具体条文若干条，报告中央。

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十二月廿八日

[1] 指中共黑龙江省委文革办公室1966年12月25日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急需明确的几个问题给中央文革小组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当前随着城乡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多数城市街道的文化大革命也将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有许多问题急需明确。主要是：一、街道运动的重点。我们意见应该是斗争党内（街道办事处以上的负责干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二、街道居委会的主任，我们认为不能算作当权派。三、在街道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认为应该依靠工人、贫农、下中农家庭出身的职工家属和革命群众，团结其他劳动人民。四、街道文化大革命要结合“四清”进行，市委、区委可以派人巡视，了解情况，但不予干涉、领导。五、街道中的阶级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些不良分子已参加并把持了群众组织，对他们采取什么政策为好？

对《林彪同志给浙江省军区的 指示》的批示

(1966年12月29日)

此件应发到全军营以上各级机关去。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赞扬参加接待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 解放军指战员的工作

(1966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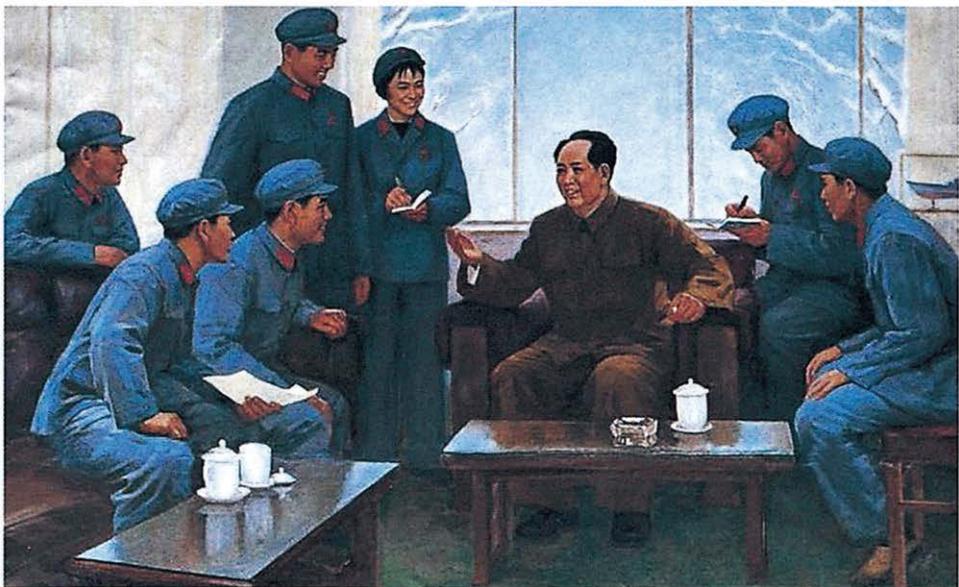
你们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作做得很好。



《毛主席指示我们大办民兵师》(油画)



《淳淳教导》(油画)



《亲切的教导》(油画)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宣传画）



向解放军学习 向解放军致敬（宣传画）

关于复员转业军人参加 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指示

(1966年12月)

(一) 一切复员转业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和其他名称的单独组织，只能参加所在单位文化革命组织。(二) 不准冲进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连和散发传单。(三) 所有转、复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协助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四点指示

(1966年12月)

一、大家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接受群众的批评，并进行自我批评，引火烧身。

二、大家要挺身而出，向群众解释政策。戴高帽子、抹黑脸的，脱帽洗脸，立即上班工作。

三、从长远利益出发，团结多数。牛鬼蛇神就是地、富、反、坏、右少数。有些人就是犯了严重错误，还得挽救他，使之改过自新。不然，怎么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呢？

四、说服干部，使他们懂得，不要人人过关，都搞得灰溜溜的，两个挺身而出，不要怕字当头。敢字当头，最大的问题也能解决。怕字当头，价钱越来越高。

在文化大革命中学会大民主

(1966年12月)

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我们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要学会大民主。



革命委员会好

革命委员会好（宣传画）



革命委员会好

革命委员会好（宣传画）

要保护和支持左派， 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

(1966年)

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1]

[1] 《人民日报》1967年6月11日发表《〈二月提纲〉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黑纲领》(署名任立新)的文章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句话。文中说：“毛主席在开始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多次指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

和林彪的一段谈话（摘录）

（1966年）

林彪（以下简称林）：现在全国都在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我不愿照抄照传，要突破，不要迷信，要有新的论点，新的创造。

林：要以毛泽东思想做种子。

毛：好。

林：不能满足于经济建设，要搞精神建设。

赠叶剑英联

(1966年)

诸葛一生唯谨慎；

吕端大事不糊涂。



读毛主席著作 做红色接班人（宣传画）



干一辈子革命 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

干一辈子革命 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宣传画）



毛泽东思想指方向 万里长空不迷航

毛泽东思想指方向 万里长空不迷航（宣传画）

1967



1967年，毛泽东在北京。

关于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1967年1月1日)

1. 今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红旗》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

2. 要抓四个重点。北京、上海、天津、东北。责任是在造反派身上，要团结多数，造反派队伍要超过一倍以上。

3. 上海很有希望，许多学生、工人、机关干部起来了，这是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4. 红卫兵要向解放军学习，一定要朴素。

祝你们明年过社会主义关！

对刘少奇关于北京建工学院 红卫兵要他去公开检查的信的批语^[1]

(1967年1月6日)

总理：

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2]。

毛泽东
一月六日

[1] 1967年1月5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说：“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来信，要我在1月7日4时以前到该院作公开检查。另有该院‘八一团红卫兵’来信，也要我到该院作检查。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毛泽东阅信后，写了这个批语。

[2]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67年1月7日凌晨接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代表，制止了他们逼迫刘少奇到该院作检查的行动。

关于陶铸问题的指示

(1967年1月8日)

陶铸的问题我没有解决了，你们也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以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上，在报纸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的镜头是陶铸安排的。（有人插话：陶铸到处开空头支票，每次接见都讲，来京都想见毛主席，很好。我想主席会见你们的。今年不见明年一定见。用这个来将主席的军，搞两面手段，自己落好。）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干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能管了。（有人插话：陶铸非常坏，新华社去年十七周年有一张照片，有五个人，毛主席、刘少奇、邓小平……邓小平的身子是陈毅的身子，把陈毅的头割掉，换上邓小平的头。）

在中南局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假的，没这回事。树立自己的威信，打倒中央。希望你们开会能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

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1]

(1967年1月9日)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号造了反，《解放日报》六号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选登。《文汇报》五日《告全市人民书》^[2]，《人民日报》可转载，电台可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导，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纸，依我说封了好，但报还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

搞一场革命，定要先造舆论。“六一”《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唐平铸换了吴冷西^[3]，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为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文汇报、解放日报两个报社夺权问题的谈话。1967年1月4日，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在该报发表《告读者书》，宣布接管《文汇报》；1月6日，解放日报社“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在该报发表《告读者书》，宣布接管《解放日报》。

[2] 指1967年1月5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11个造反组织在《文汇报》上发表《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1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3] 吴冷西，1957年6月至1966年5月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人民日报》被夺权后，由唐平铸接任。

《人民日报》过去骗人^[1]，又未发表声明。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

我们报纸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让那些人住那里吃饭，许多事宣传部、文化部都管不了，你^[2]我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一九二〇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哪有经费、印刷厂、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我们要与各种人，左、中、右都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样干净，我向来不赞成。（有人反映吴冷西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他们舒服了，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留在岗位上让群众监督。

我们开始搞革命，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青年时

[1] 《人民日报》在大跃进期间发表了一系列浮夸和错误的文章，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中说：“到了（一九五八年）五月间的八大二次会议，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我主持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六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一九五八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

[2] 指陈伯达，当时任中央文革组长。

《共产党宣言》也未看过。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是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机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

(1967年1月9日)

我们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只有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没有机关干部积极投入运动是不行的，好多重要问题靠机关干部亲自揭露。揭发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这个政府过去是由上面派去的少数干部和下面的绝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得了政府，这就很容易产生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

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 两篇电讯稿的批语

(1967年1月10日)

伯达同志及小组同志们：

(一) 此两件^[1]很好；(二) 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2]，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之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毛泽东

一月十日上午五时

[1]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江青1967年1月10日报送的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文汇报〉〈解放日报〉记者评述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这两篇电讯稿发表在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等报刊上。

[2] 这个贺电1967年1月11日发出，载于1月12日《人民日报》等报刊。

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1]不要发了，上海这个^[2]就很好。但需要写一篇解释文章^[3]。又及

[1] 指陈伯达、江青1967年1月9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这个通知后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7年1月13日印发，所署日期为1月11日。

[2] 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造反派组织1967年1月9日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紧急通告》。

[3] 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

对《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 贺电》等五份材料的批语

(1967年1月11日)

—

总理、伯达、江青同志：

两件^[1]及另三件^[2]已阅，很好。请林彪同志主持，在今日下午或明天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有文革小组及其他某些同志参加，将五个文件讨论、通过，然后发出。如同意，请告林彪同志。

毛泽东

一月十一日上午二时

[1] 指周恩来等1967年1月11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的贺电稿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稿《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均发表在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上。

[2] 指陈伯达、江青1967年1月9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稿和中共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稿。这三件的日期均署为1月11日，1月13日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发出。

二

同意这三个文件^[1]，一并在今天或明天的政治局会议通过。

毛泽东

一月十一日二时

[1] 即本篇一中提到的另三件。

对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 指向军队的通知稿等三个文件^[1]的批语

(1967年1月12日、13日)

[1]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代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的三个文件：一、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稿。通知稿写到，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有一些地方党委，借保证党和国家机密安全及党内文电正常传递为名，把文化大革命中整革命群众的材料塞进军事机关，甚至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事机关，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党纪国法绝不允许的。1967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通知。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稿。规定稿指出：“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为此，作出依法惩办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六项具体规定。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这个规定。三、中央军委1967年1月7日关于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稿。通知稿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曾三令五申，军队（包括医院、疗养院、招待所等）决不能成为防空洞，窝藏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庇护那些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以及逃避群众斗争的人。但是，至今仍然有一些单位没有这样做，甚至有的参与了压制、打击和镇压革命群众的行动。”“各级党委对此必须引起严重注意，立即采取坚决措施，杜绝类似情况的继续发生。”

一

同意。

二

恩来^[1]同志：

因是重要文件，应当由政治局通过，请你酌办。^[2]

毛泽东

一月十二日下午五时

三

已请总理酌处。^[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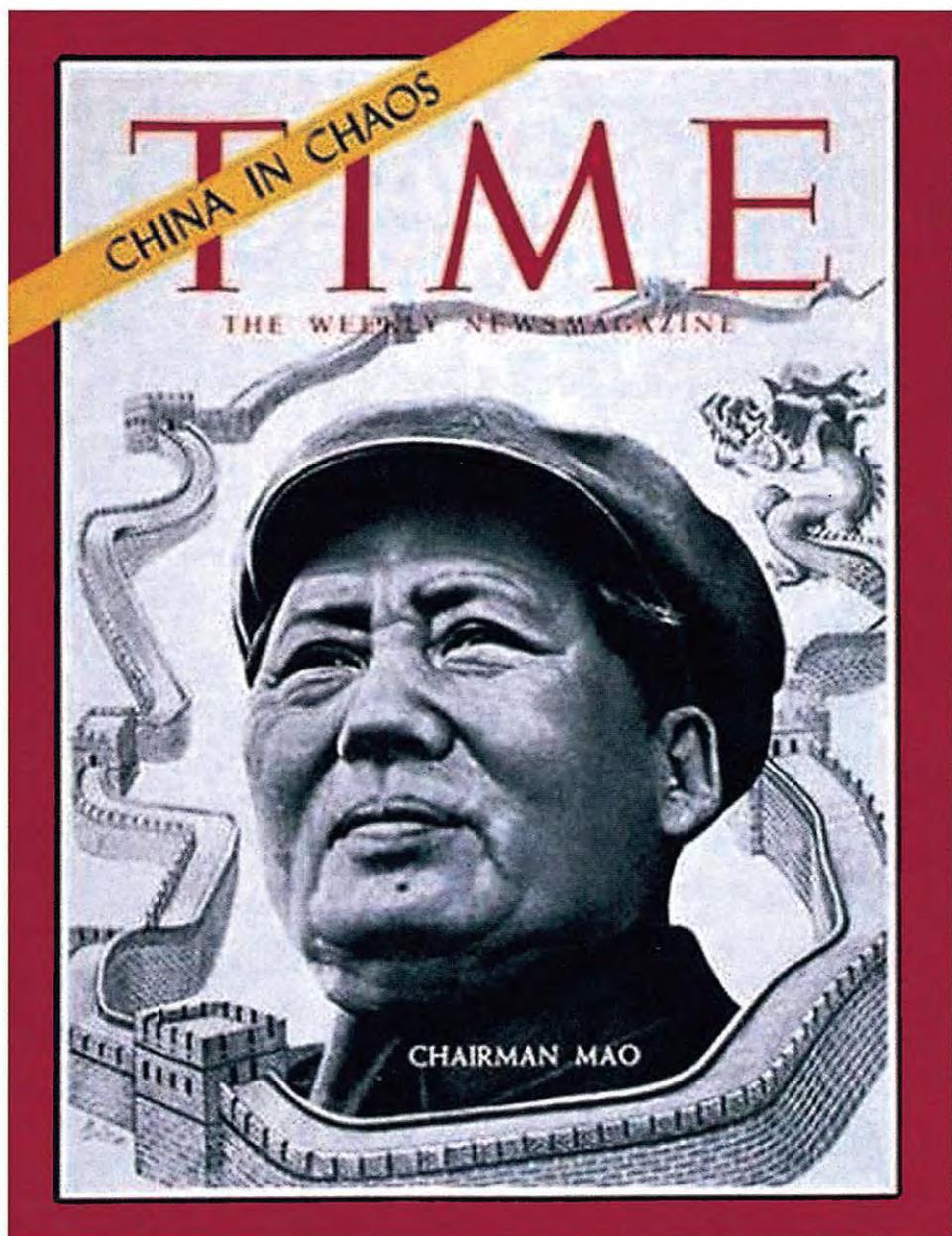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月十三日

[1] 恩来，即周恩来，当时任国务院总理。

[2] 本篇一、二两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1967年1月12日为送审这三个文件给林彪的报告上。

[3] 这个批语写在陈伯达、江青1967年1月12日为送审这三个文件给毛泽东的报告上。



1967年1月13日，“文化大革命”正在神州大地上风起云涌。毛泽东第七次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对《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批语^[1]

(1967年1月14日)

伯达同志：

写得很好。

毛泽东

一月十四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1967年1月14日送审的这篇文稿上。陈伯达送审时在文稿上写有：“王力和关锋两同志给《红旗》写了一篇评论，请顺阅！”王力、关锋，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文，后以本刊评论员的名义在1967年1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上发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67年1月16日)

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

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

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

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

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

关于将贵州各方代表找到北京 研究问题的批语^[1]

(1967年1月21日)

总理^[2]：

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若〈约〉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一日

每一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1967年1月20日给总政治部并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上。电报反映了贵州某造反派负责人及其总部的若干问题，请求对他们实行专政。

[2] 总理，指周恩来。

在延边自治州党委要求中央文革小组 去电制止冲突报告^[1]上的批语

(1967年1月21日)

总理^[2]：

应当把延边反革命派手中的权力夺过来，请你部署一下。毛远新^[3]去延边工作一个月，那里大有起色。他今天去哈尔滨，如尚未走，可找他谈一下。

毛泽东

一月廿一日

[1] 中共延边自治州委1967年1月19日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东北局、吉林省委的这个报告说，18日下午3时，延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司令部”系统同延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大军”因为《延边日报》的接管问题发生武斗，已造成伤亡，规模很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州委三次派人到双方做工作，要求他们派出代表协商解决，均未成功。现在他们不信任州委，州委无法进行工作，事态发展又十分严重，急请中央文革给双方来电话或电报，制止冲突。

[2] 总理，指周恩来。

[3] 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当时是“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

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1]的批语

(1967年1月21日)

林彪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

毛泽东
一月廿一日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2]，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又及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党委1967年1月21日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并中央军委报告说，“顷接安徽军区报告，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向安徽军区提出，廿二日到廿三日，在合肥召开15万到20万人大会”，“要安徽军区派出三百到五百名部队警卫会场。他们提出，如派部队就是支持文化大革命，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军区廿一日十四时前答复。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

[2]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1967年1月23日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对广播系统夺权的指示

(1967年1月23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内部又要分裂，内部争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掌了权，又分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结主义，不搞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要善于和他们团结。和反对自己的人不能合作，我就不赞成。内部有分歧，应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有不同意见可以商量解决。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权

(1967年1月23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这场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十七年来猖狂进攻的总反击，这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对张春桥来电请示夺权问题的答复

(1967年1月23日)

如果权落在右派手中，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权。

对《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 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稿的批语^[1]

(1967年1月)

照发。

[1] 这个批语写在1967年1月21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稿上。决定稿根据毛泽东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精神，作出了五条指示：（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二）积极支持广大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三）坚决镇压反对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五）在全军深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这个决定。

要节约闹革命

(1967年)

—

要节约闹革命。^[1]

—
—

要进一步节约闹革命。^[2]

[1] 《人民日报》1967年1月26日发表的社论《节约闹革命，保护国家财产》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社论写道：“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节约闹革命。’”

[2] 《人民日报》1967年8月26日发表的社论《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社论写道：“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最近又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要进一步节约闹革命。”

关于研究军队夺权范围问题的批语^[1]

(1967年1月26日)

林彪同志：

此件反映群众提出，究竟哪些机关可以夺权，哪些不能夺权；夺了权的人们对待不同意见的群众应取什么态度（应争取多数，不能排斥）。请加以研究^[2]。

毛泽东

一月廿六日

[1] 这个批语写在全军文化革命小组1967年1月25日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五号上。

[2] 1967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规定指出：（一）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有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有尖端技术试验任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在这些单位中，哪些要夺权，哪些不需要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二）夺权必须是由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进行，不准联合本单位以外的革命组织参加夺权。（三）各院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警卫、通信、练习、勤务和运输分队的权不能夺，也不准参加夺权。（四）除第一条规定可以夺权的范围以外，其他一切大小单位都不准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进行夺权。

对军委八条命令稿 和中央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7年1月、2月)

—

所定七条，很好，照发。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六日

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

冲击领导机关问题。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

此文件经过讨论修改后，再发出。

来北京开会的同志，停一周后再回去。

又及

二

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八日

三

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四

总理：

同意，照办。

毛泽东

二月二十日

五

照办。

[1]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1967年1月25日送审的中央军委命令稿共七条。1月26日，毛泽东审阅时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一。1月28日，根据毛泽东批示修改为八条的中央军委命令稿再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又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二；对这次命令稿中根据毛泽东1月26日批示内容写成的第五条，毛泽东又作了修改，修改后的文字，即本篇三。经毛泽东两次批示修改后的中央军委命令稿指出：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

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2月3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将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通知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四。在这个通知稿开列的“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的机关名单中，毛泽东加写了“各级银行”。2月22日，周恩来又将中共中央通知修改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五。中共中央通知下发时，日期署为1967年2月21日。通知指出，中央认为，军委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为此，通知还作了五点具体说明，并要求各地将此通知连同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所有基层单位普遍张贴。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1月27日)

一、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上去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二、老干部的多数到现在对文化大革命还不了解，多数靠吃老本，过去有功劳要很好地在这次运动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要立新功，要立新劳。要坚决站在左派方面，不能和稀泥，坚决支持左派，之后在左派的接管和监督下，搞好工作。

三、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细分，应该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

四、夺权前的老干部和新夺权的干部要共同搞好业务，保守国家机密。

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1967年1月27日)

一、我认为十三个军区不要同时搞，要有先有后。

二、地方文化大革命正在猛烈开展，夺权斗争还在剧烈进行，我们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进行夺权斗争，因此军队和地方文化大革命要分开。

三、现在国际上帝、修、反正在利用我们文化大革命继续大搞反华活动，如苏联在镇压学生，新疆边界飞机活动多了，地面部队也在调动。凡是前线的大军区要警惕，要有所准备，如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等地区，所以文化大革命要稍推一下，将来一定要搞的，顾大局。

在章伯森反映湖南问题报告^[1]上的批语

(1967年1月27日)

总理：

湖南也应照贵州那样予以处理^[2]。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似可找他来商量一下，看有无别的较好干部以及造反派领袖，可以找来共同商量？请酌处。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七日

[1] 章伯森，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湖南省副省长。1967年1月25日，他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写报告说，我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向中央反映两点情况：一、目前湖南文化革命运动形势越来越好。造反派在政治上已完全取得优势，保守派正在分化瓦解中。但省委工作暂时处于瘫痪状态，领导机关的工作也基本停顿。如何依靠造反派，团结大多数，建立新的革命秩序，这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二、目前有很多单位要求对犯错误的干部罢官、开除党籍。自1月中旬以来，要求开除党籍的更是络绎不绝，如果这样处理下去，后果很难设想。章伯森在电报中还请求中央批准他到北京作一次汇报，并请中央对以上两个问题给予指示。

[2] 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关于处理贵州问题给周恩来的批语中指出，应将贵州有关各方的代表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

关于外国朋友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1967年1月28日)

外国朋友真正革命的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对谭震林^[1]关于国务院农口 几个单位情况报告的批语

(1967年1月30日)

林彪、恩来^[2]同志：

此件^[3]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

毛泽东
一月卅日

[1]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公室主任。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3] 指谭震林1967年1月28日给毛泽东等并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报告。报告对农垦部、农业部、水产部等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谈了自己的看法，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批语和修改^[1]

(1967年1月30日)

—

林彪同志：

此件我看了，认为很好，并作了一些修改，请你看一下，退还陈伯达同志。

毛泽东

一月卅日

如有修改，请告伯达。又及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1967年1月29日送审的社论稿的批语。陈伯达在送审稿上写道：“王力、关锋二同志为红旗杂志准备了一篇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请审阅！”王力、关锋，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本篇二至七是毛泽东对社论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这篇社论发表在1967年2月3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上，《人民日报》1967年1月31日提前转载。

二

必须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克服自己头脑中和自己团体中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所有这些违背毛主席教导的、妨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都是当前尖锐的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映。这些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根据毛主席一贯提倡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多做自我批评，而不要互相攻击。

三

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不相信，这是不对的。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

四

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

过，鼓励他们立功赎罪。"[1]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五

各级干部，都要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见过去的功劳，而看不见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改过来。

六

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例如，所谓“中国工农红旗军”，所谓“荣复军”

[1] “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立功赎罪”这句话，在1967年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中，作为毛泽东的话用黑体字排印。

“联合行动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被修正主义分子组织起来的名为“革命派”，实是保字派的组织，就是这种反动组织。这些组织中的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是应当争取教育的。但是，这些反动组织的一小撮头头，却处心积虑地炮打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暗害革命群众，收买职工，停止生产，中断交通，破坏和抢劫国家财产。他们趁火打劫，妄想变天。这种反动组织，有的就是在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挥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这种反动组织，是建筑在沙滩上的，一旦被群众识破，就会立即土崩瓦解，一小撮头头就会被群众揪出来。

七

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1]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热烈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人民解放军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社会主义事业创立新的伟大的功劳。这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

[1] 这句话在《红旗》杂志社论中发表时用黑体字排印。

关于发表《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等的批语

(1967年1月31日)

恩来^[1]同志：

这个通告^[2]很好，你看是否可以发表？新近搞的那个文件^[3]，待他们回去商量修改后，可以再发表，作为第二篇。如何，请酌。

毛泽东

一月卅一日

[1] 恩来，即周恩来。

[2] 指《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载于1967年1月26日《新贵州报》。通告宣布“毛泽东思想贵州省红色工人战斗团”等40个造反组织，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名义，于1月24日接管了中共贵州省委、省人委和中共贵阳市委、市人委的一切领导权。《人民日报》1967年2月1日转载了这个通告。

[3] 指《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十项通令》，后来发表在1967年2月5日《人民日报》上。

和周恩来谈夺权问题

(1967年1月)

毛泽东 (以下简称毛): 夺权怎么样?

周恩来 (以下简称周): 才夺权一天多。

毛: 要抓典型。

周: 市局委开了会, 夺权有几种形式, 干部是当权派: (一) 受黑帮影响很坏, 变黑帮; (二)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三) 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四) 承认错误, 但还有严重错误; (五) 有个别一般错误 (这种人为多)。

毛: 前两种要划小, 要孤立打击极少数, 接管本身就是革命。建立新的, 根据不同情况, 也有不同形式: (一) 全部改组 (上海: 张春桥、姚文元); (二) 接管后对当权派不同形式处理, 边检讨边工作, 监督留用 (根据指示工作); (三) 停职留用; (四) 撤职留用; (五) 撤职查办。

周: 那种办法好, 撤职一面斗争, 一面留用, 有了对立面, 就可壮大队伍。把许多事压在身上 (指革命造反派) 也很被动, 留用一面斗争, 一面工作。科学院左派队伍壮大了, 抓革命促生产搞得很好。让那些当权派扫街, 扫完了就休息, 睡大觉, 太便宜他们了, 便宜事都叫他们办了。不要把自己陷入事务之中, 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掌握大权监督他们。一个单位几个战斗队观点不同不奇

怪。有事商量比不商量好。

毛：接管是大事情，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动。要解决接管的目的，解决什么问题，接管办公，遇到问题怎么处理要有具体政策（局、科、部、科员等怎么办）。现在夺权了，也许还会夺走。有的单位夺过来夺过去，是个锻炼，要巩固住，主要靠左派力量壮大。左派力量小时，夺权小，夺过去很快要夺走。左派要壮大。我支持夺权，夺权后要抓革命促生产。

和外宾谈如何看大字报

(1967年1月)

看大字报要一分为二，大多数是革命的大字报，有的是不革命的大字报，有的是坏大字报；有的是符合事实的大字报，有的是不符合事实的大字报。

关于接管的指示

(1967年1月)

接管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这个政府，过去是上面派去少数干部和下面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了政府，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得了政府，这就很容易产生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

谢富治^[1]：我们老一点的同志，对这个运动不理解，从开始就不理解，到现在还不理解，转不过弯来。

转不过弯来靠边站，但给饭吃。

谢富治：昨天向主席谈到，联合行动委员会有许多高干子弟。这是阶级斗争。

[1] 谢富治，当时任公安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应说服红卫兵 让王任重^[1]就医的批语^[2]

(1967年2月2日)

林、周^[3]阅后，交文革小组商处。

毛泽东
二月二日

我意应说服红卫兵，让他就医。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

[1] 王任重，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1967年1月受到错误批判后被打倒。

[2] 这个批语写在王任重的妻子萧慧纳1967年1月29日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王任重病重垂危，现被揪斗，不知去处，朝不保夕，请求给予治疗。2月3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北省委并武汉军区党委的电报中指出：“王任重最近以来病情加重。为了使他能进一步检查错误，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建议能让王就医一段时间，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请武汉军区党委协助省委办理此事。”

[3] 林，指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对周恩来给陈伯达、江青的信的批语^[1]

(1967年2月2日)

此件不用，退周。

[1] 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给陈伯达江青的信的批语。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提议今后每星期一、二、五晚10时起在钓鱼台开碰头会，以文革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其他有关同志按问题性质临时通知参加。明日，我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文件、工业生产问题（文件在印发），下一次讨论农业。二、提议今后每星期二、星期六下午会议室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聂、谢）和剑英参加。务请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



1967年2月，叶剑英、陈毅、谭震林等一批老干部在怀仁堂召开碰头会，痛斥江青、陈伯达等人。会后，江青等人诬陷这些老干部发动“二月逆流”。图为中南海怀仁堂。

斗争要文明些，坚持文斗，不用武斗^[1]

(1967年2月3日)

斗争要文明些，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要高姿态，要高风格。北京街头上标语水平不高，到处都是打倒、砸烂狗头，哪有那么多的狗头，都是人头。这样搞群众很难理解。搞喷气式飞机照片，登报贴在大街上被外国记者搞走了。现在要将斗争水平提高，现在水平太低。

八月初，也没这凶嘛，斗倒斗臭要在政治上斗臭，要对后代进行教育。不然他们将来掌权了，也这样干，这就太简单化了。他们认为这样斗臭了，还有把别人生活上的问题摆出来也叫斗臭了，我看不合适。主要是政治上斗臭。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斗争问题给周恩来的一段指示。

在西藏军区党委一份电报^[1]上的批语

(1967年2月7日、8日)

—

林彪、恩来、叶、聂、徐^[2]各同志：

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3]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

[1] 中共西藏军区委员会1967年2月6日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说，“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认为张国华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说军区党委是“保皇派”“黑窝子”，群众因不明真相，动荡很大，军区机关一部分干部和驻拉萨部队的部分干部战士也出现了思想混乱。此种状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后果是严重的。为此建议中央对张国华尽快表明看法。2月12日，中央军委复电西藏军区。2月24日，中央文革小组又给“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等复电，指出中央军委的电报是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的，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拥护这个电报所说的：张国华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尽管他在工作上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个好同志。望军区党委同志向革命群众做些工作。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叶，指叶剑英，聂，指聂荣臻，徐，指徐向前，当时均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3] 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周仁山，当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王其梅，当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

有些问题处理太慢了。新疆问题应当快点解决。

毛泽东
二月七日

另有一些重大问题处理太快，不经常委从容讨论，似乎不妥。
又及

二

已办，存案。

毛泽东
二月八日

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1]

(1967年2月8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什么时候谢胡^[2]同志到中国来的呀？

周恩来：去年五月。

毛：去年五月我就向他讲这个问题，究竟是修正主义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也说，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第一个可能放在我们会失败这一点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

[1] 这是毛泽东1967年2月8日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希斯尼·卡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贝基尔·巴卢库等时的谈话。

[2] 谢胡，当时任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

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一九六二年，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比如十七年来，就有和高岗、饶漱石^[1]的斗争，他们一个集团，我们把他整下去了，这是一九五三年冬到一九五四年春。然后是一九五九年，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2]这个集团整下去了。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3]，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

卡博（以下简称卡）：受毛泽东同志指示写的？

毛：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

[1] 1953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及其前后，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和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相互勾结，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和批判了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1955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将他们开除出党。

[2]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3]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了吴晗的《海瑞罢官》。

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彭真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现在不是改组了吗？改组了的市委还不行，现在还要改组。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决定^[1]时，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原先那两个师是好的，但是，分散得一塌糊涂，到处保卫。

现在的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眼镜，戴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杀了一些好人，杀死了几个人，杀伤了好几百。多数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比如像贺龙、陆定一、罗瑞卿这些人的子弟。所以，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把罗瑞卿的问题处理了，那是前年十二月；把北京市委这些人处理了，是去年五月。发动大字报运动，是去年六月一号。发动红卫兵，是去年八月。你们有人不是见了北京大学聂元

[1] 19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的消息，内容如下：新华社三日讯 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业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

梓¹吗？谁人去见的呀？

卡：什图拉同志。

毛：她在去年五月二十五号写了一张大字报，那个时候我在杭州，到六月一号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这一下大字报就满天飞了！

巴卢库（以下简称巴）：大字报就发出信号。

毛：也不是我写的，是聂元梓他们七个人写的。红卫兵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两处搞起来的，他们有一篇材料给我看到了。到了八月一号，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后来就大搞起来了。八月十八号我接见了红卫兵几十万人。接着八月上旬到八月中旬就开了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时候我自己才写了一张二百个中国字的大字报，说，从中央到地方某些负责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学生，反对无产阶级，搞白色恐怖。这才揭露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才别相信我们这个党里都是好人。好几年以前我就说要洗刷几百万，那不是讲空话吗？你有什么办法？毫无办法。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²不听。一个《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人民日报》是夺了两次权的，第一次是去年六月一号，第二次是最近一月

[1] 聂元梓，北京大学学生运动领袖之一。1966年5月25日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勇、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7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2] 指刘少奇，当时任国家主席，文革前主持一线工作。

份。过去我公开声明，我说，《人民日报》我不看。当着《人民日报》总编辑也说，我不看你的报纸。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我的这一套在中国是不灵的，所有大中学校都不能进去。因为控制在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的宣传部、周扬的文化部这些人手里，还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这些人的手里，毫无办法。

我们党内暴露出许多人，大概可以分这么几部分：

第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他的目的是民主革命，要搞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他也赞成；实际上打倒民族资本主义他就不赞成了。分配土地，他是赞成的，分到农民手里，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这一部分人，就是一批所谓老干部。

第二部分人就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九年以后进党的。其中有一部分人当了干部，支部书记、党委书记，甚至更高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还有中央委员，这么一批人。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收容下来的国民党的这些人，其中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了，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第四部分人就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解放以后他们进了学校，甚至进了大学，掌了一部分权。这些人也不是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大概就是这么几部分人。总之，在中国人数并不多，百分之几。他们的阶级基础只有百分之几，比如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等等，顶多有百分之五。那么，七亿人口里面也不过是三千五

百万人。他们也分散，分到各个乡村、各个城市、各个街道。如果三千五百万人集中到一起，手里有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军了。

巴：尽管合在一起也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军队。

毛：他们是灭亡的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在三千多万人里顶多有几十万人，也分散，分到各城市、各街道、各农村、各学校、各机关。所以，大字报一出来，群众运动一出来，红卫兵一出来，他们吓得要死。

另外，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也搞得很乱，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有人建议保留一个Teacher（教师），我是个小学教员嘛，就是一个普通教员多好。至于什么Professor（教授）谈不上，我没有进过大学，你们都进过大学吧？

卡：一个都没有。

毛：马克思是大学生，列宁是大学生，斯大林读了中学，我也是只读了中学。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人我是怀疑的，特别是读文科、社会科学的。这些人如果不进行教育，不搞文化大革命，很危险，这些人将来就是修正主义。搞文学的不能写小说，不能写诗；学哲学的不能写哲学文章，也不能解释社会现象。还有学政治的、学法律的，都是一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没有搞出什么好的教科书。还有学经济的，修正主义分子可多了。但是，现在看来有些希望，斗得厉害。

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什么坏东西都可以扔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乐观的。从去年，我和谢胡同志谈话时，比较乐观些了。

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巨大胜利。

毛：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巨大的现在还没有。在明年这个时候

也许可以讲。但是，我们还不能断定。也许我们这批人要被打败，我时刻准备着，打败就打败，总有人起来继续战斗。中国这个国家有人吹牛皮说是什么“爱好和平”，才不是那样，爱斗争，动不动就打，我也是。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

卡：不搞斗争是不行的，不然革命怎么实现呢？

毛：就是吆！中国搞修正主义不像苏联那么容易，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受压迫一百多年。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学校原封未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有的是委派去的，如曹荻秋、陈丕显^[1]不是派去的吗？（□□：以后选举的。）选举我是不相信的，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四个就一万多，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就没有看见我嘛！见都没见怎么选呢？不过是闻名而已，我和总理都是闻名的。还不如红卫兵，他们的领导人还和他们讲过话呢，不过红卫兵也在不断地分化。在去年夏天左派是极少数，站在我们这边，受压迫，他们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到了冬季起了变化，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你们到过清华大学吗？

卡：去过。

毛：“井冈山”，过去是少数派，是受打击的；北大的聂元梓也是少数派，受打击的。现在变成多数派。过去受压迫，他们少数派很革命，一到了冬季变成多数派，

[1] 曹荻秋文革前原任上海市市长，陈丕显原任上海市委书记，在“一月风暴”中被夺权打倒。1932年曹荻秋在上海被捕，5年后履行一定手续后被释放，在文革中被定为叛徒。1930年陈丕显被敌人俘虏，与他同时被俘的涂应达审讯后被敌人杀害，而匪军营长却收陈丕显当了义子。在文革中陈丕显被隔离审查。

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1]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

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你们看，北京街上有打倒我的标语，打倒林彪同志的标语。什么打倒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等的标语都有。至于要打倒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肖华的标语就更多一些。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打倒肖华是北京军区司令员^[2]挑起来的，要搞他。昨天挑起打倒肖华，过了一两天他自己被人家打倒了。中国第二大军区呀！一个军区司令、一个政委还有个副政委张南生几个都倒了。但是，有一条真理永远是真理，天不会掉下来的，绝大多数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党员、团员是好的，我们要坚决相信这条真理。

巴：他们都是活生生的力量。

毛：虽然有些人有些错误、缺点。我也不来包庇叶剑英、杨成武、肖华、王树声一点缺点，但是他们基本上是人。

巴：工作上可以犯错误，可以改呀。

毛泽东：可以改嘛！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

[1] 蒯大富，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的领袖。

[2] 指杨勇，当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至于犯了一些什么具体的错误，现在没有时间，你们如果多呆几天可以跟你们讲，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你那么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个啥人，自己还不知道？有一点自知之明嘛。

如果中国天黑了，地也黑了，你们也不要怕，要相信一点，全黑也不会的。秦始皇统治十六年就倒了，有两个人首先起义，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农奴。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卫兵，在去年夏季被打击，被打成“反革命”的这些人，就是陈胜、吴广^[1]。我们都是斯巴达克，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被看不起的小人物，受压迫，组织共产党。

[1] 陈胜、吴广，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战争。

对《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7年2月9日)

—

有一些修改。

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总结经验，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

毛泽东

二月九日上午

[1] 对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1967年2月7日送审的这个规定稿，毛泽东作过两次修改。本篇一写在第一次送审稿上；本篇二是写在第二次送审稿上；本篇三是经毛泽东两次修改后的中央军委规定稿，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二

林彪同志：

又改了一些，请酌定。此件应在总理主持的党、政、军联席会上讨论通过，然后发出。

毛泽东

二月九日下午

三

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
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

各军区、各军兵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在支持真正的（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已经遇到各种复杂情况，以至发生武装冲突事件（如新疆、内蒙）。因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对徒手的群众，不管属于哪一派，都不能开枪。

（二）对徒手的保守派、右派、反革命派，可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在必要时，可以逮捕他们的头目，但不要开枪。

（三）略

（四）对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等现行反革命分子，确实查明无误者，如敌人拒捕、顽抗和武装暴乱，在说服无效时，可开枪

镇压。

（五）要相信，即使是反革命组织，大多数群众仍然是好的，是可以教育争取的，坏人只是少数个别分子。

（六）要沉着应战，即使有几万人向我军示威、包围、冲击、打人、抓人、侮辱人，也不要紧。若不沉着，怕字当头，就是大错。

以上规定，大部分要向全军指战员认真进行宣传教育。但第三条（诱敌深入、迂回包围）只能临战时下达，事先必须保密。^[1]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

[1]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1967年2月11日给林彪写信说：“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我们把六条作为五条发出，第三条只在会议上念了一遍（发稿呈上），会后各军区请〔求〕将第三条单独发给他们再读一遍，以便掌握，我们已单独打印发给他们，说明看后收回（已经收回）。请报主席。”

关于播发《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 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的批语^[1]

(1967年2月9日)

伯达同志：

请与小组同志研究，此文可否公开发表，并予广播？是否有要修改的地方，也请酌处。

毛泽东

二月九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1967年2月7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三九〇期上。这期简报登载了一篇题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的材料。材料说，黑龙江省造反派在夺权斗争中的经验是：一、根据当地的具体斗争情况，鲜明地体现党的方针政策，团结省委内部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和军队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二、在夺取省委的领导大权之前，首先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喉舌报社、电台和专政机关公安局掌握在左派手中，为最后夺取省委大权作好舆论准备，坚决镇压反革命，保证夺权斗争的顺利进行。三、坚决地依靠被夺权单位内部的左派力量，团结中间力量，打击反动力量，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四、夺权斗争的根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左派队伍，左派队伍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了夺权斗争。这篇材料发表在1967年2月10日《人民日报》上。

对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 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稿 和补充规定稿的批语^[1]

(1967年2月)

—

照办。如昨夜会议上有修改，照修改稿办。

二

照发。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1967年2月9日送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审阅的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稿上。叶剑英在送审报告中写道：“遵照主席在上次常委会上的指示，起草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今天上午召集32人参加的会议，进行讨论和修改。特呈上请审查批示。”2月10日，林彪将这个规定稿转送毛泽东审阅。经讨论修改后，中央军委规定于2月11日发出，共七条：一、中央军委1月28日的命令，是个重要的文件，必须广泛宣传，充分

发动群众，深入学习讨论，认真抓好活思想，务使大家深刻认识颁发这个命令的伟大意义，提高执行命令的自觉性。二、军以上机关（各总部、军种、兵种，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区空军、海军舰队）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进行四大。由军委决定已经开展四大的单位，除因必要暂停进行的以外，要继续充分发动群众，坚决依靠真正的而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军委决定暂时不开展四大的单位，必须进行正面教育，何时开始，必须听候军委命令。三、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的基地以下单位，海、空军的飞行学校，北京卫戍区，上海、天津、旅大警备区，以及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绝对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借口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四、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帝、修、反加紧反华，我军更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保持高度集中统一和不间断的指挥。因此，各级军事领导机关（包括司、政、后及其他领导部门）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五、根据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党委个别成员问题严重的，可以撤换，党委不能领导的，可以改组，但都必须经过上级批准。军队领导机关必须保持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已经成立的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必须以行政单位进行改组。这些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对党委有批评和建议之权，但不能代替、监督党委和行政领导行使职权。六、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到群众中去，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同群众紧密结合，一道闹革命，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应该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别对待。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凡是没有上级命令停职、罢官的领导干部，应该坚守岗位，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七、在运动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

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要加强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本篇二写在林彪1967年2月25日送审的《关于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补充规定》稿上。中央军委2月27日下发的这个补充规定指出，为了保持军队领导机关严密、完整的指挥体系，进一步贯彻军委指示，特决定：凡继续开展四大的单位的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应以基层行政单位进行改组，所有超越基层行政单位的文化革命联合战斗组织，如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单位的造反总部、联络站等，应一律撤销。所有文化革命战斗组织所使用的宣传工具，如有线广播、宣传车、印刷用具等，应一律移交各单位党委文革办公室。

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

(1967年2月12日、18日)

一

二月至四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这三个月中，文化大革命要看见眉目。

上海的工作总的方向是很好的。

上海的工人在安亭事件^[2]的时候，你第一次去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两千人吗？现在已经到了一百多万人啦！说明上海的工人发动得比较成功。

二

你们那个时候学生都不是到了码头吗？现在那些学生是否还在

[1] 这是毛泽东接见张春桥、姚文元时的谈话纪要。

[2] 1966年11月9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上海市委拒绝承认其合法性。10日，王洪文率领数千人要上北京告状，被上海市委限令停在上海安亭火车站，于是他们卧轨拦车。张春桥代表中央去处理“安亭事件”，认为“工总司”是革命行动，并要求市委检查错误。

码头上啊？

（张、姚答：“还在。”）

那很好。以前学生和工人结合没有真结合，现在才是真结合了。

三

我们现在这个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

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要革命。

四

一定要三结合。福建的问题不大，贵州问题也不大，内蒙古问题也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省有百分之五十三是革命群众，百分之二十七是部队，百分之二十是机关干部。上海应向他们学习。一月革命胜利了，但二、三、四月更关键、更重要。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人一定要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单位，连副科长都不要。这种副科长都不要的人，这种人搞不了几天的。

应该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会跟着我们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相当多，中农占的数量很大。城市里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包括以至于小业主，这个数量相当大。只要我们善于领导，他们也是会跟着我们走的。我们要相信大多数。

一个大学生，领导一个市，刚刚毕业，有的大学生还没有毕业，就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的。我看当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学校很复杂，你是一个刚刚毕业或还没有毕业的人，学校情况很复杂。照我看，当一个系主任也不行。系主任总要有一点学问吧！你这个学问还没有学完，大学刚刚毕业，学问还不多，而且没有教书的经验，没有管理一个系的经验。搞个系主任，我们已经培养了一批助教，讲师，原来的领导干部，总要选些人出来。这些老的人，也不能够都不要。恐怕周谷城^[1]不行了吧！周谷城再教书不行了吧！

五

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那据我看，现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这是巴黎公社。再一个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当时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能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从现在的苏维埃看来，已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了。

英国是君主制，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有很多例子：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

[1] 周谷城，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原任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反对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研究历史。

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是国王，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个好一些？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点，就现在的表现来看啊。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国叫天王，唐高宗叫天皇。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我们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是一个名称，是一个词，好象校长就低得多，总统就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样。

名称不宜改得太多。还有历史上的王莽，这个人是最喜欢改名字的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如现在有人不喜欢那个“长”啊，都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有点像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他改了后仍不记得，还是记老名字，王莽皇帝下诏书都困难了，改得连县名都不知道了，那么下诏书他就要写上，譬如咸阳是陕西一个县，改成祁西，诏书里就写上“祁西即咸阳”，把老名称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公文来往非常麻烦。

话剧这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主要经验是巴黎公社、苏维埃。也可以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如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苏联一样，他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共和国。这个问题主要是看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所以，是不是咱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改名字了。

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这样就发生改变政体、国家体制、国号问题。是否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改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长？出来这个问题，紧跟着改。不但出来这个问题，如大小都要改，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这个问题，我估计苏联是不会承认的，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了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中国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问题？资产阶级国家可能承认。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哪里呢？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1]也好，它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党呢？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将来还是要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大学里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好，因为这是十六条^[2]所规定的。

上海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啊！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啊？你们是不是回去商量一下，想几个办法，第一种是不改名字，仍用“人民公社”，这个办法有好处，也有缺点。好处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缺点是全国只有你们一家，那不是很孤立吗？现在

[1] 一贯道，在中国现代史上，一贯道是组织最严密、流传最广、信徒最多、活动最猖獗、危害最严重的一个反动会道门组织，1950年被取缔。

[2] 十六条，指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简称十六条。

又不可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一登，全国都要叫。否则，人家有意见：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这样不好办。第二种是全国都改，那么就要发生上面的问题，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旗号，承认不承认的问题。第三个办法，上海改一下，和全国一致了。可以早一些改，也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不想改，那么你们就叫一些时候吧！你们怎么样？能不能说得上通啊？

对王明昆关于成立“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等情况汇报^[1]的批语

(1967年2月14日)

林彪、恩来同志：

排斥交通大学一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当继续做调查工作，不必急于公开表态。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不主张破坏工厂。以上请酌。并告文革小组。

毛泽东

二月十四日上午九时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1967年2月12日编印的《要事汇报》第八号上，登载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昆的电话汇报。王明昆说：（一）昨天晚上，我们向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发的电报，看法有问题。原来的观点倾向于西安交通大学，现在看来交大有问题，我们犯了错误。现在纠正错误观点，站到西安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这边，把西安交大排除在外，成立了“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今晚开会发表“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声明。（二）西安东郊二八工厂10日被该厂保守派破坏，估计半年可能修复生产。今晚又有一二万人开大会，可能是要砸八〇三厂或者冲击省军区机关。有谣传说，要在20日以前把东郊的工厂都砸掉。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处理，请中央文革迅速予以指示。

关于派人调查总结北京两所中学 军训经验的批语^[1]

(1967年2月14日)

林彪同志：

请派人去调查一下，这两校军训的经验是否属实？核实后，可以写一1000字左右的总结，发到全国参考。又大专学校也要作一个总结，发往全国。请酌。

毛泽东

二月十四日

[1] 这个批语写在新华社1967年2月13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特刊《文化革命动向》登载的《北京两个中学进行军训的情况》一文旁。文章说，驻京部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最近在北京二中、二十五中进行集训革命师生的试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两个学校的军训都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以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为主要教材，发动群众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友，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消除各群众组织之间的隔阂。第二阶段以毛主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为主要教材，引导师生深入批判阻碍革命派大联合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挖私心，大破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实行革命组织大联合、大夺权。

对谭震林给林彪的信的批语^[1]

(1967年2月17日)

已阅。

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1] 林彪将此信送毛泽东阅，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这是毛泽东对谭震林这封信的批语。

和部分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1967年2月18日)

我听说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

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执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如果打分的话，我看可以打九十七分。你们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行，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陈伯达枪毙，康生充军，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么？谭震林、陈毅都是老党员，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

场上说话呢！

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解决！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 《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的批语^[1]

(1967年2月18日、22日)

—

退总理：

同意你的意见，讨论后再发表，并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2]
再则，以后重要社论都应这样做。

毛泽东

二月十八日下午八时

二

照发。

[1] 《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是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1967年2月17日送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审阅、18日由周恩来

转报毛泽东的。本篇一写在周恩来2月18日的送审稿上。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一些修改。社论稿第八页讲到对犯错误干部的使用问题时写道：“有的干部，还可以吸收他们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将其中的“有的干部”改为“有许多干部”。在社论稿的末尾，毛泽东删去了以下三句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此外，还有一些文字方面的修改。本篇二写在陈伯达和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关锋、王力2月22日送审的社论修改稿上。陈伯达等在这次送审稿上写道：“总理主持下开会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我们又作了一次修改。”这篇社论发表在1967年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上，《人民日报》2月23日提前转载。

[2] 周恩来1967年2月18日在向毛泽东转送这篇社论稿时写道：“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得还不错。提议在党、政、军、文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在社论稿第二部分《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中的三段文字旁，周恩来画了竖线，并批示：“在这一部分，可以把地方上的三结合和机关内部三结合加以解释和阐明。”22日的送审稿上，在这一部分加写了两段文字。一段文字是：“经验证明，在需要夺权的省、市，必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种‘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在需要夺权的工矿企业，也必须建立由革命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代表（老工人、青年工人）和民兵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需要夺权的党政机关，则必须实行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级干部和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领导班子，率领广大革命群众，胜利地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战斗任务。”另一段文字是：“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当前必须着重解决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问题。”

对北京卫戍区关于在大、中学 开展军训的两个总结报告的批语^[1]

(1967年2月19日、3月23日)

一

林彪同志：

(一) 此两件应即转发全国。(二) 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上课以后，在军训的二十天中，军训时间每天不要超过四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每天相应减少时间四小时。(三) 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

[1] 根据毛泽东1967年2月14日关于派人调查总结北京两所中学军训经验的批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2月18日写出了关于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在北京二中、二十五中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政训练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2月19日送毛泽东审阅。本篇一写在林彪送审的前一个报告的首页上。3月4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王力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大中学的军政训练，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同志主张在报上发表。主席批示的两个关于北京的军政训练的文件，他们也主张修改后发表。请主席决定。”本篇二就写在陈伯达、王力的报告上。北京卫戍区的这两个总结报告，后来既没有由中央转发全国，也没有在报刊上发表。

年二十天。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二月十九日

此两件总理^[1]阅后送林彪同志。

二

都不要发表。各地经验已超过北京。我的批语也有些不适应新情况，因此都不宜发表。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三日

[1] 总理，指周恩来。

在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 新闻稿上的批语^[1]

(1967年2月20日)

伯达、王力^[2]同志：

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请你们在四份材料〔上〕一律改过来。

毛泽东

二月廿日

可分两天发表。第一天发前三件，后一件在第二天发。^[3]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1967年2月17日报送的新闻稿共4件，分别是：《贵州革命造反派举行盛会庆祝贵州省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告全省人民书〉》《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经验》。陈伯达在送审报告中写道：“贵州省材料四份，内容较丰富，关于三结合的经验也说得好。请主席审阅。如认为可以发表，名称是否简称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请批示！”毛泽东的批语，写在陈伯达报送的第一篇新闻稿上。

[2] 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3] 1967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送审的前三篇新闻稿；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送审的第四篇新闻稿。这四份新闻稿中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一词，发表时均改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

对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 和各级干部的信稿的批语^[1]

(1967年2月20日)

林彪同志阅后，退汪东兴照办。

毛泽东

二月廿日上午十一时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等1967年2月20日送审的中共中央信稿上。信中指出，贫下中农是农村中抓革命、促生产的主力军。当这春耕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号召你们，党中央号召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要善于同贫下中农一起商量，同一切劳动群众一起商量，掀起一个春耕生产的高潮。党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犯过错误的干部只要这样做，贫下中农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对他们的批评，要采取毛主席历来指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绝对不许地、富、反、坏、右分子乱说乱动，破坏生产，破坏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挑动宗派纠纷。他们必须在贫下中农监督下，认真地继续进行劳动改造。在“四清”运动中下台的干部，必须积极参加劳动，改造自己，不许反攻倒算。建议你们考虑立即开一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干部会议，布置春耕生产工作。建议你们开好生产队全体社员会议，讨论春耕生产工作。同时，还建议人民解放军驻当地部队和各级军事机关大力支持、帮助春耕生产工作。当日，中共中央即发出了这封信，要求在农村中宣读和张贴。

关于了解广东省委领导干部情况 等问题的批语^[1]

(1967年2月24日、28日)

—

总理：

请告广州军区，查一查赵紫阳、区梦觉^[2]二人政治态度如何，其他省委书记、常委如何，是否可找赵、区二人来京和陈郁、黄永胜^[3]一道谈一次，加以开导。

毛泽东

二月二十四日

二

总理：

同意这样做。

毛泽东

二月廿八日一时

[1] 本篇一是毛泽东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1967年2月23日关于广州夺权斗争的新形势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报告后写的批语。1967年2月27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昨日与广东来京同志座谈了一天。广东方面同志有黄永胜、陈郁、赵紫阳、陈德（当时任广东省军区政委）、区梦觉等7人。今晚，我们在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广东问题，一致建议：广东立即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目前以黄永胜为主、陈德为副，主持广东全省工作，帮助省委同志检讨，估计有一些同志可得到群众通过。云南情况，与广东颇似，拟亦先行军管，准备三结合的条件。毛泽东阅后，又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

[2] 赵紫阳，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三政委。区梦觉，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

[3] 陈郁，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广东省省长。黄永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

关于公开报道贵阳棉纺厂按行政系统 搞联合等问题的批语^[1]

(1967年2月27日)

伯达、王力^[2]同志：

此件似可公开报导。又，《文汇报》有一篇题为《革命不分先后》的社论^[3]，略加修改后，似可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北京其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1967年2月25日编印的《快报》第一三三四号上。这期快报登载的《大联合中的又一新形式，贵阳棉纺厂按行政系统联合效果好》的材料说，贵阳棉纺厂在夺权以后，按车间等行政单位搞联合，对文化革命和生产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他们把这种联合的方式叫作归口大联合，是大联合中的又一新形式。1967年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材料，题目改为《用毛泽东思想作为大联合的灵魂！贵阳棉纺厂按行政部门搞联合，组织纪律性大大加强，革命和生产出现新面貌》。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的社论。

[2]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3] 指《文汇报》1967年2月18日发表的社论，原题为《造反不分先后》，《人民日报》已于1967年2月20日转载。社论指出，革命有早有迟，造反有先有后。我们的态度是：不管革命迟早，不分造反先后，真革命、真造反，我们总是热忱欢迎的。今天造反，今天欢迎；明天造反，明天欢迎。对于一切愿意革命的干部来说，应该遵循毛主席“只争朝夕”的教导，立即起来造反。任何歧视、排斥干部起来造反的论调都是错误的，必须痛加驳斥。

他报纸早已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政治嗅觉，似不甚强。

毛泽东
二月二十七日

对张日清《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一文的批语^[1]

(1967年2月27日)

林彪同志：

可以登报并广播，军队同志就看到了，不必再印发。如你同意，请退文革小组。

毛泽东

二月廿七日十时

[1] 张日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967年2月25日，《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和副总编辑王力、关锋将这篇文章送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审阅时写道：“这篇文章，是红旗杂志约张日清同志写的。我们认为很好，拟最近发表，并想建议军委把此文印发军级干部会议各同志参考。”林彪阅后转送毛泽东，毛泽东的批语写在陈伯达等的送审稿上。张日清的文章，发表在1967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和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上。

关于夺权的提法的指示

(1967年2月27日)

不同意“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难道说没有一个单位是无产阶级当权？建议把大夺权的“大”字去掉：“大联合夺权”。

今后斗争矛头应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句话是对当年形势提的，今后不要再提了。

关于要注意反革命复辟现象的批语^[1]

(1967年2月28日)

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

毛泽东

二月廿八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1967年2月25日编印的《快报》第一三三二号上。这期《快报》登载了题为《北京政法公社在天津小站公社支持了谁?》的材料。材料说：“1月26日，北京政法公社燎原长征队在天津小站公社坨子地大队，支持以四清运动中下台干部为背景的‘燎原红色战斗队’抢走大队的大印，从此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实行反攻倒算。”196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把这期《快报》报送毛泽东时写道：“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革命群众要记者给主席反映情况。现在把材料送上，请顺便一阅。”

关于宗派主义问题的指示

(1967年2月)

凡是闹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的，最后都是搞不成的。

要埋头工作，善于思考

(1967年2月)

五四运动风流人物，有影响的人物，五四运动的右翼是胡适，后来他成了美帝的走狗，五四运动的陈独秀也成了反革命。当时的李大钊，写的文章也不多，但他埋头工作，后来成为革命的左派。还有鲁迅，当时他重视社会调查，独立思考，后来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从历史当中吸取教训，不做昙花一现的人物，要埋头工作，善于思考，密切联系群众。中国历次的革命及我们亲身经历的革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想问题的人，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会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在沈阳军区组织机关干部到工厂 宣传毛泽东思想情况简报上的批语

(1967年3月3日)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1]可印发军级会议^[2]各同志。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沈阳军区派遣大批人员进厂做宣传和做调查的办法是很好的。二十七军在无锡、五十四军在重庆、二十三军在伊春、苇河等处也有好的经验。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毛泽东

三月三日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1967年3月2日给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小组并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等的报告。报告说，沈阳军区领导机关及驻沈各军事机关，于2月下旬共抽调780名干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沈阳市122个大、中型工厂和部分大专院校，运用有线广播、口头讲解等办法，反复宣传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十六条、工业十条、八项命令以及中央、军委的其他有关通知、指示，党的政策一经讲清后，部分工厂由于少数人闹事而产生的不正常现象，逐步得到纠正，生产普遍上升，武斗基本制止。

[2] 指1967年2月26日至3月25日召开的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

在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 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报告上的批语

(1967年3月7日)

林彪、恩来^[1]、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2]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警备区司令员郑三生等1967年3月6日关于天津市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给北京军区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报告。报告中说，天津市延安初级中学在部队进校前，到校人数很少，组织多而乱，有武斗现象。经过一个月的军政训练，改变了面貌，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大联合，建立了“三结合”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整顿、巩固和发展了红卫兵组织。3月1日复课后，掀起了抓革命促教学的新高潮。3月8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一起转发给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1968年3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并拟题为《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指示》。因这个批语写于1967年3月7日，因此又简称为“三·七”指示。

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毛泽东
三月七日

对贵州省军区支援左派工作 经验材料的批语

(1967年3月7日)

戚本禹^[1]同志：

此件^[2]看过，不错。但有些问题写得不具体，例如第一个问题没有举例，究竟怎样解决的，看不明白。是否请他们写一个较具体的可供发表的报导送来，请酌处。

毛泽东

三月七日

[1] 戚本禹，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2] 指全军文化革命小组1967年3月2日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十七号上登载的《贵州省军区关于怎样做好支援左派工作的经验》材料。材料说，贵州省军区党委在2月1日至3日召开了有各师、军分区主要领导和军区机关处以上干部参加的座谈会，在讨论怎样搞好支援左派工作时，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一、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中央已经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实行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这就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过去由于认识不清，所以一接触实际，就迷失了方向。二、善于发现左派是我们采取支持行动的前提。具体方法是：（一）善于通过分析各派的特点来发现左派；（二）注意从各派与上面的联系来发现左派；（三）到群众中去倾听各方面意见，防止片面性。三、克服怕字，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广大群众夺权。

转发渡口驻军支左经验报告的批语

(1967年3月7日)

林彪、恩来^[1]、文革小组：

此件^[2]似可转发全国全军，参照执行。请酌处。

毛泽东

三月七日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党委1967年3月4日转发的四川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关于“首要的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的经验报告。报告说，以铁五师为主组成的支左部队来到渡口后，把支持左派的工作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下功夫到群众斗争中去识别真正的左派。在对左派的支持上，又坚持首先从政治思想上帮助他们成长壮大。具体做法是：1. 帮助他们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2. 帮助他们抓好活思想，做好团结教育工作，使之成为思想统一的有战斗力的集体。3. 帮助他们保持清醒头脑，坚持斗争大方向。铁道兵党委在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首先要从政治上支持，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3月8日，中共中央将渡口驻军的经验和铁道兵党委的批语一起转发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并指出：“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很重要的问题，并且创造了很好的经验”，“是值得全国全军学习的，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都应参照执行”。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论革命的“三结合”》的批语和修改^[1]

(1967年3月7日)

—

林彪^[2]同志阅后，退文革小组。

毛泽东
三月七日

[1] 这篇社论稿是由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王力、关锋撰写的。1967年3月2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将这篇社论稿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革命的三结合方针和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得到广大群众拥护。同时，有些人也在利用这个问题，搞复辟活动。针对这种情况，王力、关锋同志拟了一篇社论，阐述主席的革命三结合方针，以便引起注意。”本篇一是毛泽东写在送审稿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在社论稿中加写的话。这篇社论在1967年3月3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上发表，《人民日报》3月10日提前转载。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二

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或民兵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 建立革命委员会

(1967年)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1]

[1] 1967年3月3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的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中，在“毛主席指出”后面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话。《人民日报》3月10日提前转载了《红旗》杂志这篇社论，并以语录形式发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对北京市夺权筹备工作报告的批语^[1]

(1967年3月9日)

总理^[2]：

工人代表大会还没有开，中学和农民的代表大会还无消息。开全市代表大会并选举革委会，似以在三月下旬为宜，请与谢富治同志酌处。

毛泽东
三月九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等1967年3月5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报告中说，中央文革指示我们几个人负责筹备北京市的夺权工作。经过一个月的酝酿协商，准备在最近成立90多人的临时权力机构——北京市临时革命委员会。如主席、中央同意，我们拟在本周召开会议，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

[2] 总理，指周恩来。

关于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 程序的批语

(1967年3月10日)

各省、市亦宜照此^[1]办理。凡条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条件成熟，然后举行。处于无政府状态者，则先实行军管。

毛泽东

三月十日

[1] 指周恩来1967年3月10日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中说，昨夜得到主席关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前要先开工人、农民、中学生代表会或群众大会的指示，我已告谢富治并给常委和文革小组各同志传阅，他们都很赞成。今早，我照此方针，以电话告天津解学恭（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要他考虑先开大学、中学、工人、农民、机关革命派代表会议，然后再开全市革命组织协商会议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程序。



热烈欢呼义马矿务局建安处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宣传画）



热烈庆祝江西省工人代表大会委员会成立（宣传画）



热烈欢呼厦门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宣传画）



热烈庆祝宜春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宣传画）



热烈欢呼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四好”“五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宣传画）

关于推迟成立天津市 革命委员会的批语^[1]

(1967年3月)

以推迟到三月下旬成立，照总理十日意见^[2]办理为宜。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67年3月9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报告中说，天津市革命学生组织多已趋向联合，5日已开了红代会会议。工人革命组织已按口分系统组织，多已组成，达17万人。中学生革命组织较差。在本周内，他们拟开各方协商会议，商定革委会及其常委会名单。群众大会预定12日开，在会上宣布成立天津市临时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并发表宣言等。

[2] 1967年3月10日，周恩来打电话给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解学恭，要他考虑先开大学、中学、工人、农民、机关革命派代表会议，然后再开全市革命组织协商会议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革委会的程序。

对中央转发北京卫戍区布告的 指示稿的批语^[1]

(1967年3月)

照办。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1967年3月起草了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布告全文如下：“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奉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对□□□厂（矿）实行军事管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组成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特任命□□□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为副主任。一、军事管制委员会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首先要从政治思想上支持。也就是要帮助他们认真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掌握党的政策，使他们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壮大，依靠革命群众自己的力量，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二、厂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生产和业务工作，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应当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中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批转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的通知》和中央有关的政策规定。三、厂矿全体人员，必须坚守岗位，积极生产，努力工作，遵守劳动

纪律，服从上级指挥。建立革命秩序，严格出入制度。四、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强调摆事实，讲道理，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五、坚决响应毛主席提出的‘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减少脱产人员，反对铺张浪费。坚决同经济主义进行斗争，坚决同破坏国家财产的行为进行斗争。六、为了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提倡厂矿内革命群众组织，逐步做到按生产系统和行政单位编组。七、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在本单位或本市内进行革命串连，交流文化大革命经验，必须在业余时间进行。任何革命组织联合厂矿外革命组织召开大会，必须经过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八、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成立筹备组织，推动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九、厂矿一切外出长期不归的人员，限一个月内回到本单位，如在规定时间内仍不回厂矿者，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十、厂矿全体革命同志必须提高警惕，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加强安全保卫工作，不许地、富、反、坏、右分子乱说乱动。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破坏国家财产、破坏生产的人，要依法惩处。十一、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人员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从事生产，从事群众工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发扬民主作风，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并参加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十二、厂矿全体革命同志，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破‘私’字，大立‘公’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厂矿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3月15日，周恩来将北京卫戍区的这个布告报送毛泽东等时写道：“这一文件经过北京卫戍区起草、文革小组同志修改，并在今晚钓鱼台碰头会上修改通过。现在送上请予审阅，并请主席批准。在批准后，并拟发给全国参考。”毛泽东的批语，写在周恩来的送审报告上。3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卫戍区的这个布告。

对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职工、 干部的信稿的批语^[1]

(1967年3月)

照办。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67年3月16日送审的中共中央信稿上。信中要求全国厂矿企业职工、干部应该巩固劳动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和文化大革命的良好秩序；应该按照党中央的规定，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在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坚持文化革命，不许在生产时间内，擅自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要同一些无故旷工、敷衍了事的不良现象作斗争；应该按照党中央的规定，在文化革命中，促进自己的思想革命化，多快好省地进行生产，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产品的高质量，要同一些不顾质量、浪费国家资财的不良现象作斗争。信中指出，一切厂矿职工，都必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研究精兵简政的经验。既要大大减少脱离生产的人员，又要大大提高工作的效率。要注意节约闹革命。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一切厂矿职工，都必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高国家主人翁的伟大责任感，好好保护国家财产。如有破坏国家财产的人，必须按照国家的法律，严格惩办。党中央号召，一切在厂矿中工作的革命干部，应该带头做好各项工作，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和国家建设计划，尽最大的努力。党中央相信，一切厂矿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应该严格进行自我批评，应该在文化大革命中，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

努力当好群众的小学生，在工作中改造自己，将功补过。犯过错误的干部只要这样做，工人群众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对他们的批评，要采取毛主席历来指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混进厂矿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绝对不许乱说乱动，破坏生产，破坏职工之间的团结，制造和挑动派别纠纷。对他们的处理，可以根据他们的政治立场、劳动态度和厂矿的具体情况，分别对待。党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大力协助地方，支持工业生产工作，你们应该很好地同人民解放军的同志合作。196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这封信，要求在一切厂矿和基本建设单位中宣读和张贴。



1967年3月12日，毛泽东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

对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 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

(1967年3月16日)

党、政、军、民、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对《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材料的批语

(1967年3月19日)

林彪、恩来^[1]同志：

此件^[2]请阅。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切好的铁路局，也应派出军代表，吸取那里的好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2] 指《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的材料。材料说，齐齐哈尔铁路局管辖线路阻塞现象严重，每天都接到全国各地发来大批请求运送物资的告急书。要满足这些需要，每天必须运出5100多个车皮，而目前他们每天只能装运1700至1800个。外地运来的物资，每天也有200多个车皮卸不下来。铁路局的事故大大增加，到3月15日，已发生行车事故326起，比去年同期增加50%。这样短的时间内，事故之多，损失之重，是该局历史上罕见的。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纪律涣散，不听指挥；派别多（全局200多个组织），不但增加了脱产人员，而且经常争论，影响工作；有些人强调破框框，而把一些必需执行的规章制度随便破除了；领导干部“怕”字当头，放弃领导。3月18日，该局军代表介入文化大革命，成立了“三结合”的抓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并计划在各分局也成立指挥部，代替长期瘫痪的领导机构。但全局军代表只有40多人，困难仍很大，迫切希望驻军派更多的干部去加强领导。

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此事请研究酌处为盼！

毛泽东

三月十九日

对中央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 通知稿的批语^[1]

(1967年3月19日)

照办。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67年3月19日送审的中共中央通知稿上。通知稿指出，目前各地各单位正集中力量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同时在外串连的学生、群众刚刚返回，本地本单位斗、批、改的任务很繁重，因此中央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今年春暖后大串连的计划，望向学生和群众妥为解释。当日，中共中央即发出了这个通知。

对聂荣臻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 国防科研机构请示报告的批语^[1]

(1967年3月20日)

退总理照办。

毛泽东

三月廿日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1967年3月11日给毛泽东等写报告说，据了解，现在国防工业各部的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许多单位领导瘫痪，研究工作陷于停顿，三线建设也存在许多问题。这种情况必须迅速予以改变。建议对这些单位实行军事接管，接管工作由国防科委组织进行。按照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的精神，迅速恢复科研和生产工作。接管后，将遇到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强烈提出的改变现行领导体制的问题，建议一面恢复生产，一面即着手将国防工业部门及中国科学院的有关国防科研机构，结合批改，通盘考虑，进行一次全面的适当的调整和改组。报告中还提出了调整改组的五条原则。3月1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此向毛泽东等写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精神，经与有关同志商量，已向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部门宣布，准备实行军管。其办法拟每一部门只派出三人的军管代表小组，运用原有的机构领导业务。同时，推动各革命

群众组织进行开门整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帮助需要批判的各级领导干部检讨亮相，分别处理，以便最后实现各部门的革命三结合。对国防工业各部门的研究院、所和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拟同意聂荣臻同志的意见，交国防科委实行军管，并基本同意他所提的调整改组原则，待方案商定后再报批。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实行军管，其办法如对国防工业各部，商定后将分别报批。毛泽东的批语，写在周恩来的报告上。

关于“三相信、三依靠”的指示^[1]

(1967年3月20日)

这是一个好报告。

一、依靠群众。这一点是主要的。我们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嘛！群众就是工农兵学商。中央办公厅所属的干部都是群众嘛！工作主要是群众做的，靠少数领导人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那样也不能离开群众，要有群众观点。

二、依靠军队。我们的军队不仅会打仗，而且会做群众工作、宣传工作、生产工作等。军队内的很多干部很小参加军队，很少读书，文化是在部队慢慢提高的，思想比较单纯。军队和地方不同，没有地权，没有财权，说走就走了。省里有地盘，军队没有地盘，军队还有条组织纪律性强，行动快。如沈阳军队支左、支工、支农的经验，中央批转以后，全军在二十一天内就行动起来了。如果是地方传来传去，行动很慢。

三、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很快解放出来，要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委书记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群众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1] 这是毛泽东听了林彪3月20日在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后的指示。

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

(1967年3月23日)

—

戚本禹^[2]同志：

看过，写得很好。有一些小的修改^[3]，不知是否妥当，请你和同志们商量处理。

毛泽东

三月廿三日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写在这篇文章送审稿上的批语；本篇四是毛泽东在文章中加写的一段话。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1967年3月3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上，《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作了转载。

[2] 戚本禹，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3] 毛泽东对戚本禹文章送审稿的修改，除本篇四外，还在第二页删去了“毛主席”前面的四个定语“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此外，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

二

红灯照，又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似可在这里增加几句。^[1]

三

是翘还是饶，请查一下。^[2]

[1] 戚本禹的文章送审稿有一处引用了义和团流传的一首歌谣：“红灯照，义和团，亲兄妹，闹得欢，一个心，杀洋官。”在这旁边，毛泽东写了这个批语。根据毛泽东的批语，戚本禹在这首歌谣的前后各加写了一段话：“在义和团运动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动、最活跃的力量，他们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震惊中外的‘红灯照’，就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艺，保卫祖国。她们着红衣，戴红帽，提红灯，拿红枪，前方作战，后方除奸，积极参加义和团的起义行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表现了中国青年妇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气概！”“这首歌谣生动地反映了‘红灯照’反帝的坚强决心。‘红灯照’英勇斗争的事迹，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流传着。他们说，‘红灯女儿，一入兵阵，视死如归，于枪林弹雨中，惟恐落后’，‘中国自道咸以来，沿海防夷水陆各战，望风奔溃’，‘得此番小儿女一振疲瘁，不特寒众国之心，且壮中原之气’。”

[2] 戚本禹的文章送审稿中有一处写道：“影片还把义和团诽谤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它借大臣赵舒饶之口说：‘请老佛爷降旨，把义和团编为义军，扫灭洋人，立威天下，大清国运，就在此一举。’”毛泽东在文中“赵舒饶”的“饶”字下画了一道，并写了这个批语。赵舒饶，应为赵舒翘。

四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 大庆油田实行军管的决定稿的批语^[1]

(1967年3月23日)

照办。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67年3月23日送审的决定稿上。决定稿的主要内容是：一、自1967年3月27日，由沈阳军区派驻大庆地区的部队，组织大庆油田军事管制委员会，向油田所属各生产指挥部、各重点单位、各重要居民区派出军事代表，实行军管。二、油田军管会受沈阳军区和石油工业部双重领导，主要任务是接管油田的党政权力，统一领导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便最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镇压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油田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三、油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大联合。广大职工必须坚守生产岗位，遵守劳动纪律，勇挑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现在尚在外地串连的职工，要迅速回到生产岗位。四、要迅速健全和改组各级生产业务领导班子，积极恢复各级生产指挥系统的正常活动，保证生产、建设、科研、设计工作的正常进行。五、驻油田的外地师生和外单位职工，应立即回本校、本单位闹革命。六、大庆油田半工半读的学生，都要回原生产单位或本校复课闹革命。要遵照毛主席“五·七”指示，以学为主。七、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正确对待干部。对犯了错误的标兵、红旗手、劳动模范等，应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教育、团结他们。八、职工家属应努力搞好春耕生产，争取今年农业丰收。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了这个决定。

在一份反映宜宾文化大革命 情况简报^[1]上的批语

(1967年3月27日)

中央文革小组：

此事应加以处理。可找双方各十人左右来京商谈，成都军区甘渭汉^[2]也应来。请商总理^[3]酌办为盼！

毛泽东

三月廿七日二时

[1]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1967年3月26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四三五期，题为《四川宜宾革命派大批被关，斗争十分艰苦》。简报摘要登载了四川省宜宾县田禾3月14日反映宜宾“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来信。

[2] 甘渭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

[3] 总理，指周恩来。

对《“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1]一文的批语

(1967年3月29日)

王力、关锋同志：

此件很好，可以公开发表，并予广播。还应调查一二个学校、一二个机关的情况。

毛泽东

三月廿九日

请先印发参加碰头会的同志们及其他同志看一看。

[1] 这篇文章是以《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的名义写的，原题为《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现在的标题是毛泽东审阅时改拟的，原标题加上时间作为副题《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1967年3月28日，王力、关锋将这篇文章报送毛泽东时写道：“‘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此，我们过去调查不够，揭露不够，批判不够。似应在实现革命‘三结合’的过程中，对这个问题进行充分揭露和批判。一些典型材料，似可发给党内领导同志看看。”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1967年3月3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上，《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作了转载。

对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 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7年3月30日)

—

林彪同志：

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印成小册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作少许几处修改^[2]，是否妥当，请酌定。

毛泽东

三月卅日下午

[1]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1967年3月20日在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于3月30日送毛泽东审阅。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在林彪送审的讲话稿上的批语；本篇四、五是毛泽东对讲话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除本篇四、五外，毛泽东还作了以下几处修改：在第16页，将“夺取政权很多国家都实现了，可是都保不住”一句中的“可是都保不住”，改为“可是大多数都保不住”。在第28页，林彪讲到：“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这样要传至万万世，指导我们现在的一切，而且是全世界人民永远的思想财富，全中国人民永远的思想财富。”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这样要传至万万世”一句，并将两处“永远的思想财富”中的“永远”二字删去。此外，还有几处个别文字的修改和删节。

二

此处应引几句列宁的原话。^[1]

三

动物也不是孤立的个体，分为纲、目、属、种，故此句可删。^[2]

[1] 林彪讲话稿的第2页讲到，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有阶级斗争，改变了形式，有的地方变得更加激烈”。在这句话后面，毛泽东写了这个批语。中共中央1967年4月24日印发的林彪讲话中，在此处加写了以下两段话：“列宁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2] 林彪讲话稿的第4页讲到：“如果人是一个孤立的个人，那人同狗、牛、马、天上飞的鸟、水里边游的鱼，就没有区别了。”毛泽东删去了这句话，并写了这个批语。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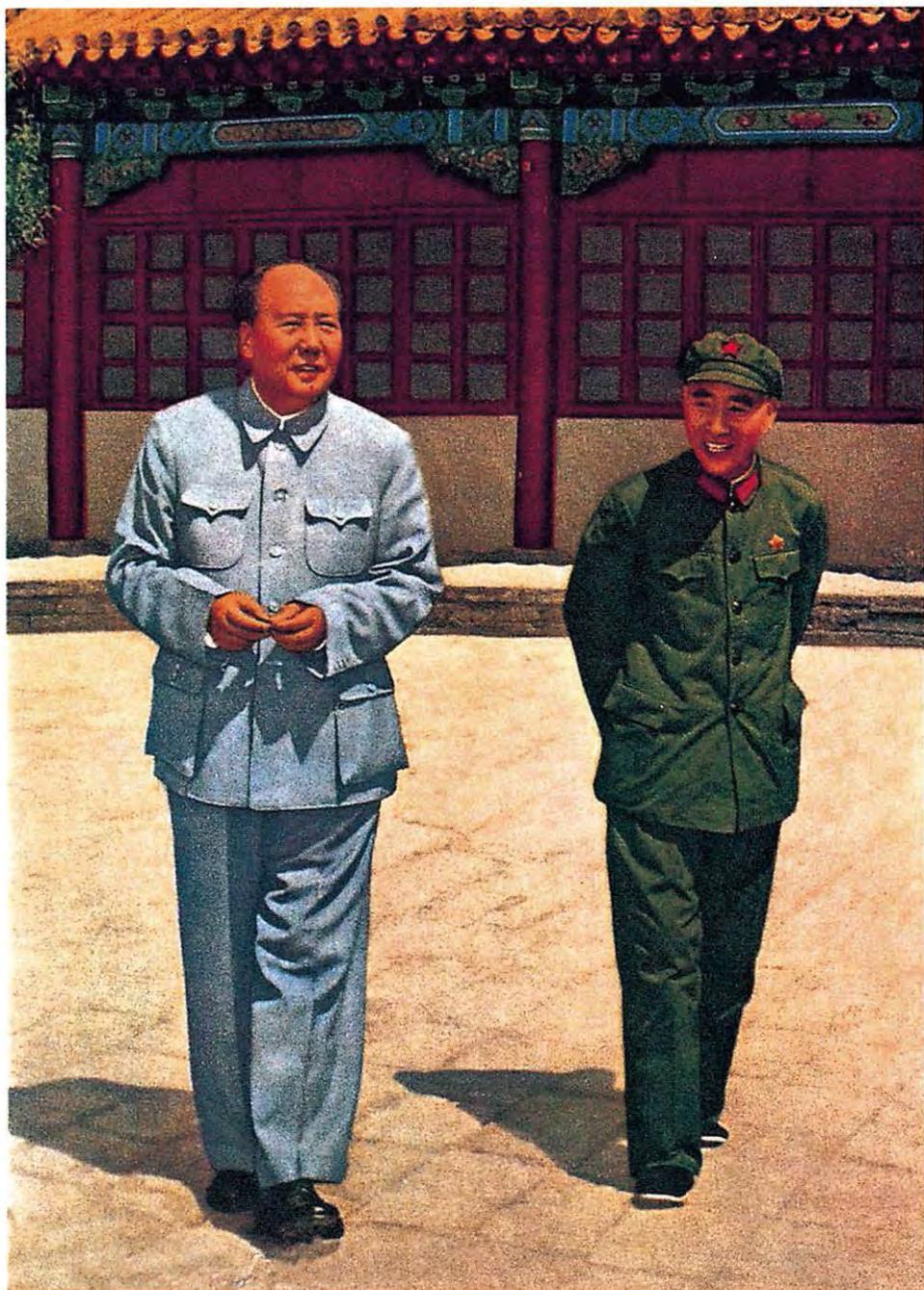
我们主席就特别地强调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一点，有些好的马列主义者也没有注意，更不用说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了。^[1]

五

因为中国，就现时说，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因素的国家。对于革命说来，对世界革命说来，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起决定因素的国家。什么中等国、大国，如果在这点上比较的话，无论如何，没有中国的作用大。只有中国不倒，中国不变色，世界就有希望。多数地方都修了^[2]，都黑了，我们还可以把它重新光明起来，重新由黑的颜色变为红的颜色。何况现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经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要革命的总是多数，希望我们给予支持。

[1] 林彪讲话稿中，这段话原为：“我们主席就特别地强调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一点，是斯大林所不能比的，更不用说什么赫鲁晓夫、什么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修正主义国家的头头，那就更不能比了。”

[2] 林彪讲话稿中，这句话原为“所有的地方都修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毛泽东和林彪。

对《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必须批判》^[1]一文的批语

(1967年3月30日)

王力^[2]同志：

看过，照发。

毛泽东

三月卅日下午九时

[1] 这篇《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发表在1967年3月3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上，《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作了转载。

[2] 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1]

(1967年3月)

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

走什么道路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五十多年，仍是这个问题。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在胜利中不要冲昏头脑

(1967年3月)

全国粉碎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搞尚未揭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有什么理由放松警惕？在胜利中不要冲昏头脑，在胜利中要戒骄戒躁。

对报纸工作的指示

(1967年3月)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报纸上有三个不够，调查得不够，揭露得不够，批判得不够。

关于党组织的指示

(1967年3月)

我们总要有一个党，现在这样的状况是一种暂时现象，没有一个党是不行的。各个革命造反派的组织怎么能代替党？革命委员会也不能代替党。

关于批判《修养》^[1]的谈话

(1967年3月、4月)

一

千万不要再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

二

这本书完全是欺人之谈。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到底要不要夺取政权，能不能夺取政权，怎样夺取政权，对于这些基本问题，这个小册子（即《修养》）避而不谈。根本不谈夺取政权，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政权，离开了阶级，离开了阶级分析，离开了阶级斗争，完全是一本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反动的、

[1] 指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不触及蒋介石一根毫毛的东西，是一株资产阶级的大毒草。

三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是反马列主义的。我看大学生应该更好地研究一下，选几段写文章批判。要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邓小平多年来的讲话。

四

我从来就不同意“驯服工具论”。

关于《毛泽东选集》注释等问题的指示

(1967年3月)

一、注释现在不要修改，这些人名都不要删掉，这些都是历史。没有司马炎、司马师、司马昭，何以成为《晋史》？

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得不好，可以不收。

三、《整顿党的作风》中引用刘少奇的一段话没有必要，可以删去。

四、新印《毛选》，仍用原来的日期。

五、《毛选》五、六两卷，一年以后再说，现在你们没有时间，我也没有时间。

六、《语录》第二〇八页引用刘少奇的话的一段也删去；第二〇八页标题“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

关于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的一组批语^[1]

(1967年3月至1971年3月)

一九六七年以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对外宣传工作和外事工作有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批示。毛主席的批示，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坚决贯彻。现将毛主席在中央办公厅、军委办事组、中联部和外交部等文电上的一部分重要批示和修改，汇总于后。

(一)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毛主席对澳共推荐来中国的大卫·库普反映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题为《让我们“治病救人”》的一张大字报的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

大卫·库普在这张大字报里分析了西安当时出现的两派对立，由

[1] 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本篇是中共中央办公厅6月8日印发的会议文件之六。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的批语和修改。1968年7月1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曾将其中(五)至(十)(十三)(十四)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并在通知中指出：“最近几个月，毛主席对对外宣传工作，作了极为重要而严肃的批示。现将毛主席的多次批示，印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党、政、军、群革命领导干部和外事工作干部中进行传达。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正确理解，坚决执行。一定要以毛主席的指示为武器，检查对外宣传工作，肯定成绩，纠正缺点，总结经验，提出改进的具体措施和办法。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对外宣传工作，做得更广泛深入，更切合实际，更科学，更有效。”

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打、砸、抢，游街等一系列情况，认为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并受坏分子的操纵。他提出，“要把那些存心要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然后我们才能搞造反派、革命干部和解放军的三结合”。

（二）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毛主席在《桑穆加塔桑就发表主席内部谈话问题的一封信》^[1]上批示：“康生同志：这类事，不要去责备发表的同志。”“一般谈话，公布也不要紧。”

桑穆加塔桑在这封信中说：“现在，有人告诉我，（同主席）谈话的内容未经同意不得公布。”

（三）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宾简报《安斋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批示：“康生同志：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望告。”

（四）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姚文元^[2]同志转达了毛主席对安斋等同志关于日本革命道路问题的意见的批示。

姚文元同志说：首先我向同志们（安斋库治等同志）转告一个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我向安斋库治等同志问候；毛主席看到了日本同志对日本要不要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意见，其中

[1] 指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1967年7月2日给在中国广播事业局工作的美国专家李敦白的信。信中就他在中国访问后回国时在机场谈话和回国后发表的文章中透露了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表示歉意。信中说，这“完全不是故意的”。“如果你能够找个时间去会见康生同志或刘宁一同志，准确地解释一下产生这个错误的情况，我不胜感激”。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宁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代部长。

[2] 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提到了对一九三八年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的一段论述是否有效的问题。毛主席对此有一个批示。我在这里把毛主席批示的原文念一下。毛主席说：“我认为安斋等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在一九三八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的论述，仍然有效。”这就是指的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所写的那篇著名文章《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所论述的问题。这篇文章的第一节第一段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主席在第一节第二段中完整地、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总结了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武装起义的经验。在那一段的最后有这样的话：“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毛主席所说的：“我在一九三八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的论述，仍然有效。”就是指这篇文章中的整个这一段话。

（五）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毛主席在一个拟在援外飞机喷刷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1]上批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

（六）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毛主席对关于开好一九六八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2]，作了重要批改。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1968年2月13日关于援越问题给总参谋部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鉴于援越飞机要在我国使用一段时间，建议和我空军使用的飞机一样，喷上毛主席语录和在座舱内镶上毛主席像章。改装训练结束后，原样移交给越方。

[2] 指1968年3月8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开好1968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稿。

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当做首要任务”之后，增加了“但应注意，不要强加于人”一句。

（七）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毛主席删去了我援外某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中的一段话：“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修建□□□□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并批示：“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

（八）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七日，毛主席在关于答复新共威尔科克斯同志对我对外宣传工作的批评的请示报告^[1]上批示：“此事我已说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组员姚文元1968年3月16日给毛泽东的这个报告说，1967年3月，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来访时，对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提出批评，认为我们的对外英语宣传，内容很好，但所采用的语言和形式，与英语国家的群众格格不入，易引起反感。1967年11月，他又委托访华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转达对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甚至说“中国同志应很好注意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希尔是反对威尔科克斯的意见的。他认为，威尔科克斯提出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而不仅是宣传形式问题。问题的中心是对毛主席在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作用作何评价。他认为，为了宣传毛主席把马列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就不能不十分强烈地、始终一贯地、反复地进行宣传，这样做对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对西方世界，是非常必需的。康生等在报告中说，对他们的意见，我们主要答复了三点：一、愿意倾听兄弟党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二、对毛泽东思想的估价，我们是非常克制的，不但不是大国沙文主义，而且克制得过分了，群众有不少意见。在对毛泽东思想的估价和宣传上，我们完全同意希尔的意见。三、在宣传形式和语言方面，我们的工作是在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的。改进对外宣传工作，需有一个时间和过程。

了多次。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

（九）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中共中央联络部起草的致缅甸共产党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贺电，作了重要修改和批示^[1]。毛主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缅甸情况相结合的伟大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也具有伟大的意义”，改为“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某一方面也将具有一定的意义”。

（十）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在发表緬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2]（涉及在我报刊上发表兄弟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上批示：“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

（十一）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毛主席在中央联络部、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帮助外国人员进行训练的文件中，将“主要是宣传全世

[1] 毛泽东对这个贺电稿的批示全文是：“有修改。请注意：以后不要在任何对外文件和文章中提出所谓毛泽东思想，作自我吹嘘，强加于人。毛泽东 1968年3月27日”

[2] 康生1968年3月28日给毛泽东的这个请示报告中说，缅甸共产党的声明，要求我们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不便给他们改，他们也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这是兄弟党中央的文件，他们在国内都讲毛泽东思想，如果要求他们改，可能发生误会，不登也不好，请主席指示，是否可以登载。这个声明后来照原文发表在1968年3月29日《人民日报》上。毛泽东对康生这个请示报告的批语，除（十）中所引用的一段外，在文中“一般地说”之前，还有一句：“这些材料，请你们酌定，我不看了。”

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二十一字删掉，并批示：“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

（十二）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毛主席批评了在一个文件^[1]中用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毛主席再一次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

（十三）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对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作了重要批示：“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2]

（十四）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一个接待外宾的计划中，曾经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工业军管小组1968年5月14日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七机部某办公室“正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召开415会议”，到会的大部分同志来自祖国各地，他们恳切请求毛主席接见。毛泽东审阅时，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下面画了两道杠，并写了这个批语。这个批语除（十二）中所引用的一句外，紧接着还有一句：“此事请康老在碰头会上提出并讨论一下措施。”1968年5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重要通知》。通知指出：“毛主席的批评，应引起各级党、政、军、群及驻外使馆的注意。”“今后，不论在报刊上（包括各种小报），在内部文件中，在各种讲话中，特别在接待外宾时，一律不要再用‘世界革命的中心’的这种说法。对于‘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应经常警惕和批判。”

[2]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1968年6月8日在转发毛泽东这个批语的指示中指出：“外国人关于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国际革命运动的影响的材料，可由新华社刊登在内部《参考资料》上。”

规定过群众在同外宾接触时可“自发地分别地赠送毛主席像章”。毛主席批示：“不要。”

（十五）一九六八年七八月间，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起草的关于处理某兄弟党要求发表它的一篇文章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删去了几个字”。报告中两处提到希望该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解决党内分歧，毛主席都把“毛泽东思想”这几个字删去了。

（十六）一九六八年八月，毛主席在军委办事组《关于更改援外军事专家名称》的报告和电报稿上批示：“名称问题关系不大，可从缓议。”“资产阶级传下来东西很多，例如共和国、工程师等等不胜枚举，不能都改。”“此件缓发。”^[1]

（十七）一九六八年九月，毛主席在《人民日报》社论初稿《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2]上的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1] 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1968年7月8日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写报告说，我援外军事人员现在仍称“军事专家”，“军事专家”是资本主义社会对资产阶级“军事学术权威”的称呼，与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我军援外人员身份不相称。我们建议，将“军事专家组”改称“军事工作组”，其人员按行政职务和工作性质，分别称组长、教员和翻译。如有“首席专家”，则改称工作组组长，下辖各军事工作小组。（十六）中的第一个批语写在这个报告上。8月6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再次给毛泽东等写报告，建议将“军事专家组”改称“军事组”。（十六）中第三个批语写在军委办事组8月6日的报告上。（十六）中第二个批语写在8月6日报告的信封上，在这个信封上，毛泽东还写有“林副主席、总理再阅”一句。

[2] 这篇社论稿经毛泽东修改后，在196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社论的有关段落如下（毛主席删掉的地方，下边画了横线；增加的地方，用 || 括住）：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毛泽东主席给日本工人朋友赠了亲笔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今天是这一光辉题词的六周年纪念，本报在头版位置上发表了毛主席题词的手迹。毛主席的这个题词，不仅对于日本人民的革命事业，而且对于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一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能够产生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去推动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各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反复地教导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实践相结合，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

毛泽东同志把理论和实践相联系这件事，生动地比作为“有的放矢”。毛泽东同志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及在无产阶级专政

底下继续进行革命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问题，从而把中国革命从胜利引向胜利。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条原则适用于中国革命，也适用于日本和一切国家的革命。这就是说，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时，必须从实际生活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独立地制定和实行符合本国情况的政策和策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借口什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那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即现代修正主义！

日共宫本^[1]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借口日本“国内外条件”不同，标榜什么“独立自主”，其实都是鬼话。他们在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们所起劲地攻击和反对的，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竭力歪曲和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疯狂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武装夺取政权，鼓吹所谓“和平革命”，推行所谓“议会道路”。实际上就是不要革命，背叛革命，反对革命。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可耻叛徒，是日本革命事业的可耻叛徒。

今天，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蓬勃兴起。毛泽东思想在日本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日本人民的革命觉悟不断提高，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左派队伍正在日益成长壮大。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人民，大造宫本修正主义集团的反，把{真正的}马克思

[1] 宫本，即宫本显治，当时任日本共产党总书记。

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他们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武器。日本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派认识到，摆在自己面前的一个光荣而严肃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认真地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具体运用到日本人民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从日本的具体情况出发，解决日本革命的一系列战略和策略问题，把日本革命不断地推向前进。日本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紧密地相结合的过程。

我们相信，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日本真正的革命党，一定会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诞生。它将领导日本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赢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我们的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正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世界各地广泛地传播。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世界各国人民必将朝着胜利的航向，继续奋勇前进！

（十八）一九六八年九月，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起草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送审稿）》的批示：“去掉第11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¹¹

[1] 周恩来等1968年9月25日送审的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名义下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共30条，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第11条，并写了这个批语。9月2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向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发出的通知中，标语口号共29条，删去了送审稿中的第11条。

送审稿的第11条是：“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

(十九) 一九六八年九月，外交部《关于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访华接待计划的请示》原文中有“通过安排参观访问，突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以及工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毛主席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一句删掉了，并批示：“对这些不应如此做。”

原文附的《欢迎（送）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的标语口号》十九条，毛主席批注：“去掉三条”。（即：17.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18.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19.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二十) 一九六九年一月，毛主席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1]上批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2]。”

(二十一) 一九六九年五月，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五月二十四日声明稿^[3]上批示：“可用。略有修改。”

[1] 这篇文章发表在1969年1月28日《人民日报》上。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

[2] 1969年1月28日，《人民日报》以《一篇绝妙的反面教材，美帝新头目尼克松的“就职演说”》为题，全文登载了尼克松1月20日的就职演说。

[3] 周恩来1969年5月19日送毛泽东等审阅的这个声明稿，是为答复苏联政府3月29日声明的。内容共分六个部分：一、珍宝岛是中国的领土，珍宝岛事件是苏联政府蓄意挑起的。二、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都是沙俄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三、中苏之间存在边界问题的事实是抹杀不了的。四、苏联政府破坏边界现状，挑起边境冲突。五、到处扩张领土的是苏联政府。六、中国政府主张和平谈判，反对诉诸武力。这个声明1969年5月2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毛主席在声明稿的“中国政府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一句中的“日期”之后加了“和地点”三字。并在“如果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的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是软弱可欺，可以用核讹诈政策吓倒中国人民，用战争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那就完全打错了算盘。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七亿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一段中，将“不是好惹的”改为“是不好欺负的”，还加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句。

（二十二）一九六九年六月，毛主席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1]，批示：“可发。”

毛主席在社论的第二段“二十年来，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句中的“繁荣昌盛”前边加了“有了初步”四个字，将“强国”改为“国家”。毛主席并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

（二十三）某拉丁美洲共产党总书记等人，从一九六九年三月至十二月间，先后给我党中央和林彪^[2]同志四次来信，承认过去追随苏修反华是错误的，要求同我“恢复两党关系”。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二日，毛主席在中联部抄印来信的文件上批示：“林彪同志：这些信看来似无恶意。他们被人抛弃，想寻出路。请转康生同志考虑是否可以同他们联系。”

[1] 这篇社论1969年7月1日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上发表。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二十四) 一九六九年九月，毛主席对外交部《关于给日中友协（正统）各地组织庆祝我国庆集会发感谢支持电》中的“二十年来，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特别是在三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句中的“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为“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二十五) 一九七〇年六月三日，中国红十字会《关于救济秘鲁地震的请示》，拟以该会名义慰问并捐给秘鲁红十字会现款人民币五万元。

一九七〇年六月七日，毛主席口头指示，给秘鲁救济五万元人民币太少。给罗马尼亚救济了一百万元，秘鲁比罗马尼亚死人多，可否给秘鲁救济一百万或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请总理酌定。

(二十六) 一九七〇年六月，外交部在“关于我救济匈牙利遭水灾地区居民的请示”中，建议我红十字会捐现款十五万元人民币。毛主席批示：“似太少，可赠五十万元，等于赠罗之一半。”

(二十七) 一九七〇年九月，毛主席在中联部起草的我党中央致朝鲜劳动党成立二十五周年贺电稿上，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中国人民”里的“毛泽东思想”五个字圈去。

(二十八) 一九七〇年十月，毛主席在外交部起草的给日本社会党成田知巳^[1]的复信稿上，作了修改。原复信稿中说，“社会党朋友

[1] 成田知巳，当时任日本社会党委员长。

更应继承和发扬浅沼^[1]精神，为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伙伴、走狗、帮凶而进行斗争。如先生同意这一意见，我们欢迎日本社会党代表团于十月中旬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毛主席将“社会党朋友更应继承和发扬”中的“更应”两字圈掉了，将“如先生同意这一意见，我们欢迎……”改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欢迎……”。

（二十九）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外交部在《关于对越南南方五省受灾的慰问和赠款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建议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向越南南方解放红十字会捐赠价值二百万人民币的物资。毛主席批示：“宜增至五百万。”

（三十）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六日，毛主席在中联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2]

[1] 浅沼，即浅沼稻次郎，1955年至1960年任日本社会党书记长。1959年3月，率社会党友好使节团访华，在北京政协礼堂发表演讲，提出“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引起日本各界极大反响。1960年3月任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同年10月12日在东京日比谷公堂召开的三党党首讲演会上讲演时，被刺身亡。

[2] 中共中央1971年曾将这个批语作为《毛主席、林副主席最近批示的八个重要文件》之三印发，1994年编入《毛泽东外交文选》。

(三十一) 一九七一年二月，旅游局在《关于一九七一年接待外国人来华旅行的请示报告》中说，一九七一年拟接收外国人来华旅行八百至一千人，对象以左派和对我友好的工农、学生、教职员为主，上层友好人士有计划、有选择地少量接收。毛主席批示：“人数可略增加。右派也可来一点。”

(三十二) 一九七一年二月，外交部办公厅编印的《外交活动简报》第二十九期《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的第四条中称，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同志上井冈山这两段历史提出意见说：这两段历史应该提，不提中国人容易理解，外国人就不容易理解。提这两段历史事实不仅不会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相反人们会通过当时对各种错误路线的了解，更加体会到毛主席路线的正确。对此，毛主席批示：“第(四)条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

(三十三)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周总理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我乒乓球队拟仍前往日本名古屋参加三十一届国际乒乓球比赛。到日本后支持柬民族团结政府不承认朗诺^[1]集团的球队为合法，并主张驱逐，对南越卖国集团派的球队，亦采取同一态度，对以色列也询问阿联、叙利亚的态度。如不成，就避开与他们比赛。我球队如去，当作好各种警戒准备。^[2]毛主席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 朗诺，当时任“高棉共和国”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武装部队四星上将总司令。

[2] 周恩来的报告中还说到，日本群众得知中国乒乓球队拟参赛后，热烈欢迎，左派组织了500多人保护我球队，但右派也派人到名古屋企图挑衅，日本政府极为头痛，已派大批警察护卫我队预先分住的旅馆。这将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中国乒乓球队后来参加了这届世乒赛，并获得男子团体冠军、女子团体亚军。

在中央关于安徽问题决定稿中 加写的一段话^[1]

(1967年4月1日)

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

[1] 周恩来1967年3月30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稿共五条，其中第二条讲到：“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在此后面，毛泽东加写了这段话。4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决定。

对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 十条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7年4月4日、6日)

一

林彪同志：

此件很好。只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改^[2]，是否适当，请酌定。建议以草稿形式印发军区会议各同志，征求意见，修改后，即可发出。

毛泽东

四月四日

二

林彪同志：

已阅。请再送中央常委碰头会议讨论批准，即可发出。^[3]

毛泽东

四月六日

三

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1]

四

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1967年4月2日送审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林彪4月5日送审的命令修改稿的批语；本篇三、四是对林彪4月2日送审稿中第一条、第六条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送审稿的修改，除本篇三、四外，还将第三条中“对于确实查明的反动组织”一句，改为“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删去第四条“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一般的概不追究”一语中“一般的”三个字；把第四条中“不能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来划分左、中、右”一句，改为“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删去第七条“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一句中“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这些字。此外，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

[3] 中共中央军委1967年4月6日发出了这个命令。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的十条命令是：（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斗争。广泛搜集揭露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八）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命令中提到的赵永夫，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副组长。1967年2月，“联办”领导小组在支左工作中，将

青海省造反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确定了“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于2月23日调动武装部队夺占“八·一八”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导致部队开枪的严重事件。赵永夫是当时夺占报社部队的组织者和现场主要指挥者。197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指出“1967年2月，青海省军区内部发生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二·二三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但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

[4] 林彪1967年4月2日送审稿中，这句话原为：“对未向我开枪的群众，无论革命的、反动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对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 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7年4月)

—

退江青。

可以，照办。^[2]

毛泽东

四月十六日

二

看过，删了一点。^[3]

三

主席说，这篇文章^[4]，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

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四

几个月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1967年4月12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整理稿，曾先后两次送毛泽东审改。本篇一是对江青1967年4月15日送审的讲话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江青4月17日送审的讲话修改稿的批语；本篇三、四是对江青4月17日送审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江青1967年4月15日给毛泽东的送审报告说：“这是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林彪同志说是要发。我改了几次，缺引证，不够典，因为没有发言稿。我希望得到你的批改。”对于这次送审稿，毛泽东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在第5页，对江青讲的历史上“触詔说赵太后”的故事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在第7页，江青讲到军队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时说：“从前说是不介入，其实这个不介入，主席早就说过是假的，实际上早已经介入了。”在其中“主席早就说过是假的”一句前，毛泽东加了“就许多单位说”一语。在第9页，江青讲到文化大革命前17年“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其中的“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一句前，加写了“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9个字。此外，还有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增删。

[3] 毛泽东对江青1967年4月17日送审稿的修改，除本篇三、四外，

还有以下几处：将第4页上“目前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一句改为：“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删去第6页上“学习主席的工作方法，再来搞调查研究，找到真正的左派”一句中“学习主席的工作方法”9个字。在第7页，送审稿讲到广州市的文化革命情况时说：“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分化瓦解它那个组织。”毛泽东把其中的“分化瓦解它那个组织”一句改为：“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在第9页上，送审稿讲到文化大革命前17年文艺创作和教育情况时写道：“基本上是名、洋、古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完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毛泽东把其中的“基本上是”改为“大量的”，将“那完全是”改为“那几乎全是”。在同一页上，江青讲到她在建国初期辞去一些工作职务时说：“我自己思想上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毛泽东改为：“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在第10页，江青讲到文化大革命前“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毛泽东把其中的“都是”改为“大量的”。在第13页，江青讲道：“我身体上慢性病是很多的，但是我的心脏是好的。前年冬天就被他们整出心脏病来了。”毛泽东删去了这些话。在第14页，江青讲道：“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并在“姚文元同志”后面加括号写了“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10个字。此外，对这个讲话稿，毛泽东还作了一些其他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增删。

[4] 指《战国策》中的《触誓说赵太后》一文。



文革期间的毛泽东和江青。

接见谢富治时的谈话

(1967年4月19日)

我祝贺你，祝贺这次大会的成功。请代向全北京市革命造反派祝贺。

致敬电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宣言，就不要再搞宣言了。

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产，这样会造成脱离群众的，要半官半民。北京的形势还有反复，无政府主义就是机会主义的惩罚。要不怕犯错误，各种反动的观点和反动的群众组织是极少数的。就是反动组织也要做工作，但是还得斗争。

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报告的批语^[1]

(1967年4月23日)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1967年4月20日给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等人写报告说，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四川地区截至4月19日，已释放被逮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共27865人，占总数的85%。4月21日，周恩来批示将这个报告“印发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参加四川会议各同志”。毛泽东审阅时，写了这个批语。

林、周^[1]阅后办。

[1]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关于将河南两派领导人调来北京 商谈解决问题等的批语^[1]

(1967年4月23日)

林彪、恩来同志：

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2]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3]，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杨蔚屏^[4]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

[1] 这个批语是毛泽东看了中共河南省军区委员会1967年4月22日关于河南各造反派组织准备近日派4000余名代表进京反映问题的报告后写的。

[2] 陈再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钟汉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刘建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

[3] 赵文甫，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

[4] 文敏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纪登奎、戴苏理，当时均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蔚屏，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对《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 意见改进工作》材料的批语和注文^[1]

(1967年4月23日)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1967年4月21日编印的《快报》第一九四〇号上登载的这个材料说，陕西省军区和驻陕部队负责人4月中旬以来，连续召集西北工业大学和西安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革命派、西安交通大学文革总会代表座谈，听取他们对支左工作的意见和批评。座谈中，同学们批评了部队在前段支左工作中，旗帜不鲜明，调查研究不够，没有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批评部队没有把训练内容和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所以训练中几次出现贴军队大字报的高潮，说部队“在学校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在这段话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注，即本篇二）。部队负责人欢迎和感谢同学们诚恳、善意、坦率的批评，并因势利导地转入讨论如何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做好促进造反派大联合的准备工作。讨论中，“李世英同学对军区支左提出了八条意见”（在“李世英同学”5个字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注，即本篇三）。其中第七条意见是“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这一条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注，即本篇四）。第八条意见是：“在做好各院校思想工作的基础上，采取互相串连的方法，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加强相互间的了解，增强团结，促进两大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在这一条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注，即本篇五）部队负责人认为，李世英提出的意见是对的，表示支持，并决定召集西工大等4校负责人，就如何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促进造反派大联合，作进一步协商和讨论。本篇一是印发这个材料的批语，写在这期《快报》的报头上。

一

林彪、恩来^[1]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2]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

二

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毛注

三

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毛注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2] 指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四

这是最基本的一条。——毛注

五

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毛注



1967年4月24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接见各省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



庆祝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成立半周年 (宣传画)

关于部队支左的指示

(1967年4月)

军队的威信必须坚决维护，不能有半点含糊。拥军爱民社论的发表是当前工作的中心。军队第一次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军管是大规模的战斗任务，犯错误是难免的，问题在于当前主要危险是有人把解放军打下去。

支左支错，支到保守派方向去，改过来就行了，允许的嘛。我们在这五大工作中，三分之二做对了，三分之一做错了，就是很好了。

有的受老婆孩子观点的影响，有的是县委书记或地委书记，他们的孩子是个地方的保守派，或者是老婆是个地方当权派之一，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关于四川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1967年4月)

从宜宾问题的揭发，才开始揭开了四川阶级斗争盖子的序幕，才开始揭开李井泉的盖子。四川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刘、邓、李井泉搞的，他们把刘结挺打成反革命，把他们开除出党，这次才翻过来。以后要把这个材料印出来，发给每个党员。四川阶级斗争的揭盖子，两条路线斗争还未解决。

和某同志的一段谈话

(1967年4月)

毛泽东：你们说是北京的大学大联合了，成立了红代会，很好呀！那三个司令部呢？

答：没有了，都取消了。

毛泽东：啊，为什么要取消呀？我才不相信呢，已经取消了？

关于军管问题

(1967年4月)

军管太少了。

刘邓派工作组是压迫革命、反对群众，我们军管是支持革命的。

关于革命派的大联合

(1967年4月)

目前全国斗争形势很好，成绩很大，经验很多，全国都在前进中。革命派在优势情况下，可按系统、按部门、按单位。但要注意保守派把造反派吃掉，不要用解散革命造反派的办法实行大联合。

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

(1967年4月)

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是对的。左派起来了，对立面也起来了，这也不要紧，有点反复有好处。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要走向反面。

要把所有的联动放出来。

(现在号召斗、批、改，有人屁股坐不住) 要学生坐得，要到夏天。

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1]

(1967年4、5月)

我们一定不要脱离群众，不能脱离群众是一条；另外一条就是不能脱离马列主义。

我们党在四九年、五〇年、五一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篷。当时刚打完仗，还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

一九五二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干部在群众当中开始受冷落。当时，在干部当中实行了薪金制，军队住了营房，机关盖了高楼大厦，过去和群众在一起吃、穿、住，现在有些脱离群众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听我的话。刘少奇、高岗、彭德怀学习了苏联那一套。薪金制我是不赞成的。学苏联那一套我也是不赞成的。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它改变过来。

我们这些干部是经过长期锻炼的，还是要有些人站出来。现在的情况是：站出来就打。我们的事情总是要有人挂帅的。红卫兵能挂帅吗？今天上台，明天就会被打倒，原因是政治上不成熟。现在我们要做很多工作，使那些主要干部站出来，哪怕是黎元洪^[2]式的

[1] 这是毛泽东在1967年4月29日至5月1日举行的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 黎元洪，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黎元洪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

人物也是好的，出来两年也好。红卫兵不行，没有经过锻炼，这样大的事情，信不过他们。

要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是要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赶快解放出来，要让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委书记过去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人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要爱护干部，要支持革命领导干部出来，革命小将现在叫他们挂帅还不行，有个培养的过程，但小将是可爱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我们现在要搞三结合，要使青年参加各方面的领导工作。不要看不起青年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可以接受他们做事情，不把新一代搞上来怎么使他们受到锻炼？这个三结合就是老、中、小，就是二十岁以上就行了。

我们提倡青年人上台，有人说青年人没有经验，上台就有经验了。过去也提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那是从形式上讲的，现在要落实在组织上。

三结合，老、中、小要三结合，不主张把老干部都打倒，老干部一天天见上帝了。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机构改革要适合

联系群众，不要搞官僚机构。

过去党团员受《修养》的影响脱离了群众，没有独立的意见，成了驯服工具，各地不赞成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过半年或一年后再恢复。文化大革命不仅对干部，而且也是对党团员的大审查，大多数一定是好的。有的干部群众意见较大，可过二三年以后再说工作，有些干部可以立即恢复工作。对于犯错误的人要给以改正的机会。联动要放出来，没有右派，就没有左派。搞薪金制军衔我从来就反对。

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1]

(1967年5月1日)

我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2]上曾经讲过：“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胜负还没有分晓，很可能修正主义胜利，我们失败。”我们用可能失败去提醒大家，有利于促进大家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性，有利于防修、反修。实际上共产党内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存在着的，任何人否认都否认不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当然不应该去否认它。自这次大会以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斗争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中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

[1] 这是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2] 七千人大会，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000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报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12年的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会议在进行过程中，不少与会者认为会议对反对官僚主义和发扬党内民主重视不够，要求给他们讲话的机会。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在1月30日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突出强调和系统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会议遂开成了民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大会。与会者对各省委、各中央局和中央国家机关提出了批评意见。各地区、各部门的负责人作了自我批评。

治等等。在这以前适当的文件中已有了论述。

今天，贵国是以军事代表团来了解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我首先就这个问题谈谈看法。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1]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2]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这个信号一出来后，遭到了彭真等人坚决反对。因为敌人是特别敏感的，这里有一个信号，他那里就有行动。当然我们也必须行动。所以我在中央常委会主持制定了五月十六日的通知。这个通知中央已明显的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的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当时是有很多人仍

[1] 江青，文革前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1950年曾主导对武训的调查并推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63年起推动现代京剧的改革，其成果被称作“八个样板戏”，曾有著作《谈京剧革命》（1964年）。文革开始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2] 红色城市，指北京。

然不通的，李井泉^[1]就不通，刘澜涛^[2]就不通。伯达同志找过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查自己。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重点是在一九六六年十、十一、十二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批判，这是公开挑开了党内的矛盾。由对这一路线的批判，启发了许多革命派的革命激情。这里边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这是符合革命发展规律的。这里顺便提起一个问题，就是广大工农党团骨干，在批判反动路线过程中受了蒙蔽。我们研究，对受蒙蔽的同志怎样看？我从来认为广大的工农兵是好的，绝大部分党团员是好的。无产阶级各个时期的革命他们全是主力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例外。广大工农兵是具体劳动者，自然了解上层的情况少，加上广大党团骨干内心对党、对党的干部无限热爱，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他们受了蒙蔽，甚至较长一段时间内转不过来，这是有历史因素的。受了蒙蔽改了就好了嘛！随着运动深入发展，他们又成了主力军了。

“一月风暴”^[3]就是上海工人搞起来的，随后全国工农兵起来了。广大工农一起来，才较彻底地冲垮了资产阶级那一套，革命的

[1] 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2] 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兼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并担任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

[3] 一月风暴，又称“一月革命”。1967年1月，以上海为开端，全国爆发了自下而上的夺权运动，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一月风暴”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

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不得不退居到从属的地位，不是吗？工人一起来就冲垮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这是革命发展规律，民主革命是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但真正的北伐长征式的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做主力军去完成，靠工农兵完成。工农兵实际上只不过是工农，因为兵只不过是穿军装的工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广大工农兵做主力军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算做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为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1]。以后，可算做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本来“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一再着急大联合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客观发展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个政治势力都还要顽

[1] 1967年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中央在5月11日的通知中说：“希望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强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任何阻力地泛滥出来了，因此破坏了大联合。大联合，捏是捏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中央现在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的。北京市的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除了农代会打得比较少一点外，工代会、红代会彼此打得都热闹，看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还得改组。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现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现，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场有人答：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

中央一再强调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观是不能强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去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文化大革命出了两千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次可能出四千。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十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以增强随时防修、

反修的能力。

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这都叫“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叫作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有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也说这是“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但既然犯了错误，这就说明你这个老干部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今后，老干部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化。作为革命左派，更应灭资兴无。否则资产阶级思想长期不清理，也要走向事物的反面。你不信吗？我问大家，你们说究竟怎样具体地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你仔细考虑过吗？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所以今后要不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真正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在世界观的改造上狠下功夫。

我说，革命小将革命精神很强烈，这很好。但你们现在不能上台，你们现在上台明天就会被人赶下台。但这话被一位副总理从自己话里说出去了，这很不对。对革命小将是个培养问题，不能在你们犯有某种错误的时候，用这话给他们泼冷水。有人说选举很好，

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做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也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不那么样达到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对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现在这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不能乱用。“革”与“保”全是有强烈的阶级性的，对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地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经过长期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宁左勿右，形左实右，从表面上看来，永远比实事求是更革命些，但永远是我们所不提倡的，这是资产阶级范畴的东西。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只是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但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必须做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很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群众中的坏人最多只是百分之五，但他们是分散的没有力量的。以百分之五、三千五百万算，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军队有组织地反我们，那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但他们分散在各地没有力量，所以不应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的关键阶段，要防止坏人钻空子。所以大联合应有两个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能奏效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第四阶段，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所以安排大批判的时间比较长，中央文革还在讨论，有人认为今年年底为宜，有人认为明年五月份为宜。但时间

还得服从阶级斗争的规律。



1967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阿尔巴尼亚的军事代表团的同志亲切交谈。

“五一”节对中央首长的谈话

(1967年5月1日)

我们今天是老、中、小相结合的大会。(这时向朱德)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中年的四五十岁了，广场上是小将。今天的大会是个大联合。

我们看干部要从历史上全面地看干部。今天除刘、邓、陶之外，其他的都来了。各省第一书记都要回去，还是要做工作，江□□、江□□、谭□□不是三反分子。陈□□思想上、作风上蜕化，应很好改造。廖□□过关了没有？应让他过关。王震不是三反分子，是个粗人，建议谭□□同志去拜访他。余秋里讲假话，谷牧三六年被捕过，比较困难一些。

地质学院的一些红卫兵对老师的一些历史一点也不懂。有人找我摸底，我说：“所有老师统统打倒怎么办？你们来做行吗？”打倒谭□□，今天还不是在这里开会吗？徐向前主持全军文革。(徐说：我身体不好，请肖华代替我工作。)还是你搞吧！

邓和刘有区别，邓历史上闹独立王国，不理我，在中央书记处还临阵逃脱，以后反王明路线是我一派的。

刘少奇二五年被捕过，后来被人保出来了，住在北京。刘少奇一条路线，一个理论，一个班子。六人小组，谣言很多，完全是造谣。

联动大部分是好的，少数不好，有什么要紧啦！成都让他们承认错误就行了，他们不是承认了错误吗？不是改得很快吗？

（与王震在天安门城楼上握手）王胡子，我很久没有看到你了，有人要打倒你，能打倒吗？是打不倒的吧！你对打倒你的人要宽大嘛，宽大嘛！

“五一”节和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谈话

(1967年5月1日)

江青：这是国家科委张□，她们把韩光一伙打倒了，她们那里运动搞得不错。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应该祝科委同志们万寿无疆，应该祝人民万寿无疆！

毛：女同志也一样造反嘛！你们把反革命韩光打倒了，你们夺权夺得好！

毛：你现在担任什么工作？

张□：在国家科委革命委员会工作。

毛：是革命委员会主任吧？

周恩来：也就是了吧！

毛：她原来是个局长，和群众一起造反。



1967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京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



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宣传画）



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宣传画）



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

——首都三百万群众欢度五一节

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宣传画）

在“五一”节中南海晚会上的谈话

(1967年5月1日)

(毛泽东听到江青介绍京剧团有人被打的事后)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现在还打不打了?

演员:现在我们都团结一致了。

毛:不打了,好。

毛:现在还有没有反二簧、反西皮?

演员:在革命现代戏中,反二簧、反西皮可不可以用?

毛:我看可以用。

对棉粮工作的指示

(1967年5月1日)

必须把粮食抓紧，把棉花抓紧，把布匹抓紧，粮油征购工作不仅是一个经济任务，它首先是一个政治任务。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收、管、吃）抓得很紧，而且抓得及时。

不注意储备，铺张浪费，吃光用光，这些都是错误的，都是粮食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者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关于大批判问题的指示

(1967年5月2日)

批判文章不要像九评那样长，每篇一二千字，不要超过三千字。一篇一个中心，一个概念，明明白白。长了就没有人看，记不住。

同意。团结和服从都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

年纪大的、年纪中的、年纪小的也要“三结合”，不要看不起年轻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都能做工作。搞“三结合”，要老中小，老的都会去见上帝的。

今年形势好，布、粮还是要抓。社论要搞快一些。批判文章文字要短。彭、罗、陆、杨可以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其他人都称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文章中提，在标题上要提。

大批判要慎重，要确实，要调查清楚。调查清楚，批判才有力量，否则就会一风吹。引他（指刘少奇）的话不能只顾头不顾尾。批判要站得住。“托拉斯”这个名词，不能一概驳，主要驳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些旧名词要赋予新的意义。

“驯服工具论”要批判，但也要有无产阶级纪律。服从、团结，那是有条件的。

写文章要琢磨，要准确，要尖锐明确。

对《〈修养〉^[1]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的批语和修改^[2]

(1967年5月4日、6日、7日)

—

有些意见，写在文内，请酌定。

毛泽东

五月四日

[1] 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这是刘少奇1939年7月在延安马列学院所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原载1939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八十一至八十四期，并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单行本。1949年经刘少奇校阅并作了若干修改后，由解放社（人民出版社的前身）出修订第一版。1962年刘少奇又校阅了一次，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补充，将原来的两部分调整为九节，由人民出版社出修订第二版。

[2] 《〈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由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王力、关锋起草，经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修改，作为《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发表在1967年5月8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和5月8日《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曾多次送毛泽东审阅。本篇一是毛泽东对5月2日送审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5月5日送审稿的批语；本篇三是对5月7日送审稿的批语；本篇四、五是毛泽东在送审稿中加写的两段话。

改后应送小组^[1]及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又及

二

退文革小组。

在第7页，加了几句话^[2]，请研究，是否妥当。定稿后，请印正式清样送阅为盼！

毛泽东
五月六日

三

照此发表。

毛泽东
五月七日下午七时

四

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

[1]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2] 即本篇四。

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1]，有陶潜的《桃花源记》^[2]，有康有为的《大同书》^[3]，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

五

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1] 《礼运》是战国时期至西汉初期儒家思想及礼仪著作选集《礼记》中的一篇，其中所讲的“大同”是指一种“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2] 陶潜，即陶渊明，东晋诗人。他的散文《桃花源记》描述了一个与世隔绝、没有祸乱的“世外桃源”。

[3] 康有为，中国近代政治家、思想家，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他的《大同书》将《礼运》中的“大同”说与儒家公羊学派的“三世”说结合起来，提出自己的“大同”思想，认为“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

对张香山^[1]关于《矛盾论》中一段引文 翻译问题的请示报告^[2]的批语

(1967年5月4日)

如何处理，请康^[3]、王、关三同志酌定。

毛泽东

五月四日

[1] 张香山，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

[2] 张香山1967年4月24日给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王力、关锋写报告说，主席《矛盾论》中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矛盾……。”这段话没有引全，因此主席用了删节号。我们原来的英译本在英国出版时，照主席引文译出。但这次在北京出版再译本时，英方认为这样有问题，译者给补全了。这样，如果中英文对读，就会发现中英文不符。为避免这一问题，我们建议应照主席引用的文字翻译，不必补足。但外文出版局专家艾德勒来信表示不同意，认为这样处理曲解了恩格斯的原意，并说恩格斯的这段话原是指矛盾的特殊性，而不是指矛盾的普遍性。艾的理解可能是正确的。问题是主席引用这段话，乃是为了说明矛盾的普遍性的，因此即使引全了，也还不能解决艾所说的问题。对此应如何处理，请你们批示。在后来出版的英文再译本中，是按恩格斯这段话的全文翻译的。如照此译成中文，应为：“我们已经提到，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是这样一个

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直线和曲线应当是一回事。高等数学还有另一个矛盾：在我们眼前相交的线，只要离开交点五六厘米，就应当认为是平行的、即使无限延长也不会相交的线。可是，高等数学利用这些和其他一些更加尖锐的矛盾获得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初等数学所完全不能达到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3页）

[3] 康，指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在山东省军区关于山东地区 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的报告上的批语

(1967年5月7日)

林彪、恩来^[1]、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2]请阅。看来山东学生、工人出事地点（就全省说，占少数），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大都可能有些问题。此事应如何解决，请你们研究出办法，告我为盼！

毛泽东

五月七日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1967年5月4日给济南军区并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电报。电报说，山东地区目前的斗争锋芒指向了解放军，越来越明显，已波及各地区。主要表现是：一、到处张贴、散发攻击解放军的大字报、标语、传单，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武装部参加“三结合”的领导干部，几乎都被公开点名，成为打倒的主要对象。二、冲击军事机关，围攻、绑架部队人员。三、侮辱、殴打和斗争解放军干部、战士。以上情况正在向基层发展，使许多军分区、县市武装部无法进行工作，严重影响了战备等工作的进行。各地“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已有不少处于瘫痪状态。这种事态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将会使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山东及各省，正规军弄错的较少。重庆54军有电报说关于支持重大八·一五^[1]是否错误问题，宜找两方面人都来，和梁、张、甘、韦^[2]诸同志共同商处。

毛泽东又及

[1] “八·一五”是当时重庆大学的一个群众造反组织。

[2] 梁，指梁兴初，张，指张国华，甘，指甘渭汉，韦，指韦杰，当时分别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司令员、第一政委、第四政委和副司令员。

对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支左干部 集训情况报告的批语

(1967年5月7日)

林彪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供各地参考。

各地军队都应整训一个短时期，时间以十天至十四天为宜，方针和办法采用广州的较好。已经整训过的，一个月或两个月后再整训一次。全军三支两军人员，每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应整训一次，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以上，请酌定。

毛泽东

五月七日

[1] 指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1967年5月5日关于支左干部集训情况给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报告。报告说，最近，我们对派出广州地区支左、支工、军管的1700多名干部，分两批进行了集训（第一期10天，第二期8天），并通过集训调整了一些干部。这次集训的主要经验是：一、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突出解决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二、发动群众，总结经验教训，自己教育自己；三、针对干部的活思想，组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个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中央军委转发到团级以上党委。

关于发表《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材料等的批语^[1]

(1967年5月7日)

文革小组各同志：

请你们研究一下，此件是否可以公开发表。如准备发表，事前要找炮五师、谭厚兰、李庆林^[2]等同志核对属实，不妥处加以修改，然后发表。又，四川那个文件^[3]，关系重大，如何修改的，请告知为盼！

毛泽东

五月七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1967年5月5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四七〇期上。这期简报登载了一篇题为《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的材料。材料说，北京军区炮五师在北京师范大学搞军训期间，“坚决和革命派站在一起，对保守势力和中间派做了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瓦解了保守组织，提高了中间派的阶级觉悟，壮大和巩固了左派队伍”。196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材料，同时还发表了题为《军政训练好》的社论。

[2] 谭厚兰，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掌权的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公社”的负责人。李庆林，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另一造反派组织“井冈山造反兵团”的负责人。

[3] 指中共中央1967年5月7日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要相信和依靠群众、人民解放军 和干部的大多数

(1967年)

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1]

[1] 1967年5月8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发表的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4月28日，《人民日报》提前转载了《红旗》杂志的这篇社论，并在第一版单独发表了毛泽东的这句话。

对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宣传工作意见的批语^[1]

(1967年5月9日)

退陈伯达同志：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1967年5月8日送审的意见稿上。意见稿建议，5月份的宣传工作以《讲话》为中心，组织演出、宣传、纪念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一) 各报重新发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和自1951年批判《武训传》以来毛主席有关文学艺术的重要指示。

(二) 发表纪念《讲话》的社论和文章，有重点地组织几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并组织工农兵群众座谈。

(三) 发表并出版革命样板戏的剧本和其他的革命文艺创作。组织革命文艺工作者写些学习《讲话》的心得体会，大力宣传毛主席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

(四) 发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和江青1964年在全国革命现代京剧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

(五) 5月23日召开纪念《讲话》的群众大会。

(六) 5月10日至31日，全国各主要城市组织庆祝活动，演出革命样板戏和革命电影，并广泛开展群众性业余文艺演出活动。

(七) 将一批毒草影片拿出放映，供批判之用。

提碰头会讨论决定。如大家同意，我不反对。

毛泽东

五月九日一时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着新中国（宣传画）

对反映济南地区问题来信的批语^[1]

(1967年5月10日)

此件送总理阅后，交文革小组一阅，退林彪同志存。

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伯承1967年4月30日转报的一封署名为“济南军区机关全体革命群众、济南驻军全体支左工作人员”的来信的批语。这封写于1967年4月29日的信中说，目前济南反对解放军的大风已经刮到十二级了，我们天天挨骂，任人逮捕、扣押，干部家属也被殴打、辱骂，军区的干部子弟也天天挨打。我们支持的工厂、企业单位，都一个个被砸了。革命的群众已处在少见的白色恐怖之中。我们难以相信，这是左派夺权之后发生的事情。从他们夺权以来的一系列情况说明，他们不是在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而是按什么“王效禹思想”办事。也许是我们解放军未跟着他们那样做，他们就怀恨在心，欺骗中央，掀起了这股反对解放军的大风。我们不禁要问：他们还要不要解放军，要不要工人阶级，要不要贫下中农，要不要广大党团员？这到底是在对谁专政，是谁在专政？刘伯承在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转报这封信时写道：“昨廿九日晚廿时，一自称是济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的来人说，此刻我们的部队正受到王效禹的红卫兵攻打，形势非常紧张，要我们迅速离开济南，同时要我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交一封信等情。”毛泽东在这段话旁加了着重号，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王效禹，当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1970年6月被免职。

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毛泽东
五月十日

二

这是张春桥、姚文元^[1]同志未到济南时学生、工人们表现的情况。其实不是那样严重。

[1] 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对反映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 支左工作中一些问题来信的批语

(1967年5月11日)

林彪、恩来^[1]同志：

此件^[2]很值得一阅，是山东两军〔区〕的同志写的。

毛泽东

五月十一日

同样情况在全军内，在许多人身上都存在，当然不是多数。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2]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1967年5月9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一七八期上登载的《济南、山东两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材料。材料中说，济南军区政治部、山东省军区司令部两位干部来信，反映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一）认为济南军区“在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中”“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承认围绕在省革委会周围的革命组织是革命派，另一方面又承认一些保守组织也是革命派，或明或暗地支持他们，打击革命派。（二）说济南军区一些干部对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有“错误议论”。（三）说济南军区机关正在积极准备“打官司”，赴京告状。（四）认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至今没有揭发谭启龙（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问题。（五）认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已由过去对造反派感情不深发展到目前的公开对立。

在济南军区支左人员 秦厚德^[1]来信上的批语

(1967年5月13日)

—

印《快报》^[2]，文革办。

二

这位同志反映的问题^[3]，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很值得注意。济南空军于五月五日，济南军区于五月六日已公开声明支持省革命委员会。陆、空军均对中央来了报告，问题已经开始解决。但其他许多省、市有些解决了，有些则还未解决。

毛泽东

五月十三日

[1] 秦厚德，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通信总站干部，1966年9月被免职后安排转业，因地方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未被接收，1967年3月参加

济南军区司令部的支左工作。

[2]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编印的《快报》。

[3] 秦厚德1967年4月21日写给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并转毛泽东等的信中说：我于3月4日参加了军区的支左工作，根据一个多月的亲身体验和所了解的情况，感到驻济部队对济南市的支左工作，在2月10日以前是完全正确的，自2月10日以后进入工厂、院校至今，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支持的不是左派，而是保守派，支持保守派打垮了革命派。解放军不是左派的后盾，而是成了保守派的后盾。二、搞“合二而一”，以保守派组织为核心去联合革命群众组织，如革命群众组织不同意时，即认为是搞分裂主义，破坏大联合。三、在“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上，有的单位没有把革命放在首位。四、有的宣传队对所谓的反革命组织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使人见了害怕。五、省革委会与济南军区保卫文革指挥部的意见有分歧，部队支左的同志对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有意见，对省革委会其他成员的讲话更是对立，近来已发展到针锋相对的程度。六、部队的同志和“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等革命组织十分对立，这种对立现已公开化，双方支持的群众组织不断游行示威，有时还发生武斗。七、济南军区保卫文革指挥部成了保守派告状的地方，省革委会成了革命派告状的地方。

对北京市革委会重要通告的批语^[1]

(1967年5月)

照办。

[1] 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1967年5月11日送审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重要通告》的批语。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通过的这个通告的主要内容是：一、革命群众都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指示，争取革命和生产双丰收。二、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严禁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少数坏人和情节严重的打人凶手，应该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制裁。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部队和军代表有权处理武斗问题，有关方面必须听从，不得拒绝执行。三、不准破坏国家财产，不准动用交通工具参加武斗，不准调动人员参加外单位的武斗。四、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的指示。不许破坏劳动纪律，不许无故旷工，坚决同一切扰乱革命和生产秩序的现象作斗争。五、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担负起维护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秩序、保卫国家财产、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神圣职责。六、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4月20日关于停止外出串连的通知。已经外出串连的北京学生和群众，除经中央特许的以外，应当立即全部返回北京，外地来京串连的学生和群众，同样也应立即全部返回本地。5月14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出了这个通告。



1967年，毛泽东在北京。



1967年，毛泽东在北京。



1967年的毛泽东。

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 关于支左工作报告^[1]写的批语

(1967年5月14日)

—

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分区，各人民武装部，各军各师各团，

[1] 指广东省军管会1967年5月13日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和中共湖南省军区委员会5月12日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给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广州军区的报告。广东省军管会的报告说，最近常委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检查，认为部队支左以来，虽然支持了一些真正的革命左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受到一些革命小将一针见血的批评。对于所犯错误，觉悟迟，改进慢，有些领导干部思想不通，患得患失，不敢承担责任，修正错误。为此，常委研究了今后改进的办法。湖南省军区党委的报告说，5月11日晚，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从广州来电话，传达了广州军区首长对湖南问题的指示，使我们清醒了头脑。大家决心做到：一、从上到下统一认识，把军区首长的指示精神迅速贯彻到各级领导中去，对照军委十条命令，检查前段工作。决定立即集训在基层支左的干部，机关干部与部队干部、战士，也相应集中五至七天时间（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批注，即本篇三），搞两条路线的正面教育。二、纠正错误，做好工作。三、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要从上到下统一认识，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革命的，必须相信和依靠他们。四、加强领导。

直属各军种、兵种：

（一）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三）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军委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二

恩来、林彪^[1]、中央碰头会阅发。

[1] 恩来，即周恩来。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三

时间太少，应有十至十四天。——毛注

对《伟大的历史文件》 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

(1967年5月18日)

—

即退王力^[2]同志。
改了一点，请小组^[3]酌定。

毛泽东

五月十八日上午二时半

[1] 《伟大的历史文件》是《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1967年5月17日公开发表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而写的编辑部文章。这篇文章分别发表在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和5月2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七期。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5月17日送审的文章修改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送审稿中一段话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本篇三是在送审稿末尾加写的一段话。

[2] 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3]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二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他已觉察到了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

三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对黄永胜与“广州工联”造反派 座谈时讲话摘要的批语^[1]

(1967年5月23日)

林彪、恩来^[2]同志，并告文革小组：

黄永胜同志讲话一篇，建议发给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作为参考。我觉得这种小型的谈心会很好。当地最高首长出面与小将平等地谈心，不摆架子，有错爽直承认，而不吞吞吐吐，并且立即改正，这些都很好。如同意，请酌处。

毛泽东

五月二十三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1967年5月21日编印的《信电快报》第一三一期上。这期快报登载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副司令员温玉成等5月10日与“广州工联”8名造反派代表座谈时讲话的一部分。黄永胜在讲话中检查了“前一段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表示彻底给被打击迫害的革命造反派平反，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关于江青不宜参加 中缅两党会谈的批语^[1]

(1967年5月26日)

江青以不参加为好。

毛泽东
五月廿六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1967年5月18日关于我党参加中缅两党会谈的代表团成员组成问题给周恩来并报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建议的我党代表团组成人员名单中有江青的名字。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中央军委转发五十四军对反对派 进行工作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67年5月27日)

—

各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

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中央军委

五月二十七日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四军1967年5月26日给成都军区并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这个电报说，近几天，军队的领导同志全力以赴，在重庆先后十多次约见了工人组织、学生组织和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红总”等组织的负责人交谈，听取他们的批评和意见。此外，通过接待来访，对反对派的一般群众进行了工作，并同有的组织搞了军民联欢。通过这些工作和活动，消除了一些误解，对立情绪有所缓和，思想感情较前有所接近。反对派表示拥护中央处理重庆问题的“五条”，愿意接受市革委会筹备小组的领导，原则上同意实现两派联合。但要真正实现两派联合，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二

林彪、恩来^[1]同志阅发。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对一些高干子弟参与抄家一事的批语^[1]

(1967年5月28日)

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毛泽东

五月廿八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1967年5月26日编印的《要事汇报》(2)上。这期《要事汇报》说，据云南省公安厅报告，22日晚，17个自称红卫兵的人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抄走手表、照相机等物和现款、存折，在取款时被抓获。参与者都是中学生，其中有6个是北京学生，其余11人，除两人外，都是高干子弟。

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1]上的批语

(1967年5月29日)

林彪、恩来^[2]同志，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毛泽东

五月廿九日

[1] 外交部翻译唐闻生、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干部王海容1967年5月27日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认为对总理的错误和缺点可用小字报或书信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或直接向总理本人提出，或直接上呈您和林副统帅。对总理的指示有不同理解或在某些问题上与总理持有不同意见，可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在群众中展开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但不能借此炮打总理、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后台。”并说：“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关于甘肃实行军管 和成立省革委会问题的批语^[1]

(1967年5月、7月)

—

照办。

毛泽东
五月十二日

二

林彪、恩来^[2]同志：

此件请阅。所见似有理由，请与张、洗、詹大南^[3]诸同志商处。胡继宗同志等既已站出来，所见与军区一致，积极支持三司，是否可不实行军管，而照军区意见，做一时期工作之后即可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以上请商酌。

毛泽东
五月十四日二时

三

退林彪同志：

此件已阅，很好，照办。

毛泽东

七月三十日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1967年5月12日《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批语。意见中说，“鉴于当前甘肃省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决定对甘肃省实行军事管制”。本篇二是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语。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党委1967年5月13日12时给中共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小组并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个电报说，兰州地区当前的文化革命形势仍然是大好的，一些左派组织已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这是甘肃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联合。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继宗等领导干部已表态支持“红三司”，因此“红三司”决定结合他们。我们认为，应以“红三司”为核心，通过进一步对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三结合”，建立甘肃省革委会。军区党委经过讨论，认为应该明确表态支持“红三司”，请速指示。本篇三是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7月29日转发《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的通知和纪要的批语。这个纪要是根据毛泽东5月14日批示，将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冼恒汉、詹大南等20多名负责人和胡继宗召到北京，就甘肃问题进行座谈后产生的。纪要指出，鉴于“红三司”成立和胡继宗等同志已站出来，兰州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大家认为甘肃省可不实行军事管制，直接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3] 张，指张达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洗，指洗恒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政治委员。詹大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甘肃省军区司令员。

对《关于对国务院□□部（委） 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 （试行草案）》的批语^[1]

（1967年5月）

照办。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67年5月28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决定（试行草案）上。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国务院各部（委）经过今年领导革命、监督业务的夺权斗争后，现在大多数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均已分成两派，互相斗争，影响业务和生产甚大，势非实行军管不可。昨（廿七）日常委碰头会上通过这一决定（试行草案），现送上，请予审批。”决定（试行草案）指出：“为了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根据毛主席关于‘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以及‘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等重要指示，特决定自即日起对□□部（委）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或军管小组，任命□□□为军管会主任或军管小组长，□□□、□□□为副主任或副组长。”“军管会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对部（委）的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军管会下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把革命放在首位，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革命统帅生产，建立革命的新秩序，掀起生产的新高潮，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不久，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这个决定（试行草案），对国务院一些部（委）陆续实行军事管制。

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1967年5月)

多少派也是两大派，不是反革命就要做工作，慢慢观点就会越来越近的，不会越远的。

搞供给制、共产主义生活是马列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卅二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就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也忘掉了。是不是由部队带头恢复供给制？

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者工资高，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

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这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的可以照顾一下，其余的就不要分等级了。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卅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从几十万人增加到几百万人，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过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

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指示

(1967年5月)

机构不要庞大，要粉碎旧的官僚机构，旧市委继承了官僚的机构，官僚机构容易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利用，所以建立革命委员会很必要。要破坏旧北京市适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的机构。搞了几个月了，这个经验是逐步取得的，要总结几条。



1967年，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以及上海市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代表。



1967年，毛泽东在北京。



1967年，毛泽东在北京。



1967年的毛泽东。

干革命要有阶级感情

(1967年5月)

要搞好文化大革命就要和工农相结合，要有无产阶级感情，要有工农兵感情。



《最幸福的时刻》（油画）



《最高荣誉》(油画)

对上海革命派的号召

(1967年5月)

希望你们成为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的模范。

希望你们成为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模范，成为反对小团体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自私自利的模范。

对上海市革委会的号召

(1967年5月)

一、这次双方都有经验，这股风不会刮得很大，我们要遵守八条，解放军得遵守十条。

二、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很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是个大方向问题。办法是否好，同志们可以提出来。

关于国际形势的指示

(1967年5月)

有人说，美苏战略中心转移，我不赞成。他们是注意远东，但中心还在欧洲。欧洲七个师的兵力，并没有减少，只是调了几万老兵到远东。

关于处理军民关系的几点指示

(1967年5月)

现在师军区、军分区较多，这个问题不要紧，不要怕。有些地方报纸封了，我们向来不主张办那么多报纸。绝食不要紧，这是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为什么如此？是因为我们支左支错了，认错不干脆，不承认方向路线错误，扭扭捏捏。错了没关系，改了就好了。

为什么要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还有坏人，有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人意志衰退。绝食是对付官僚主义的办法，就是要去做工作，不要把人饿死，要想办法。可以送开水，水里可以放些葡萄糖。开枪的地方大体是军队，不是军队支持，也是民兵，如青海、内蒙。这次文化大革命，也是对军队的一次考验。有些地方把情况报告得很严重，如江西、两湖、河南。是不是那样严重？过去东北比较平静，如今东北局和军队各支持一派。

北京也在分裂为两派，打乱架。乱了就可以乱出个名堂来。四川、贵州最乱，主要是贺龙、罗瑞卿、李井泉搞的。……和稀泥，有时也是必要的。各地的问题各地自己去解决，报中央批准。中央文革最近讲得太多了，不要到处讲，讲多就不灵。现在到处在骂保皇派，保皇狗，什么四三派，四四派，还有不三不四派。现在军队较紧张，联动放了么？为什么不让□□派参加红代会？大学生各地

串连的一律回校闹革命。北京市的大学生要全部撤，在中学、工厂、农村的要回来。农村要采取慎重的态度，有的武装部有问题。要采取坚决态度，要坚决支持左派。错了就改，不要扭扭捏捏，要干脆。对保守派要做思想工作，采取教育、团结、争取的方针。屁股要扭过来。如果现在不纠正这个问题，让保守派继续发展，我们就要犯错误。要同左派站在一起，做好保守派的工作。有些武装部很顽固，如果这样下去，要犯极大错误，要注意做好武装部的工作。

老干部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1967年)

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1]

[1] 《人民日报》1967年6月1日发表的《要让孩子们经风雨、见世面》（作者任立新）一文，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并写道：“一切革命干部都要响应毛主席的这个伟大号召。”

关于夏收的指示

(1967年6月3日)

积极行动起来夏收夏种，目前正进入两夏大忙季节，南方已开始收割。今年全国夏收作物生长很好。今年的夏收，各级领导同志应特别重视，立即投入夏收夏种。各地要组织学生、机关干部、工人、解放军，以劳力、畜力、技术力量，大力支持人民公社，做到颗粒归仓。严防阶级敌人破坏。



1967年6月16日，毛泽东观看上海京剧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后接见演员。



1967年6月16日，毛泽东接见《智取威虎山》剧组人员。



1967年6月1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观看京剧《智取威虎山》后和演员合影。



1967年，毛泽东在北京观看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后和演员合影。

关于对外宣传的指示

(1967年6月18日)

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要自己来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虚一点，当然就不要失掉原则。昨天氢弹公报，我就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我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了。

对一封反映西安几个学校造反派 讲阔气、讲排场等问题来信的批语^[1]

(1967年6月21日)

文革小组各同志：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1967年6月19日编印的《信电快报》第二三四期上。这期快报刊登了陕西师范大学文革筹委会景险峰等4人的来信。信中说，最近，西安有几个学校的造反派庆祝成立革命委员会，其规模之浩大，场面之豪华，实在令人惊讶。他们不是节约闹革命，而是大搞铺张浪费。西军电、西工大两校联合开庆祝大会，成立革委会，参加者达37600人，几乎是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参加人数的4倍，筹办大会花了近万元。治院成立革委会，在讲排场、讲阔气方面比前者更甚。一些中等专业学校也学起了“老大哥”的样子。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学校一个地区的问题，它带有普遍性的倾向，若不予以纠正，是很危险的。1967年6月29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节约闹革命、防止铺张浪费的通知，将这封信转发到各军区，各级革委会、军管会和群众组织。通知中说，中央认为，各级革命委员会、各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必须充分认识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每个同志都面临着新的严峻的考验。必须懂得，当权以后，地位发生了变化，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滋长和发作，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灰尘也迎面扑来。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高度自觉，不断地用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武器，改造自己的思想，坚决抵制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

建议此件公开发表。是否妥当，请在常委碰头会上一议。
发时宜写一按语。

毛泽东
六月廿一日

关于绝食静坐的问题

(1967年6月29日)

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绝食静坐可以作为一种斗争手段。因为无产阶级内部有一小撮敌人，有官僚主义。他无非要让你答应几个条件。所以绝食静坐，允许，但不能提倡，一般不赞成。绝食可以开水放糖、放盐、打葡萄糖，可以轮班。

必须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 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1967年)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1]

[1] 1967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了《文汇报》6月21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按语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句话。

对八三四一部队支工工作的指示 和支工情况报告等的批语^[1]

(1967年6月、11月)

—

1. 下去后要做好宣传工作，要做深入的、细致的、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厂子里女工多，要派些女同志下去，便于工作。

[1]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组织支工部队，于1967年6月26日分别进入北京针织总厂及其所属的两个分厂和北京市化工三厂。本篇一是毛泽东在支工部队临行前所作的三点指示。1967年11月11日，北京针织总厂革委会给毛泽东写来报喜信，汇报在支左部队的帮助下，该厂成立了革委会。11月13日，八三四一部队也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我们进入北京针织总厂后，坚决遵照主席在我们临行前所作的三点指示进行工作，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大力宣传主席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和“要斗私，批修”的号召，促进了该厂两派群众的大联合，组成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在支工过程中，我们老老实实在地做工人群众的小学生，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战斗，同他们交心，了解了很多情况，学习了很多东西。此外，还组织医疗小组，为职工及其家属看病近2000人次。本篇二是对北京针织总厂革委会的来信和八三四一部队报告的批语。11月17日，中共中央将来信、报告和批语一起印发全国各地、各企业、各机关、各学校，要求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执行。

2. 下去后不要匆匆忙忙急于表态，经过调查研究，如果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逐步地把他们联合起来。就是两派严重对立的群众组织，群众也是愿意联合的，不愿意联合的只是少数的几个头头。

3. 要向工人群众学习，不怕犯错误，错了就改。要关心群众的生活，组织个医疗组，给他们看病。

二

看过，很好，谢谢同志们！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五日

看到西安师院造反派两张大字报 和给中央文革的信后的批示

(1967年6月)

现在有的人是“铺张闹革命”“大少爷作风”“掌权开始，是浪费开始”。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话，批评人家宽一些，批评自己严一些。

关于中央各部运动的指示

(1967年6月)

全国的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慢，中央各部要慢。比预料的晚了一个季度，不是三、四、五月了，而是六、七月了。与其估计快一点，不如估计慢一点，与其估计很容易，不如估计困难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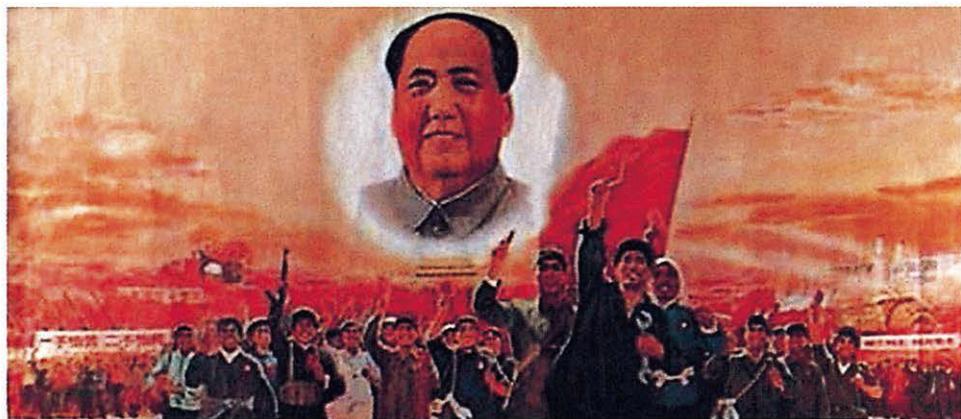
中国革命的伟大世界意义

(1967年6月)

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搞地下斗争，而是武装斗争。

就是全世界都黑了，只要中国是光明的，那世界就有希望，没什么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把北京、上海、天津这几个地方搞好。上海就是工人这个队伍比较好，所以上海的局势中央也比较放心。



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夺取更大胜利（宣传画）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宣传画）

有了错误就改

(1967年6月)

如果有了错误定要痛痛快快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改得越快、越彻底越好。绝不能扭扭捏捏，吞吞吐吐，更不能坚持错误，越走越远。

关于叛徒问题的指示

(1967年6月)

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出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以接待。但不能重新入党。

和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的 谈话（节录）

（1967年6月24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欢迎你们，第一次到中国来吗？

卡翁达（以下简称卡）：我们中有三位曾来过。我本人、我的夫人和其他几位都是第一次来。

毛：赞比亚在热带，各种畜牧业和农业可以搞起来。

卡：是的。赞比亚潜力很大，过去受帝国主义控制，很多事不能做。现在各地区都在发展养牛场。

毛：赞比亚有七十万平方公里，差不多等于中国几个浙江省。

卡：我国主要问题是交通问题，所以我们要通过坦桑尼亚搞铁路。

毛：要勘察吧？要下决心干，开始干就好了。

毛：坦桑尼亚还没有确定究竟由谁帮忙吧？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坦桑尼亚已确定由我们帮忙勘察。

卡：我是顺便提到铁路问题。我已和周恩来总理详谈了这个问题。我们回去和尼雷尔总统商谈后就通知你们。我们和坦桑尼亚铁路的铁轨宽窄不一样，赞比亚的铁轨宽一些，坦桑尼亚的窄一些。

毛：将来非洲国家都独立了，把帝国主义赶走了，就可以发展铁路了。

周：非洲被帝国主义分割了。

卡：很对。非洲很多民族都被人为地分割开来。

毛：这就是帝国主义的分而治之。

卡：我们只有通过帮助其他地区的自由战士，使他们获得独立，才能报答你们的帮助。

毛：这不是什么报答。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

卡：是的，我完全同意主席先生所说的。我的说法可能粗糙一些，我的意思是，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我们真正欣赏你们援助的心情。

毛：你们独立才两年半，还有很多困难。你们也帮助了未独立的国家。

卡：对。

毛：我们独立已有十八年了，更应该帮助他们。

卡：很感激主席先生。

毛：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

.....

毛：总有一天帝国主义是要到我们这里来的。我们是有经验的，帝国主义也好，国内反动派也好，都可以赶走。他（指赞比亚合作、青年和社会发展部部长班达）一九六三年来时你们不是还没有独立嘛，如果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一样，独立了十八年，你们的国家建设、文化教育就会有大的进步。你们到我们这个时候，还有十五年。到那个时候，你们的铁路早就通车了。你们修建这条铁路只有一千七百公里，投资也只要一亿英镑，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卡：很希望有机会能和毛主席多谈谈，但因为主席先生很忙，我们有些过意不去。

毛：不要紧。和你们谈，我很高兴。



1967年6月6日，毛泽东和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桑穆加塔桑交谈。

修改中国红卫兵代表团 去阿尔巴尼亚的发言稿^[1]

(1967年6月)

- 一、在〈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下……
- 二、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哺育下……
- 三、在以〔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恩维尔·霍查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 四、领导阿尔巴尼亚青年胜利前进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敬爱的〔伟大〕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领导下……
- 五、伟大的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1] 〈〉内为毛泽东修改时删去的内容，〔〕内为毛泽东添加的内容。

对姚文元访问阿尔巴尼亚的指示

(1967年6月)

这次出去要注意谦虚啊！这不是一个代表团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中国红卫兵问题。

关于意识形态方面 容易出修正主义的谈话

(1967年6月)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钻进了无产阶级内部。

容易出现修正主义的，第一个是中央里的人物，第二是新闻记者，第三就是文科大学的，都是在意识形态方面。

关于缅甸问题的指示

(1967年7月1日)

缅甸问题不怕断交，不怕决裂，甚至于这个时候断交更好，这样更有利于我们放开手干。

关于制止建造毛泽东塑像等问题的批语^[1]

(1967年7月5日、13日)

—

林彪、恩来^[2]及文革小组各同志：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1967年7月4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二八〇期上刊载的《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材料写的批语。本篇二是对这期简报上刊登的一则简讯写的批语。这则简讯说：北京矿业学院某群众组织过去曾在北京印售未经公开发表的毛主席讲话，受到有关方面的制止。但是，他们最近又收集了毛主席的许多没有公开发表的讲话材料，派人赴长沙编印。希望中央制止。本篇三是对周恩来7月13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指示稿的批语。中央指示稿将毛泽东7月5日的批语（即本篇一）转发各地，指出：“建造毛主席的塑像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这只能由中央统一规划，在适当时机、适当地点建造”。“现在某些群众组织那种匆匆忙忙的做法，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会造成政治上的损失”。“希望你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加以制止”。“中央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出现这种事情，也请你们加以制止”。当日，中共中央即下发了这个指示。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

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二

此事也请制止。

三

照办。

关于派部队制止赣州武斗的批语^[1]

(1967年7月6日)

林彪、恩来^[2]同志：

赣州问题严重，涉及整个赣南十多县，调一个师去，只能管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处，对赣南鞭长莫及。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将事情办好后仍返广东。此事请先考虑，待面商。

毛泽东

七月六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1967年7月4日编印的《群众来信摘抄》第五十五号上。这期摘抄登载了江西赴京控告团、江西赣州赴京控告分团7月4日的电话汇报，反映赣州武斗情况严重，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要求中央立即派部队前往制止武斗。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对两种《毛主席论教育》的批语^[1]

(1967年7月6日、12月6日)

一

退陈伯达同志：

此件内容，错误很多，应大加砍削，至少去掉三分之一。

毛泽东

七月六日

二

陈伯达同志：

这一本《论教育》，我未看，可能也收进一些坏东西，请你同文革小组几位同志，连同你们编的那一本，一起审查一下，把坏的一概删去，留下一半左右较正确的就行了。

毛泽东

七月六日

三

陈伯达同志：

作了一点修改^[1]。请同志们看一遍，如认为可以，即可印发。

毛泽东

十二月六日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1967年6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的批语。这本小册子分为9个部分：一、政治挂帅；二、阶级斗争；三、教育目的；四、教学革命；五、教学内容；六、教学方法；七、师生关系；八、办学要面向群众，依靠群众；九、学校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6月27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将这本小册子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政治研究室编出《毛主席论教育》小册子，打算发给大家，作为正面教材，作为教学制度革命的指导方针，让大家讨论，结合调查研究，以便提出大、中、小学校的教学改革的初步方案，供中央考虑。”本篇二写在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1967年五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的小册子上。这本小册子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15个部分：一、党的领导；二、教育方针；三、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四、教育要革命；五、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六、群众路线；七、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八、教学方法；九、知识分子的改造；十、青年；十一、群众办学，勤俭办学；十二、理论联系实际；十三、论知识；十四、破除迷信；十五、批判继承。后面还附有《陈伯达、戚本禹同志与北京大学革命师生代表座谈有关教育改革问题》的材料。本篇三是对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义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的批语。该书由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共收录了毛泽

东1927年至1967年间关于教育方面的论述50余条，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1967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通知，将此书下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军区、各地大中小学校。

[2] 毛泽东对《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处：一、第9页摘录了毛泽东1958年5月1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长会上的一段讲话，其中讲到，“总而言之，我这些材料要证明这一条：是不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毛泽东在文中“我这些材料”后面加括号写了一个注：“当时印了一批古今中外发明家的材料。”二、第11页摘录了毛泽东1964年2月13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审阅时，将其中的“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大学，是个吹鼓手”一句改为：“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在“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一句后面，加写了一句：“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在“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一句后，加了“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在讲到经学时删了以下一段话：“如佛经，鸠摩罗什译的《金刚经》，字太多，很难读完。唐玄奘译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是《金刚经》内容提要，只有几百字，比较好读。”三、第13页摘录了毛泽东1964年6月8日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其中讲道：“我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红军大学的讲义。写了就不要讲了，书发给你们，让你们自己看。”毛泽东审阅时在这后面删去了以下一段话：“《论持久战》也是这样写出来的。《矛盾论》写了几个星期，白天黑夜写，准备可难了，写了出来，只讲了两个小时。写好了就不要讲了。”四、第14页摘录了毛泽东1964年7月5日与毛远新的谈话纪要，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以下一段话：“我过去在抗大讲课时就是把讲稿发给学生，我只讲三十分钟，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五、第16页摘录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审阅时，在“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一段话后面，加了一句：“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除上述几处外，毛泽东在这本书的个别地方，还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要集中批判党内最大的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7年7月7日)

我个人觉得目前存在这样一个苗头，就是放弃对敌人斗争，对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上次在这儿座谈的时候，曾经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应该上纲，这个纲针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现在这个矛盾不集中，很分散。这样就难批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听了氢弹工作会议汇报后的讲话

(1967年7月7日)

新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二年零八个月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在世界上是第四位。导弹、原子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了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一吨重的勋章。

现在形势很好。印度拉加族反对国大党，搞武装斗争。印尼共产党清算了修正主义，又起来了。缅甸游击队有很大发展，比泰国武装斗争还有基础，已搞了几十年，过去党不团结（红旗党、白旗党），现在统一起来了。反对奈温是一致的，武装活动地区已占缅甸地区百分之六十。缅甸比南越的地理条件还好，回旋区大。泰国的地理条件也很好。缅甸起来，泰国起来，这样就把美国完全拖在东南亚。当然我们还必须着眼在我们国土上早打、大打。缅甸政府反对我们更好，希望他同我们断交，我们就可以更公开地支持缅甸共产党。亚洲形势如此，非洲、拉丁美洲武装斗争也有很大发展。美帝国主义更加孤立，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美帝国主义是战争祸首。全世界人民和美国人民都反对他。苏联修正主义也更加暴露，特别是这次中东事件，苏修还是采取赫鲁晓夫那一套。本来他派往阿联军事专家两千多人，先是采用冒险主义，把军舰开了去，说服阿联不要先出击，同时用热线告诉了约翰逊（赫鲁晓夫那时还没有用热

线)后,约翰逊很快就告诉了以色列,实行突然袭击,把阿联百分之六十的飞机都消灭在地面上。苏联援助阿联一共三十三亿。打掉了廿亿,最后阿联投降停了战。这是出卖民族的又一次大暴露。对苏联,不仅是阿拉伯国家,亚洲、拉丁美洲都反对。苏联一个七十多岁老人自杀,就是一种不满。中东战争不久,苏联召集了三次东欧国家会议,罗马尼亚不签字,也未和以色列断交。后来毛雷尔跑到中国要和我们搞全面经济协作。单项经济协作可以,全面协作我们不干。帝、修更加孤立。越南战争坚持下去。目前许多地方反华,形式上好像我们孤立,实际上他们反华是害怕中国的影响,怕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怕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反华是为了镇压国内的人民,转移人民对他统治的不满。这个反华是美帝苏修共同策划的,这不表示我们孤立,是我们在全世界影响大大提高。他越反华越促进人民的革命,这些国家的人民认识到中国的道路是求得解放的唯一道路。我们中国不仅是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军事上、技术上也要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给他们武器,现在可以公开给他们武器,就是刻了字的中国武器(除了一些特殊地区),就是要公开支持,要成为世界革命的兵工厂,但是我们许多技术还未解决。

还要把□□、□□□、□□□□狠狠地抓一下。总理批评“四机部落后”,四机部要大大赶上去。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爆炸第一颗氢弹。

毛泽东等悼念阮志清^[1]逝世的唁电

(1967年7月8日)

胡志明^[2]主席同志：

惊悉阮志清同志突然因病逝世，至为哀痛。阮志清同志是您的、也是我们的好同志、好战友，也是世界革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好战友。他为越南的革命事业，为中越两国、两党、两军的团结战斗友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逝世，是我们共同的革命事业的巨大损失。但是，他的光辉的榜样和影响是永远不会消逝的，是会继续发扬光大的。务望节哀，保重您的身体健康。

毛泽东 林彪 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

[1] 阮志清，原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1967年7月6日因病逝世，享年53岁。

[2]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对总参、总政关于执行林彪^[1]指示建造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稿^[2]的批语

(1967年7月12日)

退林彪同志。

此件不发。中央已有指示^[3]。

毛泽东
七月十二日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1967年7月1日的这个通知稿写到，林副主席于6月28日指示，“建造大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我们部队也应当这样搞”。“凡有代表性的大军事机关，其驻地有大院、有广场的地方”，“都可以搞”。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应立即按林副主席的指示执行。7月10日，林彪将通知稿转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上面写了这个批语。

[3] 指中共中央1967年7月13日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

对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 通知稿^[1]的批语

(1967年7月13日)

—

照办。

[1] 周恩来1967年7月13日送审的这个通知稿，是由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戚本禹起草的，主要内容是：一、任何人和任何组织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更不能为了武斗，发动农民制造凶器，发给枪支弹药。二、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在铁路、公路、水路沿线设置关卡，拦阻车船，破坏交通运输。三、已经进城参加武斗和破坏交通运输的社员，立即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所发武器一律收回。四、对参加武斗的社员所作的各种“优待”，例如工分补贴等，一律无效，不准实行。因进城参加武斗而造成的伤亡事故、生产损失、误工补贴，一律由挑动者负责。五、从本通知下达之日起，犯有上述错误的人应立即改正错误，立功补过；如坚持不改，一再违犯上述各条，要严肃处理，其首恶应依法惩办。当日，中共中央即下发了这个指示。

二

不宜称为坏人。^[1]

[1] 中共中央指示稿的开头有一段话，说到最近一个时期，江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的坏人，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毛泽东审阅时，将文中的“坏人”一词改为“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并写了这个批语。

关于不要“开快车”的指示

(1967年7月13日)

开快车要翻车，要打招呼。当前主要搞大联合、三结合，坏人挖出来，牛鬼蛇神挖出来。党组织要恢复，各级党代表大会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我看大体要到明年这个时候，大家不要有疲劳的感觉，不要想脱身。

接见军队领导干部时的讲话

(1967年7月13日)

不要怕闹，闹得越大、越长，越好。七闹八闹，总会闹出名堂来的，可以闹清楚。不管怎么闹，不要怕，越怕鬼越来。但也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也是不好的。

全国大闹不可能。哪里有脓包，有细菌，总要爆发的。

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第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这很好嘛！

(张春桥：有人讲第三派是走第三条道路的。)

哪有什么第三条道路呀，人家要大联合、大批判。你要诱导嘛！



《向毛主席汇报》（油画）



《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汇报》（油画）

中央关于武汉“七·二〇事件” 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

(1967年7月25日)

—

林、周^①、文革小组及中央各同志：
代拟复电如下，请讨论酌定。

毛泽东

七月二十五日十七时

二

中共武汉军区党委：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②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③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

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¹⁴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中央

七月二十五日

[1]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党委常委1967年7月24日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并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电报和所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公告说，7月20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毛主席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和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住地的“严重政治事件”。这一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陈再道等人“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公告于7月26日公开张贴，7月2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1978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经过长期调查，证明‘七·二〇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他们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事件发生后，林彪、‘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把‘七·二〇事件’说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利用所控制的一切宣传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对武汉地区广大军民实行反革命围剿。他们栽诬王任重、陈再道同志是‘七·二〇事件’的‘后台’，把一大批领导干部打成‘党

内一小撮走资派’；把八二〇一部队诬蔑为‘叛军’，武汉军区主要领导同志被打成‘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许多部队同志的家属也被诬蔑为‘叛军家属’；把‘百万雄师’诬蔑为‘百匪’‘反革命组织’，这个群众组织的领导人被打成‘一小撮坏头头’，不少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家属被诬蔑为‘百匪家属’；甚至连同情八二〇一部队和‘百万雄师’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也惨遭迫害。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有的被长期关押，还有的被打伤、打死。”“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对‘七·二〇事件’作了多次研究，一致认为这个事件是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而制造的阴谋事件，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应公开宣布彻底平反。凡因‘七·二〇事件’强加于解放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全部推倒；遭受迫害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昭雪；被打伤、打死的人员，应按照党的政策，继续处理好抚恤等遗留问题。”

[3] 陈再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

[4] “百万雄师”，是当时武汉市的一个群众组织。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49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